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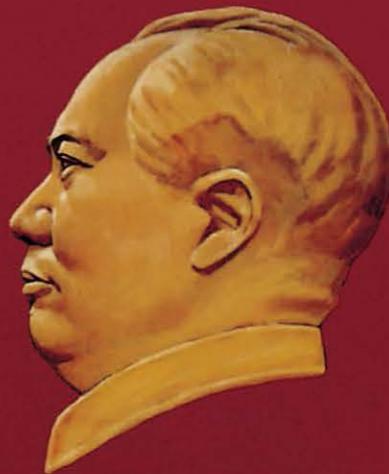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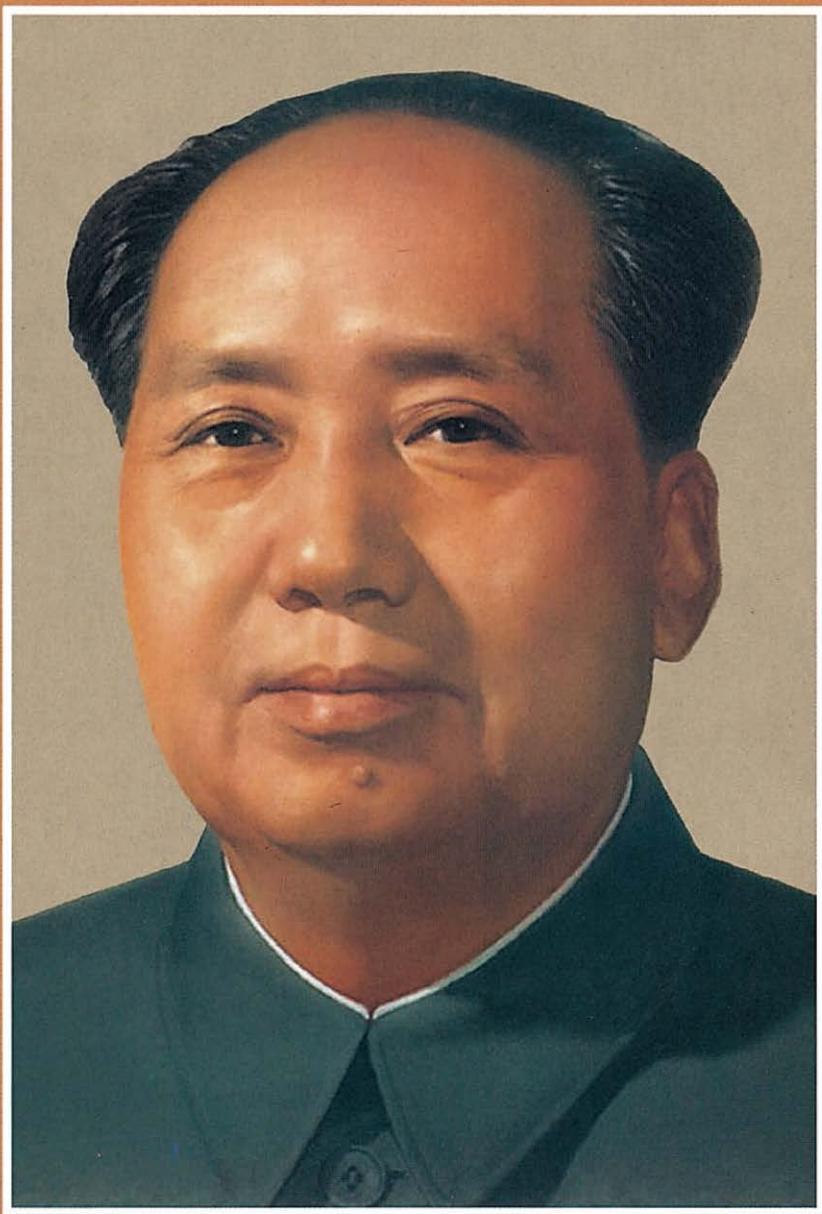
9 789881 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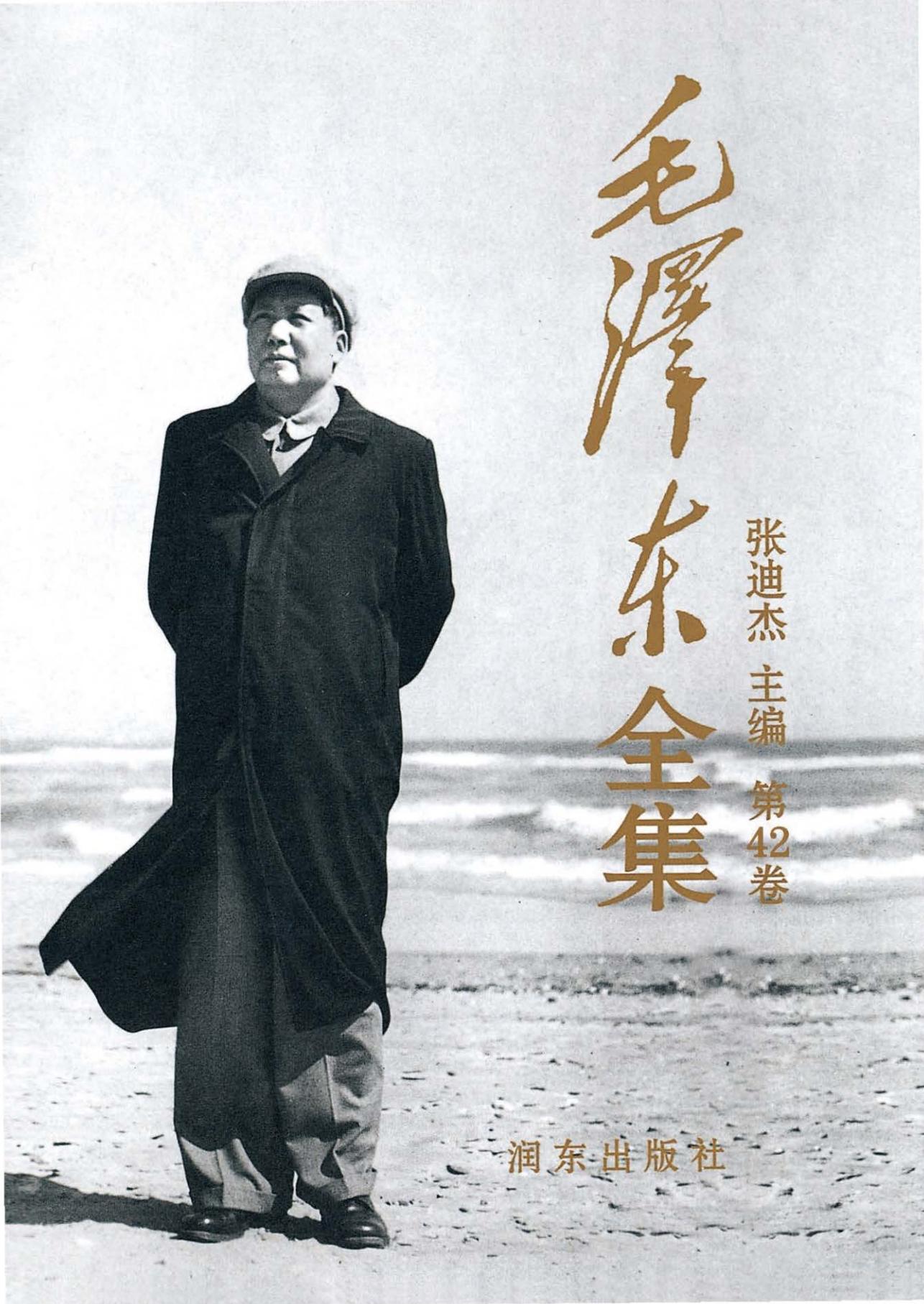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	1
(1959年5月13日、15日)	
接见智利政界人士的谈话纪录（摘录）	5
(1959年5月15日)	
中央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农业指示的通知的批语	6
(1959年5月19日)	
关于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的批语	8
(1959年5月21日)	
对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9
(1959年5月22日)	
对江苏省重新布置钢铁工厂建设的批语	11
(1959年5月23日)	
对赵尔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3
(1959年5月30日、6月17日)	
关于妥善解决修筑临淮冈拦河水库引起的矛盾问题的批语	16
(1959年5月31日、8月5日)	
转发青海省军区海南指挥部党委关于平叛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的几点意见的批语	22
(1959年6月2日)	

中央转发辽宁省委推广“包米食用增量法”经验报告的批语	24
(1959年6月3日)	
关于重印《逻辑指要》一书给章士钊的信	26
(1959年6月7日)	
对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当前算账和生产安排问题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30
(1959年6月)	
同意陈云因病休养的批语	31
(1959年6月8日)	
对中央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稿的批语	33
(1959年6月9日)	
对中央转发廖鲁言关于召开十四个城市蔬菜会议情况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34
(1959年6月9日)	
转发兰州军区司令部关于五月份战果综合通报的批语	35
(1959年6月10日)	
对江苏涟水县一封来信的批语	36
(1959年6月10日)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37
(1959年6月11日)	
对上海市委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40
(1959年6月11日、13日)	
对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修改和代拟的补充指示稿	44
(1959年6月)	

对中央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稿的批语	47
(1959年6月12日)	
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问题	48
(1959年6月13日)	
要政治家办报	52
(1959年6月13日)	
对西藏工委关于进藏人员计划的批语	55
(1959年6月15日)	
中央转发陶铸关于从社员代表大会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的报告 的批语	56
(1959年6月17日)	
关于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批语	58
(1959年6月17日)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	59
(1959年6月20日)	
转发张体学关于湖北分粮到户等情况汇报的批语	60
(1959年6月20日)	
转发洪学智、张国华关于西藏山南地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61
(1959年6月20日)	
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62
(1959年6月22日)	
和毛宇居应对联	82
(1959年6月25日)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112
(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对新华社关于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准备工作的报道的批语	119
(1959年6月)	

关于一九五九年市场供应情况的批注	120
(1959年6月)	
在关于印度和尼泊尔联合声明的报道上的批语	121
(1959年6月)	
对《参考资料》有关日本的几条消息的批语	122
(1959年6月)	
七律·到韶山	123
(1959年6月)	
七律·登庐山	128
(1959年7月1日)	
庐山会议讨论问题	132
(1959年7月3日)	
发展副食品生产	136
(1959年7月3日、4日)	
关于印发两篇论述经济工作的文章的批语	140
(1959年7月4日)	
粮食问题	142
(1959年7月5日)	
对张闻天关于国际问题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144
(1959年7月5日)	
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	146
(1959年7月5日)	
印发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的批语	147
(1959年7月5日)	
印发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的批语	148
(1959年7月5日)	

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49
(1959年7月10日)	
印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的报告的批语	150
(1959年7月10日)	
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51
(1959年7月10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八周年的电报	152
(1959年7月10日)	
统一认识，搞好团结，承认错误	154
(1959年7月10日)	
关于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给杨尚昆的信	155
(1959年7月13日)	
印发王青林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的批语	157
(1959年7月13日)	
对陕西省委召开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的批语	158
(1959年7月15日)	
关于改变庐山会议人员分组办法的建议	160
(1959年7月16日)	
关于请彭真等来庐山参加会议给刘少奇等的信	161
(1959年7月16日)	
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批语	164
(1959年7月16日)	
转发兰州军区骑兵一师关于政治争取工作总结的批语	167
(1959年7月16日)	
对西藏工委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会议情况和周仁山关于边境工作意见报告的批语	168
(1959年7月17日)	

印发《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的批语	169
(1959年7月19日)	
印发《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批语	170
(1959年7月19日)	
对一份关于苏联建设中遇到问题的材料的批语	171
(1959年7月19日)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72
(1959年7月21日)	
对国家计委商计局关于市场情况的研究材料的批语	173
(1959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的电报	174
(1959年7月21日)	
印发阿里分工委关于接管旧政权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76
(1959年7月22日)	
反对两种倾向，维护党的团结	177
(1959年7月23日)	
对《关于形势和任务》修正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191
(1959年7月24日)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193
(1959年7月26日)	
对日本首相岸信介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的批语	201
(1959年7月27日)	
在国务院秘书厅一份学习简报上的批语	202
(1959年7月27日)	
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材料的批语	203
(1959年7月27日)	

关于编印逻辑学文集给康生的信	205
(1959年7月28日)	
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	206
(1959年7月29日、8月1日)	
印发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等情况报告的批语	209
(1959年7月31日)	
印发广东省委关于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现象的材料的批语	210
(1959年8月1日)	
给周小舟的信	212
(1959年8月1日)	
给张闻天的信	214
(1959年8月2日)	
印发河南、湖北两省关于抗旱情况报告的批语	216
(1959年8月2日)	
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	217
(1959年8月2日)	
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	220
(1959年8月2日至17日)	
关于庐山会议简报上应一律称同志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	225
(1959年8月3日)	
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	226
(1959年8月5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批	
语和修改	228
(1959年8月5日)	

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230
(1959年8月5日至17日)	
印发《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的批语.....	233
(1959年8月6日)	
给刘松林的信.....	235
(1959年8月6日)	
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关于统一学员对人民公社认识的报告的批语	237
(1959年8月7日)	
对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稿的批语.....	239
(1959年8月7日)	
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稿的批语.....	240
(1959年8月7日至17日)	
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	247
(1959年8月10日)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249
(1959年8月11日)	
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稿的批语.....	251
(1959年8月11日至16日)	
给周小舟的信.....	253
(1959年8月12日)	
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254
(1959年8月12日)	
对辽宁省委关于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安排意见的批语.....	256
(1959年8月12日)	

对商业部党组关于支援抗旱、防洪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257
(1959年8月13日)	
印发鞍钢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经验的批语	258
(1959年8月14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	259
(1959年8月14日)	
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	261
(1959年8月15日)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262
(1959年8月15日)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265
(1959年8月16日)	
关于枚乘《七发》	269
(1959年8月16日)	
一次讲话	272
(1959年8月17日)	
给赫鲁晓夫的信	275
(1959年8月17日、21日)	
对张闻天来信的批语	277
(1959年8月18日)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	278
(1959年8月19日)	
对卡斯特罗关于发展中古关系的建议的批语	280
(1959年8月19日)	
中央转发青海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简报的批语	281
(1959年8月19日)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282
(1959年8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283
(1959年8月22日)	
《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文章	285
(1959年8月23日)	
对黄克诚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286
(1959年8月24日)	
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	288
(1959年8月24日、9月14日)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简报的批语	292
(1959年8月30日)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294
(1959年8月30日)	
对吴冷西报送的八届八中全会宣传计划和人民公社调查情况简报的批语	296
(1959年8月31日)	
印发《关于公社问题的材料》的批语	297
(1959年8月31日)	
在北京市委关于京郊涝灾和抢救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298
(1959年8月)	
关于阅看《人民日报》两篇文章给林克的批语	299
(1959年8月)	
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	300
(1959年9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电报	302
(1959年9月1日)	
在李富春关于国家计委等单位最近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304
(1959年9月2日)	
转发湖南省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	305
(1959年9月2日、3日)	
中央关于团结一切在我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的指示	307
(1959年9月4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	308
(1959年9月4日)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	310
(1959年9月4日)	
关于请班禅来京参加国庆问题的批语	311
(1959年9月4日)	
在西藏军区关于印军入侵雅斜儿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312
(1959年9月4日)	
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	313
(1959年9月4日)	
关于发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报纸对我八届八中全会报道情况的批语	314
(1959年9月4日)	
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	316
(1959年9月5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第二次简报的批语	317
(1959年9月6日)	

在反映有些省市揭发本地区个别高级干部右倾言行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319
(1959年9月6日)	
对苏联《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摘要的批语	320
(1959年9月6日)	
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	321
(1959年9月6日、10日)	
关于请郭沫若修改《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胡乔木的两封信	324
(1959年9月7日、13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电报	326
(1959年9月8日)	
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	328
(1959年9月9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331
(1959年9月11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333
(1959年9月11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工业交通进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341
(1959年9月12日)	
对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的批语	349
(1959年9月14日)	
在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上的批语	351
(1959年9月14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352
(1959年9月14日)	
为北京火车站题名	354
(1959年)	

关于肃反工作的一个批语.....	357
(1959年9月18日)	
在驻阿联使馆关于非洲人士对中印关系问题看法的电报上的批语.....	368
(1959年9月30日)	
在吴冷西关于充分报道国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反应的报告上的批语.....	369
(1959年9月)	
在肖华关于沈阳军区翻印毛泽东有关内部讲话的调查报告上的批语.....	371
(1959年9月)	
反对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372
(1959年10月1日)	
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不同于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	388
(1959年10月2日)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	390
(1959年10月5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397
(1959年10月5日)	
关于中印关系和达赖喇嘛回国问题.....	399
(1959年10月6日)	
在四川省委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401
(1959年10月6日)	
关于审阅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问题的批语.....	403
(1959年10月6日)	
在薄一波反映家乡人民公社情况的来信上的批语.....	404
(1959年10月8日)	
对河北省委关于解决水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405
(1959年10月10日)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406
(1959年10月11日)	
对陈伯达《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的批语	408
(1959年10月11日、16日)	
对石油部党组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报告的批语	410
(1959年10月13日)	
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问题的批语	411
(1959年10月13日、15日)	
关于推迟召开全国计划会议问题的批语	413
(1959年10月15日)	
对中央转发湖南整社试点经验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414
(1959年10月15日)	
对福建省委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简报的批语	417
(1959年10月16日)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	418
(1959年10月18日)	
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	421
(1959年10月22日)	
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问题的批语	425
(1959年10月22日、23日)	
关于研究广东对部分副食品实行派购办法的批语	427
(1959年10月23日)	
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428
(1959年10月26日)	
中央印发浙江省委关于各县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433
(1959年10月27日)	

在驻苏使馆关于赫鲁晓夫海参崴讲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440
(1959年10月)	
对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文情况报告的批语	442
(1959年10月)	
在驻罗马尼亚使馆关于与西方国家使节来往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	443
(1959年10月)	
对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的消息的批语	444
(1959年10月)	
七言诗·赫鲁晓夫访美	445
(1959年10月)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	447
(1959年10月、12月)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的电报	453
(1959年11月6日)	
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尼赫鲁的信稿的修改	456
(1959年11月7日)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关于财贸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457
(1959年11月10日)	
给柯庆施的信	459
(1959年11月15日)	
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的信	460
(1959年11月16日)	
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语	462
(1959年11月19日)	
关于随时选送有重要材料性文件的批语	463
(1959年11月23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464
(1959年11月28日)	
关于请彭德怀阅读有关文章的批语	466
(1959年11月28日)	
对李先念在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和给中央报告的批语	467
(1959年11月30日)	
对一九六〇年钢的增产量的估计	469
(1959年11月30日)	
对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斗争情况等三个材料的批语	470
(1959年11月)	
介绍王国藩人民公社	471
(1959年12月2日)	
关于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	472
(1959年12月3日)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473
(1959年12月)	
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	477
(1959年12月)	
对《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一文的批语	480
(1959年12月)	
对广东农村开展粮食分配问题的大辩论等三个材料的批语	481
(1959年12月)	
在《经济消息》第五十三期上的批语	483
(1959年12月)	

对两篇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材料的批语	484
(1959年12月)	
对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在河北、河南两省参观的报道的批语	485
(1959年12月)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的批语	486
(1959年12月)	
为查《焚书坑》一诗作者给林克的信	487
(1959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488
(1959年12月16日)	
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490
(1959年12月19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养猪工作大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492
(1959年12月20日)	
对冶金部关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钢铁工业远景规划草案的批语	494
(1959年12月)	
对四川江油县银行工作经验的批语	495
(1959年12月)	
对山西省委关于干部整风运动进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496
(1959年12月)	
对波兰《政治周报》主编谈波兰党内《令人不安的问题》材料的批语	497
(1959年12月)	
对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收支情况调查等两个材料的批语	498
(1959年12月)	

对《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文的批语	500
(1959年12月)	
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	501
(1959年12月27日)	
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生猪发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503
(1959年12月27日)	
在一份介绍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材料上的批语	504
(1959年12月27日)	
给钟学坤的信	505
(1959年12月29日)	

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 批语和修改^[1]

(1959年5月13日、15日)

—

加了一段^[2]，是否妥当，请加考虑，或者会谈一下。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上午四时

—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外交部对于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先生的谈话的答复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一答复稿上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三、四是毛泽东为印发并向有关方面通报杜德的谈话稿和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稿这两个文件而写的批语。

[2] 即本篇二。

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是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1]，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

[1] 1954年9月8日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即《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也叫《马尼拉条约》。条约声称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说它对于“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其实质是美国干涉东南亚国家内政，镇压这一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称霸太平洋的一个工具。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1977年6月30日，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1]先生。

三

即退周、陈^[2]阅办。

毛
十五日

四

总理、陈毅同志：

请考虑将印外交部4月26日来文^[3]，我外交部5月16日去文^[4]，发各驻外使馆、国内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在内），另印发在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2]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指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稿。

[4] 指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稿的答复稿，正式印发日期为1959年5月16日。

京各同志如前示，使他们了解中央对中印关系的方针。另叫潘大使^[1]找高士^[2]同志阅读这两个文件一二遍，或径找给之。另召集兄弟国家大使在一处，向他们宣读、讲解一遍这两个文件。是否可行，请酌处。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下午六时

另叫陈家康^[3]找尼赫鲁大使^[4]向他宣读二文件，可缓三几天。

-
- [1] 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 [2] 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
 - [3] 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
 - [4] 指前任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

接见智利政界人士的谈话纪录（摘录）

（1959年5月15日）

教人是很好的事情，跟学生保持关系，是很愉快的，特别是当大学教授。要研究学问，就要当教授。

我有几篇哲学著作，就是因为教书需要我写，我才写的。因此当教授是好的。要备课，就要自己写讲稿，不用人家的课本最好。学生逼你上课，你总要贩卖一点东西。我现在还想当教授，现在正如你们所说的，我的知识增加了，可能当教授，或是讲师或是助教。

中央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关于执行中央农业指示^[1]的通知的批语

(1959年5月19日)

—

这个文件^[2]有参考价值，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5月7日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

[2]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1959年5月14日给各盟市委、旗县委并报中央的这一报告说，自治区党委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和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后，认为完全符合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对于几个具体问题规定如下：一、关于扩大播种面积问题。要尽量扩大农田播种面积，争取大面积丰收，提高总产量。要按照“八字”方针，订出各项增产措施，妥善安排劳动力。二、关于包产问题。包产既必须实事求是，又必须鼓足干劲，把指标订立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基础上。三、关于喂养猪鸡鹅鸭和分配自留地问题。要宣传中央关于集体和家庭养猪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社、队应扶助社员养猪，完成任务后，宰、卖自由。自留地应在五月份安排到户。

—
—

刘、邓^[1]阅，尚昆^[2]办。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的批语

(1959年5月21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阅，请书记处召集北京市委，对市场供应问题，讨论一次，如何？

毛泽东

五月廿一日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1959年5月19日编印的《简报》第四十一期上登载的《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这个材料反映了北京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

对李先念^[1]关于粮食问题的 报告^[2]的批语和批注

(1959年5月22日)

—

小平^[3]同志：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 指李先念1959年5月3日下午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关于粮食调运问题。三季度粮食调出计划，各地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推迟。第二，关于农村夏季粮食分配问题。在秋粮收获以前，农村每人留用夏粮，一般按照一百斤左右计算。第三，关于夏季粮食收购问题。国家应尽可能多购一些粮食，但不能收过头粮。第四，关于粮食销售问题。在城市，经过压缩以后的销售水平，在秋收以前不再提高；在农村，新粮登场后，国家基本上不再销售。粮食销售历来放易收难，因此秋冬紧一点，青黄不接季节就好过，工作就主动。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第五，关于粮食库存问题。省里挖了中央的库存粮食，要用中央规定的包干差额以外的粮食弥补。第六，关于储备问题。今后除正常的周转库存外，中央和省都必须搞点储备。第七，关于通过公社搞好购销问题。粮食购销都应该通过公社，指标基本分配到队，公社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第八，关于出口问题。粮食出口任务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的，要加在第三季度的任务内一并完成。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此件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照办^[1]。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

毛注：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2]

[1] 195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将李先念的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 李先念的报告中讲到：“四川提出工农商并举，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对江苏省重新布置 钢铁工厂建设的批语^[1]

(1959年5月23日)

少奇、小平同志阅，请小平与陈云、王鹤寿^[2]两同志商量，用

[1] 国家计委委员范慕韩等1959年5月16日给计委党组并李富春主任写信说，我们到江苏各地了解钢的生产情况后，感到江苏省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完成得不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建设铺得太大、太多，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一个个地上，因而6个新建钢铁厂现在都还是“半拉子”，不能开始生产。现在江苏省委对这6个钢铁厂的建设已经重新作了布置：先保证把常州钢铁厂尽早配套投入生产；在上海帮助下把南京钢铁厂和无锡钢铁厂配好套，争取在7月份投产；其他3个钢厂暂停建设，把已有设备调剂给上述3个厂使用，下半年看情况再考虑这3个暂停厂的安排。我们认为江苏这样做是正确的。集中力量，保证钢铁厂一个一个地上，而不是一拥齐上，会大大减轻建设和配套的压力，也有利于保证钢的增产。这种情况并不是江苏省独有的，看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省钢铁厂的建设安排，真正做到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这是保证今年钢产量的有效措施。李富春5月22日将这封信转报中央、毛泽东，并附信指出，他认为江苏省委决心对钢铁工厂的建设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布点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建议冶金部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省市也采取这一措施。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央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1]。

毛泽东

五月廿三日

[1] 邓小平1959年5月26日代拟了中共中央指示，将李富春的信和范慕韩等的信一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对赵尔陆^[1]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 几个问题的意见^[2]的批语^[3]

(1959年5月30日、6月17日)

[1] 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2] 赵尔陆的这一报告主要讲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问题。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主因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各方面的要求分开看，似乎都可能达到，但加起来就超出了客观可能性。工业生产是一个大协作，各工业部门和整个工业内部，都是彼此依赖、互相制约的。因此，计划的制订必须有细致的综合平衡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看出计划指标是否适中，能否实现，才能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发展。在安排生产时，根据国家需要，保证重点是必要的，但重点也只能体现在一个年度或更长一些的计划中，孤立地保证重点，重点也突不上去。综合平衡工作，是一个反复过程，必须逐级做起。二、工业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统一性问题。当前这三者之间有畸轻畸重和脱节的现象，一般是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其实这三者是联系着的，不能单纯强调一面，忽视一面。当前是否可以这样提，即争取在一定数量基础上，要求即或少些，也要全些，也要好些。三、关于制造和修配问题。修理和制造固然不能截然分开，但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形成一个维护和修理系统。过去制造和修理之间有脱节现象，必须加以弥补。

[3] 本篇一写在赵尔陆1959年5月26日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本篇二、三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6月15日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的这一报告上。

—

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二月六日修改发出的那个今年计划的文件）^[1]，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对所谓有计划按比律〈例〉的发展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类不会做工作的同志，在全国可能有半数以上。特别坏的，可能有百分之二三十。这是一个大教育工作，期以十年，可能相当做好我们国民经济。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当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我不向同志们封锁我的意见，同志〔们〕对我封锁，我是大不高兴的，过去的封锁，必须改正。

毛泽东

1959年5月30日

[1] 指国家计委党组1959年1月25日提出、2月6日修改发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二

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

毛泽东

1956年6月17日

三

刘、彭真^[1]阅后，尚昆^[2]办理。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妥善解决修筑临淮冈拦河水库 引起的矛盾问题的批语

(1959年5月31日、8月5日)

—

少奇、小平^[1]同志阅后，送交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

请水利部考虑派一位副部长级、有政治头脑、又有技术经验的党员同志，携此文件^[2]去济南先找谭震林^[3]同志（谭现在在济南），同他商量一下，因为这件事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时由谭与曾希圣、吴芝圃^[4]三同志会商决定的。然后去合肥，与曾希圣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去临淮冈现地加以调查，看情况究竟是否确如淮滨县同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淮滨县委、县人委关于安徽修筑临淮冈拦河水库不按标准施工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河南省淮滨县位于淮河中游，地势低洼，解放前洪水为患，解放后水患解除，群众歌颂为二次解放。安徽这次于临淮冈修筑拦河水库，不按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标准施工，工程设计超过原定规定，将会扩大中上游淹没区，使淮滨县蒙受重大损失，群众极为忧虑。电报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要求和条件，并强调水库蓄洪水位不得超过原定的25.3米。

[3]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志们所说那样，如果有必要召开会议的话，就召集两省水利当〈厅〉局级或副省长级各一人，淮滨县、临港县、临淮冈水利工程局各来一二人，开会妥为解决。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

—

尚昆^[1]：

此件^[2]应抄一份给吴芝圃同志。

毛

八月五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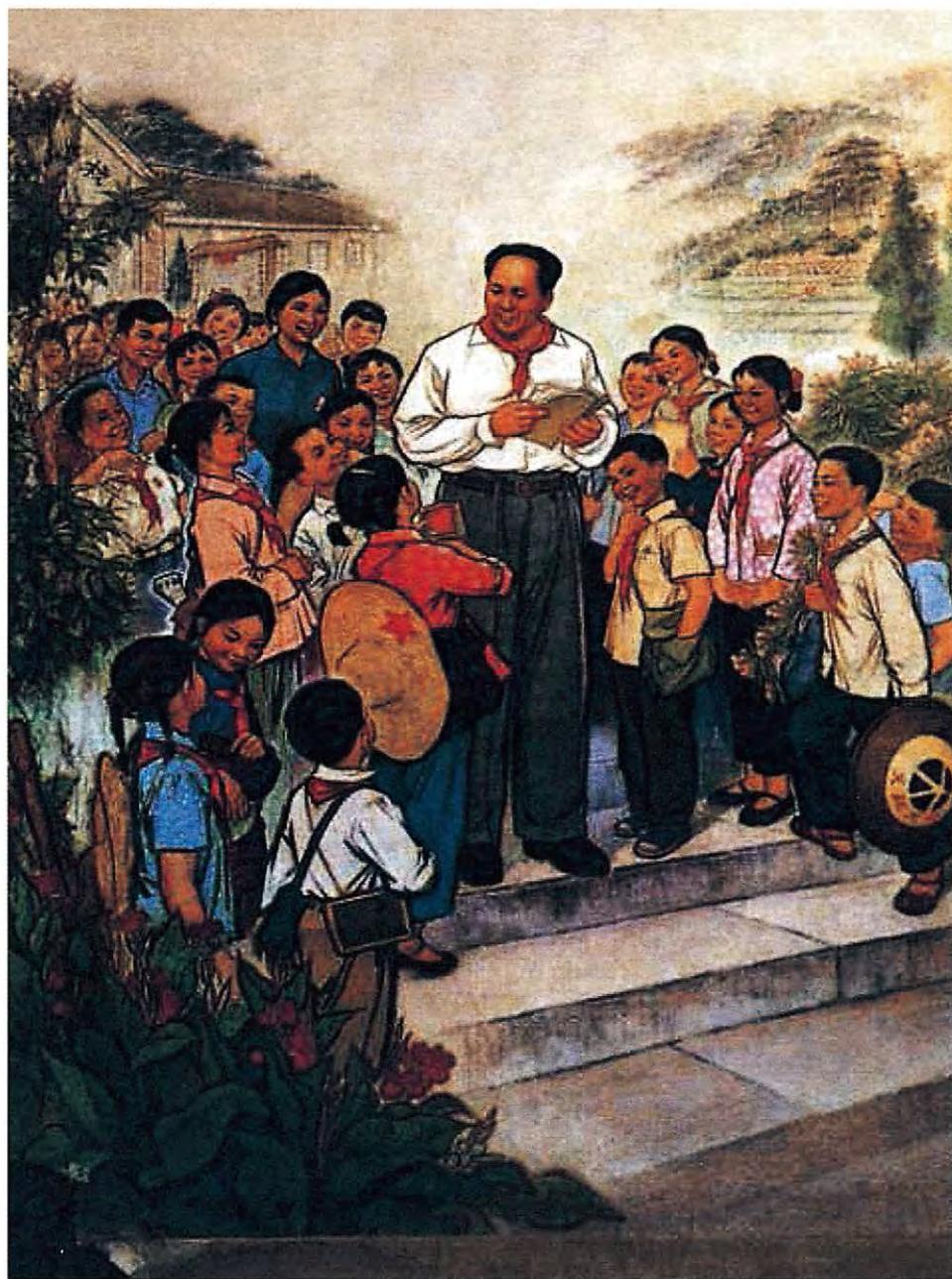
[2] 指中共安徽阜阳地委1959年7月2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省委转来河南省淮滨县委给主席的报告，水利电力部又决定要推迟建设临淮冈水库，因此将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向你作一个报告。淮滨县给主席的报告中，提到水库的蓄洪水位不能超过25.3米。若如此，即使像1954年的洪水都能把水库冲垮，更不要说比这更大的洪水了。因此我们认为淮滨县委的报告是不合理的。至于水利电力部决定推迟修建工程，我们认为是没有理由的。这样做，在经济上和生产上都会带来极大的损失，也不好向群众做解释工作。此后，1959年10月15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安徽省委并河南省委的指示中指出，临淮冈水库工程问题，在庐山已经初步谈过，最近水电部又召两省同志交换了意见，对修建这一水库并使之具有相当防洪能力，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争执的是水位如何确定的问题。为不耽误工程进行，我们同意安徽省可以在今冬按原设计修建控制水闸，并留出扩建的地方。在蓄洪水位未达成协议前，土坝坝顶应不超过25米。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中国画)



《关怀》(中国画)



《向毛主席汇报》(中国画)



《向毛主席汇报》(中国画)



《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成绩》(中国画)

转发青海省军区海南指挥部党委 关于平叛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 几点意见的批语^[1]

(1959年6月2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部1959年5月28日转发的青海省军区海南指挥部党委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平叛、生产两大工作的安排问题。凡平叛任务较大的地区，应以平叛为主，在此前提下安排生产；叛乱基本平息但仍有残匪地区，应以生产与平叛并重；叛乱完全平息地区，在抓生产的同时，也要进行平叛斗争的宣传和阶级教育，积极做好支前工作。总之，不论以生产为主，还是以平叛为主，二者都应该统一起来，互相促进。二、关于对降、俘之敌的政策问题。（一）对投诚叛匪与战场俘虏应有严格的不同对待。（二）除阴谋叛乱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最好不捕；非捕不可时，也要明捕、少捕，减少社会震荡。（三）尽快作一次案件清理工作，将错捕错判纠正过来，恢复和扩大政策影响。（四）案件检查应以改正错误、教育干部为目的，只对情节恶劣、错误严重的个别人才作组织处理。三、关于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问题。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实质上就是争取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目前必须注意：（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加强群众政治思想工作；（三）改善基层干部作风；（四）允许群众进行公开正当的宗教活动，尊重藏民风俗习惯。

—

克诚、谭政^[1]同志：

海南指挥部党委这个文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请你们用军委名义转发西藏、成都、昆明三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平叛部队党委及地方党委，结合当地情况，加以研究，采纳施行。

毛泽东

六月二日

—

此件先送少奇、小平^[2]同志阅，再送克诚办理。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转发辽宁省委推广 “包米食用增量法”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9年6月3日)

—

各省、市、区党委：

辽宁这个经验^[1]，可供你们研究和试行。并请你们研究，别的粮食是否也可以采用辽宁对包米那样的做法。在研究、试验和推广任何新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中央

1959年6月3日

[1] 指中共辽宁省委1959年6月1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关于黑山县创造“包米食用增量法”的经验。辽宁省委的报告说，黑山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队食堂创造了一种“包米食用增量法”，就是先把包米煮到约六成熟，然后磨成汤子面，再做成饽饽和各种饭食。其好处是：（一）提高了包米出饭量，节约了粮食。（二）提高了包米饭的质量和营养价值。（三）讲究卫生，好消化，饭食花样多。（四）保证社员吃饱吃好。

二

刘、邓、林、彭真^[1]阅，尚昆^[2]办。

毛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重印《逻辑指要》一书^[1] 给章士钊的信

(1959年6月7日)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2]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一七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

[1] 《逻辑指要》是章士钊1917年的旧著，1943年在重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1959年5月曾为此书写过一篇再版序言（后未采用），谈到该书再版的由来时说：“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 可能指金岳霖写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载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五期。金岳霖的《逻辑》一书也列入《逻辑丛书》，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收进了这篇文章。

关于重印《逻辑指要》一书给章士钊的信

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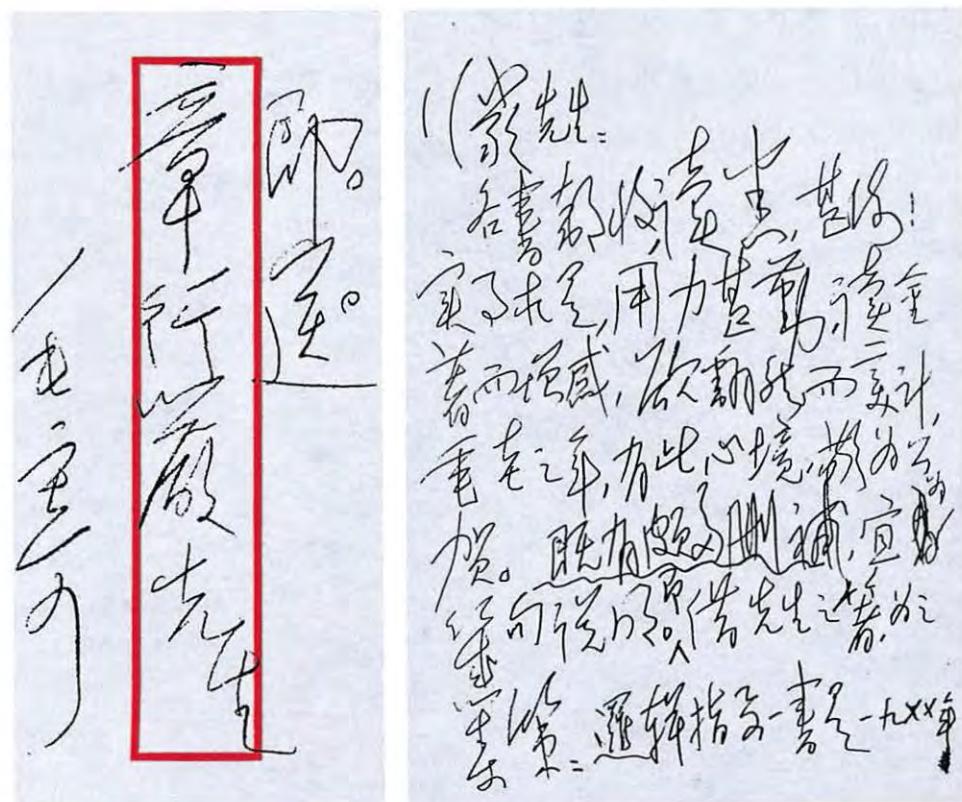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

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4〈6〉月7日，上午八时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

高作。一九五九年四月
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
学之书，拙作在徵用中。
拟是以十天来，即自按勘一稿。
因原稿不轻交，恐蒙极吃
力。金稿计划多不合时宜，约二十
之，增补以厚之，都去附于左篇
例证，能使该书稍成规模。

而已。近来以逻辑一学作为
了字所累的甚大，如逻辑
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形而上
学的割裂，中西学的割裂，
对些，未被采纳，殊亦不足为
外伤。著作重印，不敢说
对方之逻辑学论有研辟差，
作为参考书之一，或此意能引他

毛泽东致章士钊的信的手稿
章士钊之言明白，别不膺
其否，特此说明！
一九五九年六月八日
章士钊
五年，我清有很大变，予变如何？先如军不言变这样办，
我建议如此办。

我害了一个月腰背，病愈
后，尚以为好。但因细读，
想方略，传统中医，
恐不能治。

毛泽东

1959年6月10日上午八时。

毛泽东致章士钊的信的手稿。

对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 当前算账和生产安排问题报告的 指示稿的批语^[1]

(1959年6月)

即送刘、彭真^[2]阅后，尚昆^[3]用电报发去。

[1] 中共甘肃省委1959年6月2日给中央并毛泽东写报告说，目前我省的算账工作正在全面铺开，经过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充分认识到算账问题的重要性。省委认为有必要在6月份继续扎实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全民算账的群众运动，用党的政策兑现洗去农民心头的不满，用深入的政治工作恢复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扭转当前的紧张局面。关于生产方面，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坚决、认真地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和毛主席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迅速地把党的有关具体政策贯彻下去。6月3日，甘肃省委又向中央报送了临洮县算账成效显著，18天内粮食供应量逐日下降的情况报告。6月8日，中央将甘肃省委的这两个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出甘肃省委的意见是对的，这种按照本省实际情况办事的精神应该提倡。至于一省之内，由于各专区、县、社的情况不同，办法也可以不同，不必强求一律。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中央这个指示稿上。

[2]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意陈云^[1]因病休养的批语^[2]

(1959年6月8日)

—

刘、邓、彭真、周^[3]、陈云同志阅，存尚昆^[4]处。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职务由李、宋代理是适当的。

毛泽东
六月八日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2] 陈云1959年6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写信说，他因病躺了两个星期，现稍能走动但说话困难，医生认为要三个月才能有所恢复，他拟同意休养三个月，并提议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职务由李富春代理，国家建委主任职务由宋劭文代理。本篇一是对这封信的批语。陈云在信中还谈了准备同意离京休息三个月的考虑和在离京前拟找财经小组几位同志谈一下市场问题与明年计划的方法问题的打算。本篇二、三是对这两个问题所作的批注。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指周恩来。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放心休养，不要顾虑。

三

说话困难，不谈为宜。



1959年五六月间，毛泽东采纳了陈云的建议，进一步压缩钢产量指标，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1800万吨降到1300万吨。图为1959年夏天的陈云。

对中央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稿^[1]的批语

(1959年6月9日)

少奇同志阅后，尚昆^[2]用电报发去。

毛泽东

六月九日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为中央代拟的这一通知稿说，中央决定于6月18日在上海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郊区农副业生产方针、如何更迅速有效地达到副食品供应自给、半自给以及如何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等问题，请各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农业书记及管手工业的同志一人到会，会议定为五至六天。毛泽东对这一指示稿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加入了关于手工业生产问题的内容。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央转发廖鲁言^[1]关于召开 十四个城市蔬菜会议情况 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2]

(1959年6月9日)

少奇同志阅后，尚昆^[3]用电报告『告』发去。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廖鲁言1959年6月3日给毛泽东、中央写报告说，5月底召集了北京、上海、天津等14个城市的蔬菜会议，了解到城市蔬菜供应仍然紧张，需要继续做好以下工作：（一）近郊区的农业生产方针应“以菜为纲”。（二）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标准能保证每人每天一斤，就算很好了。（三）要注意从土地、劳动力、运输条件、种子、水源等方面来落实城市蔬菜生产计划。（四）城市商业和农业部门应组织有关方面订立蔬菜产供销合同，共同保证按合同供应生产资料。（五）蔬菜供应机构的从业人员不能太少。（六）有些销行全国和外销出口的名菜，要专门组织生产基地。（七）猪、鸡、鹅、鸭、鱼、虾的生产必须尽力发展。1959年6月9日，中央将廖鲁言的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各大、中城市市委，指出报告所提各项意见是正确的，希望各地切实抓紧夏菜和秋菜的生产，抓紧副食品的生产，做好产供销工作，力求早日缓和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局面。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中央这个指示稿上。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转发兰州军区司令部关于五月份战果 综合通报的批语

(1959年6月10日)

克诚^[1]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西藏、昌都、成都各地，请酌处。

毛泽东
六月十日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兰州军区司令部1959年6月6日的这一综合通报说，5月份全区各平叛部队共作战□□□次，歼敌□□□□名，其中招降和战场投降的叛乱武装占歼敌总数的50%。这说明叛乱武装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只要我们能够抓紧政治争取工作，就能将大量叛众争取回来；对于有些叛首，经过反复交待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也是可以争取其投降的。

对江苏涟水县一封来信^[1]的批语

(1959年6月10日)

转寄江苏省委江渭清^[2]同志一阅。

毛泽东

六月十日

[1] 指《中国青年报》编辑部1959年6月8日转达的江苏省涟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的来信，信中反映了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弄虚作假，干部作风恶劣，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实际情况。

[2] 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

(1959年6月11日)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二十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秘鲁议员团谈话的一部分。

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来往，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

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1]。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0.04%，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0.037%，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

[1]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对上海市委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 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6月11日、13日)

—

尚昆^[2]:

本日看到上海市委六月六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我认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文件。(一)请你即刻通知常委(不通知小平、陈云^[3])在京各同志(共5人^[4])，富春、一波、先念、陈毅、德怀、克诚、子恢、廖鲁言、叶季壮、姚依林、程子华、王震、邓洁、贾拓夫、宋平、余建亭、宋劭文、彭真、李雪峰、刘仁、天津万晓塘、河北林铁、陆定一、康生、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吴冷西、李锐、王稼祥^[5]，共计36〈35〉人，请他〔们〕立即阅读上海这个文件。未发给的，请你立即发送。限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读完，并且想一想，同自己的秘书及一二个同事谈一谈。以便六月十二日下午召集他们到会，由我主持。(二)请你告李先念同志，叫他在两日内替中央写一个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的指示〕^[6]，附上上海这个文件，转发他

们，一律仿照执行。此转文写好先给我看一下。此信，你办完后，送刘、周、林、彭、^[7]彭先念、陈毅六〈七〉同志一阅，然后存你处。

Good morning!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上午七时，倚枕书。

—

刘、周、彭真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

毛

十三日

[1]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9年6月6日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今年以来，上海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市场的基本情况。1.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去年下半年即感不足，今年春节后更显紧张。2. 日用工业品市场基本是稳定的，但部分商品一直紧张，现在仍供不应求。3. 上海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总值上升是快的。（二）在大跃进以后出现这样大紧张局面的原因，除了客观上存在着生产发展赶不上人民需要和购买力增长的矛盾外，还有工作上的原因：第一，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购买力有很大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很不正常的。第二，在生产的全面安排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致一部分产品被挤掉

了，一部分产品被浪费掉了。第三，财贸工作中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点。（三）我们决定采取的措施：第一，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大搞副食品生产，力争今年有所改善，明年部分自给，后年光景更好，能更多自给。第二，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千方百计克服原材料困难，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扩大品种，支援全国市场需要。第三，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从各方面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的压力。第四，切实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目前，迫切需要在群众中广泛展开一次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宣传运动。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正因伤休养。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正因病休养。

[4] 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5]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华，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王震，当时任农垦部部长。邓洁，当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贾拓夫、宋平，当时均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余建亭，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宋劭文，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万晓塘，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报》总编辑。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6] 中共中央1959年6月13日下发的这一指示指出，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外乎是增加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厉行节约，压缩社会购买力；做好商品购销工作，改善经营管理。上海市委的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中央方针的具体化。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生产，抓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措施，上下一齐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本篇二就是对中央这一指示稿的批语。

[7]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彭，指彭真。彭，指彭德怀。

对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1]的批语、修改和代拟的补充指示稿^[2]

(1959年6月)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1959年6月9日晚12时送审的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充分利用零星闲散土地和鼓励私人植树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中央建议各县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所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但社员要保证不耽误集体生产的出工数。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还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数量仍按原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也不少于5%为原则，质量相当于原来归公的土地。自留地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不得出卖、出租或私自转让。第三，鼓励社员利用空闲时间把零散土地利用起来，收入由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指示稿说，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可能同集体生产、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应该通过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正确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6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委直至生产队党支部下发了这一指示。

[2] 本篇一是对这一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这一指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本篇三是代拟的补充指示；本篇四是这一补充指示稿的批语。

—

即送刘、周、林、彭真^[1]阅，尚昆^[2]即刻用电报发去。此件是我同邓子恢、李先念、廖鲁言^[3]三人商好后，由廖、邓起草的。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

—

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

三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甘肃省委和吉林省委对于中央六月十一日关于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规定，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按照各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地实际情况，在各县出布告时允许作某些改变。中央认为这是可以的。中央认为只要不违反六月十一日指示的根本精神，应当允许各地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修改。

中央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

四

即送刘、周、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子恢、震林^[1]、鲁言一阅。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三时

[1]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关于重新建立 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59年6月12日)

刘、周、彭真、一波^[2]阅，尚昆^[3]办。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959年6月10日送审的这一中央指示稿说，手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注意恢复和发展，必须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进行工作。为此，中央决定在轻工业部之下，重新建立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合并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在工业厅之下建立手工业管理局，各专署、县也应建立相应专门机构。有经验的管理手工业干部必须归队，以加强手工业管理。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问题^[1]

(1959年6月13日)

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定得高了，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中，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我在上海说过，我们党究竟有没有群众路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没有经验？看来，群众路线是有的，但有一个时候可以说没有。比如吹“共产风”，这不是群众路线吧！现在一算账，一退回，还是以队为基础，这就合乎群众的意见了。过去一层听一层，一级听一级，横直是那么听，就是不听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意见可难反映上来。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2000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在1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本来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定的1650万吨的指标还不可能，转成现在的1300万吨更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农业究竟增产多少？河北是增产三成，即30%。究竟有没有三成，我还怀疑。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

[1] 这是毛泽东在他召集的有少数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根据记录稿整理）。

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

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至于要不要钱，一种人是吃饭要钱，一种人是吃饭不要钱。老、弱、五保户不要钱，其他的要钱。如果都不要钱，结果会是老弱在家吃饭，壮者出门赚钱。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谈。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

再有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乔木同志有个意见，跟我谈过，要再研究一下，看怎么逐步转过来。原来那么高的指标，现在吹了，不要了，宣传上怎么转？我们不能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2000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人的头脑有时候有一点昏也是难免的，有什么要紧？第二天就清醒了。（周恩来：现在人家说中国的数目字不可信了。）我们要让中国的数目字可信，现在不信，以后还是要信的。农业以后不要报账了。苏联的办法就是不报账的，他只报征购的账，全年产多少他就不报。

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按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五六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因为五七年降低了，五八年才有可能跃进。五七年不降低，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

人为的紧张，每天这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现在鞍山的工人几个月没有吃肉了，粮食都是吃包谷，没有麦子，这样的情况要改变。要休息一下，要增加一点肉，粮食由包谷改成高粱，还要有些别的副食品。重工业劳动，没有粮食，没有肉，怎么行呢？

支援农业的问题，刚才谈了。这个问题过去有缺点，现在要搞个机构，管机械、化肥和水利。

新问题不断会出现，要随时准备。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会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这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

最大的成绩，是从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比如我这个人，在北戴河会议以前，报纸上关于工业的消息我看不进去，党内办工业的文件我被逼看一下，兴趣不大，主要注意力是搞社会关系，像整风反右，那些属于革命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没有注意。现在工业方面的文件、报纸我开始看得进去了。政治局、书记处、各省委书记，也是从去年9月起注意搞经济了。权力下放也是我们干的，那个时候好像是权越放得多越好，现在又收回了相当一部分。人权、财权、商权、工权都要收。原来叫大家上马，结果多少人骑在了马上下不来，现在我看一直到公社都要控制。现在是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半无政府主义。王鹤寿跟我谈，薄一波等也跟我谈，说过去我是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周恩来：主要是小高炉和小转炉。）煤的账不算，焦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

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只能是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

最大的胜利就是认识到这些失败问题，就是这些主观主义，就是这些只注意高炉、平炉的设备而不注意煤、焦、耐火材料、运输等等。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比如煤的问题跟农民有关，可是只搞工业用煤，农民需要的煤没有，名为支援农业，结果农民需要的煤没有，机器、化肥、水利都没有。最大的成绩是抓了工业，虽然出了些乱子。今年抓得比去年早几个月。去年是8月下旬才抓生产，实际抓是9月，9月到12月，实际只抓了4个月。现在是6月13号，今年还可以抓7个月，这7个月就要搞平衡。这一套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我们过去历来搞的是革命，没有搞过建设。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们是专家，而是说我们多数人没有搞过建设。各省委书记没有搞，我也没有搞，因为顾不过来。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才搞这些事。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败仗，从这里学到了好经验，因为吃了亏嘛。现在的问题不是怪这个怪那个。现在我们的情况已经好了，指标已经落实了，这方面的主观主义已经不很多了，比较接近实际了，现在来讲这个话我看是更有把握了。现在粮食开始上市了，蔬菜上市了，鸡也长大了。现在又要抓猪肉，抓副食品，抓日用工业品。先念同志16号就要去上海开会，出了乱子就抓。我们历来是这样。出了乱子，共产党一抓就好了。

要政治家办报^[1]

(1959年6月13日)

现在名气很糟。去年大出风头，今年不好，说我们是纸老虎，不讲信用。

这很好。

不仅敌人，而且朋友^[2]也觉得我们不行。去年名气很大，人人怕我们，不但美英怕我们，很惊慌，朋友也怕，他们也感到了压力，为什么能这么跃进？现在不太怕了。英国说，三十年内中国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朋友还说，中国不是高速度，说话不那么拘谨了。我们自己不那么神气了。

去年三月，我在成都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去年从九月开始一直被动。大家头脑发涨，要搞四亿吨钢，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一月到郑州才发现，我狠狠批评了一下。当时大家都在风头上，要把指标从三千万吨落到二千万吨，也难。我在武汉会议上曾提，不要搞一千八百万吨也好，一千五百万吨也成。马克思写《资本论》一百年了，看来经验要自己取得。法则不能违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三版。过去学了就完了，谁也没有注意价

[1] 本篇是毛泽东和吴冷西谈话的一部分。

[2] 朋友，指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值法则，违反了它就头破血流。

现在失了信用，不要紧。苦战一年，再加一年。那时宣布跃进成绩，现在不要更正，将来再说。

《人民日报》办得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吹得太大，有办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办成中央社的危险。

《人民日报》，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内部参考》是个好刊物，要改进，不要只看现象。大局在《内部参考》。怎样把《内部参考》变成报纸，是你们的工作。

《新闻工作动向》是好刊物。有一期反映了日本专家的意见，这很好。太照顾对象也不好。要吸引人看，要吸引人听。《新闻工作动向》上地方报纸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多反映。有的读者反对《解放日报》的编辑，读者是对的。口径不一致，是《解放日报》对还是毛主席对？^[1]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完全可为我所用。^[2]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

[1] 这里所说的材料，都发表在《新闻工作动向》第四十五期上。

[2] 参见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原文是：“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我在江西苏区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王明讥讽我。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那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反而可以多读点书，我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

你们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

对西藏工委关于进藏人员计划的批语^[1]

(1959年6月15日)

已阅，退彭^[2]。西藏十三万人的计划太大，中央没有批准。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下午十时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9年6月15日10时送毛泽东审阅的一份情况简报上。简报说，西藏工委曾对西藏目前情况和今后改革中的政策问题作过专门研究，并估计到今年年底，进藏人员将从平叛作战前的2.2万人增加到13万人（部队8万、地方5万）。毛泽东的批语，是针对简报中的这一数字而写的。

[2] 彭，指彭德怀。

中央转发陶铸关于从社员代表大会中 接触到的一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6月17日)

—

此件^{〔1〕}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1959年6月17日

[1] 陶铸1959年6月15日给中共广东省委并转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中山县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已在全县铺开，现将我参加该县张家边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报告如下：（一）要解决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等影响群众情绪的问题，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二）张家边群众对夏收后留够口粮的要求非常强烈。（三）对供给制和食堂的存废问题，必须迅即加以合理解决。（四）去年晚造和今年早造期间，由于在农业生产方针与技术措施上某些不当造成的群众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如何加以彻底消除，是改进目前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必须使体制下放彻底，给予个人一定范围内的小自由，并迅速宣布固定不变。这是目前安定农民生产情绪与提高生产积极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报告说，上述这些问题，在张家边有的解决了，有的还没有解决。要彻底解决问题，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社员代表大会真正充分发扬民主、暴露问题、全面分析、讨论彻底。

—

刘、彭真、震林^[1]阅后，尚昆^[2]办。

办后，退江青阅。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第三版)的批语

(1959年6月17日)

尚昆^[1]同志：

此书^[2]字太小，本子太重，现分订为五册，请用新华社现出的《内部参考》，或者宣传部出的《宣教动态》那样的大号字付印，印200本，分送中央一级、省市区党委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阅读，首先送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每人一份。另请给我四份。一个月内印出。请酌办。并请告少奇、彭真^[3]、恩来同志。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文译本。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

(1959年6月20日)

乔木、冷西^[1]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2]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时

[1] 乔木，即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1919—2002），广东新会人，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6月18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〇一期。这一期登载了《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

转发张体学^[1]关于湖北分粮到户等情况汇报的批语

(1959年6月20日)

此件^[2]请尚昆^[3]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研究。粮食要分到户。另要大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恢复手工业。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

[1] 张体学，当时任湖北省省长。

[2] 指张体学1959年6月16日晨关于小麦入库、分粮到户及抓手工业等情况的电话汇报。张体学说，湖北的小麦已快打完了，入库进展不算很快，正在抓。粮食以人分等定量到户后，情况大变，小队干部和农民欢天喜地，大队和公社干部仍有些不通。现在省委决定直接与群众见面了。可以办得通。渔民已经归队不少，湖里开始有人捕鱼了。抓了一下手工业之后，产品有所增加。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将这一电话内容转报周恩来。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先念的报告上。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转发洪学智、张国华^[1] 关于西藏山南地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6月20日)

此件^[2]请尚昆^[3]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各军区。另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

[1] 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国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2] 洪学智、张国华1959年6月15日给中央军委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的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山南是西藏地区靠近边境的一个农业区。寺庙、贵族、政府三大领主除通过占有土地进行剥削外，还以各种不同名目向群众掠夺。二、目前在山南流窜的股匪约1000多人，主要是外区逃来的和本区少数坚决与我为敌的骨干和分子。活动特点是：(1) 在军事上化整为零，分散隐蔽；(2) 在政治上采取一些新的蛊惑人心的破坏方式；(3) 在组织上通过三大领主在各地的代理人或明或暗地控制群众。三、山南群众总的情况是好的，能积极支援平叛，进行生产。四、根据当前敌人活动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目前清剿的方针应是放手发动群众，政治争取结合军事打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和吴芝圃^[1]等人的谈话

(1959年6月22日)

吴芝圃（以下简称吴）：从去年麦收以后到春节，吃粮都没有计划。

□□□：乱吃乱调，无代价的。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认识是逐步深入的。

□□□：当时干部头脑也很热。

毛：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齐热，一热就充公。

吴：群众也不摸底。

毛：有一些所谓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他们是老实人。那些人比我们厉害，他们说：“这样吃不行！”这个教训大啦，有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哪一件事情触怒了群众呢？就是刮“共产风”。

□□□：九、十两个月刮得厉害，到十一月就恢复了，到十二月那个路线就基本纠正了。

毛：刮过来容易，刮回去就难。河北省下了一个命令，三天之

[1] 吴芝圃（1906—1967），原名吴殿祥，河南杞县人。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内大车一定退回，不然撤职，说倒是说通了，就是不退。有一个区的党委书记说，我是拣坏的下放了四次，比如有一千辆大车，下放几十辆，都是不好的，其他都留下。说要撤职，几天工夫统统下放了。你们要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不要用不退就撤职的办法。

工业就是一个综合平衡问题，不能搞了这样，丢了那样。比如，搞钢就要铁，搞铁就要焦炭，焦炭还要看是什么焦炭。现在这种铁的规格不能持久，只能是一种过渡。含硫量零点二不行，零点一就应该是不合格。要逐步做到比如只有零点零五、零点零六、零点零七、零点零八。

明年钢恐怕要来一个“马鞍形”。所谓马鞍形，也是还要增加，不是不增加。今年是三千不行到两千，两千不行到上海的一千六百五十，现在是一千三百。假如做到，或者超过一点，那末明年搞多少呢？明年可能只能搞一千七百万吨，连今年人民代表大会的指标还达不到，也可能今年一千三百万吨，明年增加五百万吨，一年的指标两年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还有两年，后年还可以搞四百万吨，就是两千二百万吨，再有一年，两千六百万吨，就超过英国了。要把质量搞好一点。有些省，比如河南、安徽，一般说来是工业不发达的，现在已经是很快了，太快了我看搞不巩固。

□□□：工业比农业还被动，铺的摊子很大，结果是计划以外的、计划以内的都不行。

毛：不许有计划外的，不管县的工业，还有什么工业，都要纳入计划。

学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没有这场风，谁也不说去学。阎锡山的口号叫做按劳分配主义，他是欺骗人的，可以参考利用。

真正搞工业，就整个党中央同地方来说，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的。这不是讲你（可能是指杨蔚屏——记录注），你搞了多年了。也不是讲工业部门，三个委员会和各部。书记处抓这件事，中央抓这件事，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各省恐怕也都是这样。大办钢铁，将一军。农业抓得早一点，但是农业中间的问题不懂得的还甚多。

吴：去年这一年对农业好处很大，碰了一下子，碰出好多经验。适当密植普遍得到了证明，密植多了不成功。还有适当地上肥料，适当地浇水。现在证明，深翻只要一尺左右就可以了，就是拿一尺一二的一个铁锹铲那么一锹就可以了。肥料不像过去说的越多越好，多了吸收不了，不需要五万斤、十万斤肥料；有一万多斤、两万斤粗肥，再有一点细肥，就可以丰产了。

毛：就像人吃饭一样，吃多了也要死人。肥料主要一条是靠养猪，将来能不能办到一亩一猪？

吴：第二个五年计划有希望一亩一猪，今年猪可以达到三千万头，我们有三百多万头母猪。

□□□：饲养技术确实提高了。

毛：前年、去年、今年粮食产多少？我老是问你们。

吴：前年是二百五十亿斤，去年报了七百零二亿斤，多了，实际只有四百五十亿斤到五百亿斤。

毛：我不信你那个五百亿斤，我信你那个四百亿斤，四百亿斤就是增加一百五十亿斤。今年能不能搞五百亿斤？

吴：假使天气没有什么变化，今年搞五百亿斤比较有把握。今年种得多，种得早。

毛：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

颗粒还家。管是分散管，农民个人的由他家里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愿参加，完工吃饭，旷工找钱，吃饭不要钱同吃饭要钱相结合。粮食生产要抓紧，明年的春荒能够避免就好了。鉴于去年麦子种少了一点，今年你们打算种多少？

吴：今年只能适当地种，河南小麦就是种七千多万亩。

□□□：去年少种了一百万亩。

吴：今年大概落实是种七千五百万亩。种的时候虚报了一点，后来修路、修河又毁了一些。我估计种七千五百万亩可能多一点。

毛：今年秋天种多少麦子呢？

□□□：今年准备种八千万亩麦子。

□□□：最高的一年（一九五六年）是八千八。

毛：你们哪一年恢复八千八呀？

□□□：土地面积也少了，过去是一亿三千多万亩，现在是一亿两千多万亩。

毛：土地哪里去了？

□□□：挖河、修公路、修铁路、基本建设，都占了地。

毛：河不是每年都要挖。公路将来会更发达，工厂占地、房屋占地还要多。所以，一方面是广种薄收，同时要注意精耕细作。重点放在大面积高产，不放到少数“卫星”上。

吴：今年种小麦，连种杂粮，秋季可种八千万亩，今年比去年多种五百万亩。

毛：没有肥料怎么办？麦子要放底肥才好。

吴：现在的问题就是肥料问题。我们已经提出口号了，今年农业是肥料挂帅，搞积肥运动。现在是急抓一把晚秋追肥，再抓一把给麦子准备肥料。准备这三个月大量积肥。

毛：你要他积，开电话会议，他就虚报，说有那么多，实际没有那么多。

吴：不要求那么高，他就不虚报了。

□□□：还有个政策问题。集体积肥与个人积肥相结合，也是两条腿走路。个人集体，一致论价，有的给现钱，有的记工分。

毛：这好。

□□□：去年光是集体积肥，不讲个人积肥，连个人家里的厕所因讲卫生也消灭了，现在都又恢复了。

毛：好。粮食前年产二百五十亿斤，去年四百五十亿斤也许有吧，今年搞五百亿斤。

吴：今年的麦子是一百五十亿斤，还有三百五十亿斤。河南是一麦二秋。今年的秋种面积大，秋季是粮农作物近一亿亩，经济作物两千多万亩到三千万亩。今年许多空地都种上了，消灭荒地两百多万亩。

毛：不是不想种吗？

吴：荒地谁种谁收，小集体种小集体收，个人种个人收，不收公粮。

□□□：有的是伙食单位种。

毛：不收公粮，不统购。

吴：假如没有变化，今年粮食五百亿斤比较有把握。

毛：明年总要略微超过一点吧？

吴：明年六百亿斤，后年八百亿斤。我到下边看了一下，我们都下去看了。我跑了将近三十个县，从许昌专区、信阳专区、开封专区一直跑到新乡专区，大体上转了一圈。现在农业生产能够迅速总结一下经验，增产比较有把握。去年大跃进不能否认，基本建设

搞得很多。

毛：那个东西否认不得，几亿人民群众搞的，你否认他们的成绩呀？

吴：第一个基本建设是水利。

毛：你们修那么多水利，又用不上。

吴：用上了。

毛：叫做干渠、支渠、毛渠、农渠、荒渠，要挖这些渠，工程相当大。

吴：水库、灌溉渠道、坑塘，大轮廓都有了。我们去年把黄河扒了四个口，修了四个闸。

毛：得用不得用？

□□□：起大作用。

吴：得用，今年浇麦子两千多万亩，黄河两岸都有。

□□□：豫北两个，豫南两个。

毛：把黄河搞几个门，有时开门主义，有时关门主义。

吴：黄河水浇的地肥。

毛：不过你们这个省相当危险，泥沙那么一积，水位岂不会高起来？

□□□：我们用铁闸控制，防淤。原来的黄河老古道还需要淤。

毛：至少还可以淤一百年，不至要淤一两千年。黄河将来势必抬高，就是在天上走，泥沙淤积很多，两边的堤越筑越高，下面看黄河，好像从平地看高楼一样。现在开封附近就是那个形势，开封低。

吴：现在开封附近都变成最好的地了。黄河水一灌，今年有的增产一倍，过去百把斤，今年两百斤，有的增产一倍还多，濮阳就

是增产一倍还多。

毛：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从封丘到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时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吴：伏羲氏也是在郑州那一带活动的。前年、去年的水利建设，打下个轮廓。今冬明春要把田间工程修一修，整理整理。此

外，翻地的经验有了，密植的经验也有了。把这几项综合起来，叫做田园化、河网化。

毛：比如绿化，你们这个绿化就很好，为什么不好？

吴：这是近三五年我们搬到郑州以后才绿化的。

毛：我说绿化要一百年，看样子不要，你们是左派，我是右派。但是要统统搞起来，得那么多年。

吴：我们在沙丘上搞了几片，改变过来了，很好。

□□□：现在开封郊区很好了，和主席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可不一样了，开封变化大啦。

吴：我到原阳县看了七万多亩，他们是蓄水、排水、灌溉、航运、造林、水产、作物综合发展，搞得很成功。

毛：那个地方是周朝管的，晋文公强迫它割出去了。综合这种思想要普遍提倡。农业里头，有粮、棉、油、麻、丝、茶、果、菜、烟、蔗、药，这十一样要综合平衡，要都有一点，一个县要都有这些，至少一个专区得都有这些。

吴：还有桐油。

毛：还有椒，花椒、胡椒等，有多少个品种。油也有多少个品种，有油菜籽、芝麻、花生、大豆、棉籽、胡桃、葵花子的，还有大麻籽的。要普遍提倡发展油料，油料不足现在是个大事。总而言之，你们去搞综合平衡。这是讲农、林、牧、副中之农。至于林，无非是有计划地来造。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

吴：现在木料比钢材还重要。

□□□：现在缺木材的危险，已经很大了。

毛：人散发二氧化碳，树木吸收，它散发氧气，人吸收。树木又好看。每一个村庄侧边、房屋侧边都搞。陕西搞得不错，他们那

里工厂都用树林互相隔离。

牧业也多，马牛羊，鸡犬豕，还有骡驴。一个大牲畜，一个小牲畜。犬这个东西大概是不受人欢迎的。你们河南有没有马？

吴：马不少。

毛：马牛羊这三种东西，主要是牛。然后就是猪鸡鸭。要来他一个综合平衡。

此外还有个副业。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家庭副业，生产队搞的手工业，县城以外的小镇，都要活跃起来。你们去研究一下。河北省长刘子厚同志在邯郸地区走了几个县，他说：啊呀，不像样子，统统搞光了，城乡断流，不做生意了。省、县都要把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国营工厂不要去搞那么多东西。听说邯郸地区有一百万斤杏子，就是三五日的事情，很快就烂了。你让农民自由去卖嘛，他不，要商业公司统统收购，哪有那么多人去卖呢？结果大批烂掉。

吴：河南的杏子没有收，还是农民挑担子卖。

毛：那好。但是你们还得去提倡一下。

□□□：农村商品没有过去供销社那个时候品种多了。

毛：还有渔业。你们有没有鱼？

吴：渔业大发展。

□□□：现在水库里都有鱼，有的鱼十几斤，就是捞不出来。

毛：无可奈何，能治水，不能治鱼。

□□□：原来库底没有清理好，现在一打鱼它就钻进去了，不好下网。

毛：工业方面，是一个综合平衡问题，要抓一个品种、规格，一个质量，一个管理。综合平衡，就是工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你要搞钢铁，不能只看到小高炉、小转炉，要看到炼焦炉。不搞好洗煤、炼焦，质量没有法子提高。含硫百分之零点二的规格很快就要破掉，含硫多了对我们国家很不利。含硫应该是零点零七以下，不许超过零点零八，不然，炼出一大堆钢都不能用，重新要回炉，冤枉费了力。他们有几个口号，叫做宁可少一点，但是要好一点，要全一点，就是品种规格要多一点。有许多东西我们自己还不能造，要依靠进口。我们搞了十年，八年有综合平衡，第九年忘记了（北戴河会议以后），现在又恢复了，上海会议以后，到北京就落实了。为什么落实了呢？没有那个东西。炼一千三百万吨钢，就要两千万吨铁，炼两千万吨铁，就要七千万吨铁矿石，三亿四千万吨煤（包括民用，民用占九千万吨），回头一想，才晓得缺一样都不行。明年这一年跃进口号是不是放弃？但是明年这一年要着重在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也是重要的，但着重之点要放在品种同质量上，缓过一口气来。今年为什么搞成这样呢？就是因为去年把材料（无非是钢材、水泥、木材这些东西）用光了。挖掘潜力，现在又到处清仓，这是好事，但是也很危险，统统清光了，没有后备了。今年的头一个季度应该把指标放低。没有材料给他，你要他做那么多事情，等于不给他米要他煮饭。巧妇无米不能炊，蠢妇给了米也能做出饭来。有鉴于此，明年第一季度指标要低。去年一个大跃进，今年又是大跃进，一千八百项的基本建设，现在降到七百八十项，砍掉一千项多一点。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我们批评过“马鞍形”，那一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反冒进”不妥，不是基建计划缩小不妥。一九五六年那一年大建设的结果，库里的东西

不多了，所以，一九五七年的建设只能搞那么多，先是一百一十亿，后头达到一百二十几亿，比头一年少一点。今年比去年还多。去年大跃进，搞了二百几十亿。今年原来打算二百八十亿，现在降到二百二十多亿，剩下七百八十项。明年大概这样的数目还可以维持，或者还可以加一点，但是不能加得太多。这两年稳步前进，好像造房子一样，把地基打稳固一点。

管理有各项，有什么财务管理，有什么定额管理，有什么安全管理，有什么质量管理。过去权力下放，统统下放到车间、工段，工人自己去管，工厂就不检查了。商业交给合作社了。这都是我们办的事，我也赞成下放。于是一下下放到省，省下放到地，地下放到县，县下放到社。至于把商业、银行下放到社，这是中央决策的，现在看起来不行，你归他，我们没有脚了。你们现在收回来没有？

□□□：银行收回来了，商业的权力还没有完全收回来。

毛：我看商业权要收回来。公社、生产队可以设零售店，取手续费。把国营经济跟集体经济两者配合起来。过去我们有那么个想法，使这两个因素混在一块，结果他就不听命令，公社不听你的。公社又不听老百姓的，又不听生产队的。生产队就怕公社了，老百姓也怕公社了。我们也怕公社了，他们不理我们，他们搞他们的，他们刮“共产风”，又不请示：我刮一点“共产风”可不可以呀？没有哪个公社请示过。极好的事情就是他们得到了教育，我们没有很久就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了。几个月，你们河南说是刮了两个月。将来党史总要写一笔，刮了两个月“共产风”，然后就转过来了，不刮了。我们转得快，苏联同志很称赞我们转得快。副食品缺乏，日用品缺乏，我们立即就抓了。权力下放太多了，有四个权要收回

来，收到中央和省。哪四个权呢？一为人权。比如请工人，全国去年一年请了两千万。自从鸦片战争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到我们接收，只有一千二百万工人，去年一年就增加两千万，那还得了？难怪没有副食品，难怪没有肥皂。一为人权，二为财权，三为商权，四为工权，此四权者，一定得收回来，不能层层下放。人权是请多少工人都由中央、省市控制，都要有计划。不是计划经济吗？财权是一种什么内容，我就不大清楚了。他们讲有这样一个问题，比如你们这个地方有烟叶，说我这个许昌专区有那么多烟，你给我钱，我给你一百万担，结果他只有五十万担，但是钱拿去了。棉花也是这样。听说计划外的资金占百分之二十九，分散材料，还有动用流动资金。我说，在一个时期至少应该说是半无政府状态，横直是不要统帅，谁也不要问过谁，统统变成一个独立国。

吴：县管不了社，地管不了县，省管不了地。

毛：我从前担心县，他们自己也刮了一点风，比较被动。只有省跟地比较主动，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刮，他们又没有要人家的大车，而县多少要了一点。现在看来，县要得不多，县委的水平也比较高，一讲就通了。剩下就是公社。

你们铁的任务、钢的任务多少？我忘记了。

吴：铁最后是五十五万吨，钢很少，只有十万九千吨，完全是好钢。

毛：要搞好钢。河南一万年也没有炼过那么多钢，一九五九年搞十万吨，你们比蒋介石多一倍半，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

吴：十万九千吨钢，两万吨钢材，五十五万吨好铁（含硫量零点二以下）。

毛：还要改进。总而言之，你们不要维持零点二。零点二，明

年一定崩溃，明年要降到零点一以下，比如零点零七、零点零八。

吴：我们铁的质量现在才高上去，但是不稳定。

毛：我看还是十五年或者较少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还提这个口号。主要产品不只是钢这一项，钢锭这一项大概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超过，还有品种，还有质量，比如优质的钢、机械。机械赶不上英国就不行，煤炭现在比它多了，钢铁赶上还要几年。过去本来很适当的口号，现在不灵了，好像十五年赶上英国不过瘾。还有一个农业纲要四十条也不过瘾了，我看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机会把那个四十条标准定高一点，或是再搞个四十条，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现在还没有通过，好像就作废了。实际上，普遍的亩产要达到五百斤，还要一点时间吧？

吴：还得再过两三年。

□□□：全年亩产平均五百斤看来可以，单产不行。

毛：当然是讲亩产两季三季。

大家：那比较容易。

吴：亩产去年平均合四百多斤，今年合五百斤。现在要抓住几样：一个是把水利继续搞好。再一个是抓大面积丰产的经验，如田园化、河网化，综合发展。今年的麦子就是大面积丰产很多，万亩五百斤以上的，几万亩三百斤以上的，都有。去年卫星田对计算粮食产量作用不大。

毛：你说卫星田统统是美国卫星，走到半路就下来了，也不能那样讲，也有些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没有什么五千斤，两万斤，三万斤，但是有千把斤。

吴：没有七千斤的，推翻了，两三千斤的有。红薯万把斤的，三几万斤的还有。最基本的还是个劳力问题，有劳力就好。第二是

肥料问题，机械化问题。根据几年来搞农业的经验，还是集中力量搞肥料，搞工具改革。搞半机械化、机械化、工具改革，就可以节省人力，就可以搞好。再就是把水利整理好。有这几样，普遍变低产为高产，也是几年的工夫。我们今年的麦子高产已经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了。

毛：那才四分之一，再有四分之一，可以搞到百分之五六十。

吴：搞到百分之七十就很好了，农业还是可以搞上去的。

毛：我还想搞农业四十条，把指标略微提高一点，还是十二年，从一九五六年算起，明年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党代表大会今年不开了，到明年二三月去开。党代表大会先通过，四五月开人民代表大会再通过。

吴：农村养猪是个大问题。积肥，养猪，养牲畜，改革工具，整治水利，还是这几件事情。

毛：牲畜得拨粮。你们现在是四千八百万人口，算五千万，平均每人四百斤口粮，就是两百亿斤。你得留一点粮食给牲口和家禽（马、牛、骡、驴、猪、鸡、鸭、鹅）吃，要有一百亿斤给它们。

吴：用不了一百亿斤。

毛：给八十亿斤，少了不行。山东他们计划给八十亿斤，他们人口跟你们差不多，他们的口粮也是两百亿斤。

□□□：口粮两百亿斤，征收七十五亿斤，一百亿斤饲料，十亿斤的工业和服务业用粮。

毛：有一百亿斤的饲料，你们这个省就大兴旺了。然后是储备粮。

总而言之，别的我不管，拨一百亿斤饲料，你们这个省就会兴旺。你给了牲口饲料，它就拉屎，就是肥料。猪就是肉类产品，还

有猪鬃。牛就犁田，又是运输工具。马、驴、骡是运输工具。

吴：现在每一头猪只留八十斤粮食。

毛：你要一百斤肉，就得给一百斤粮食。如果要一百五十斤肉，你得给一百五十斤粮食。你们现在是八十斤粮食，还少七十斤。

□□□：还搞点别的东西吃，搞代用品。

毛：糠菜半年粮，猪还没有改善生活。

吴：猪、骡、马，将来可以多留一点饲料。

毛：你们跟各县商量一下，省委下决心搞一百亿斤饲料。几年以后，比如十年以后，一半一半，人吃多少，牲口吃多少，比如人吃两百斤，饲料两百斤。现在是人吃两百斤，饲料只有一百斤。过去饲料太少了。

吴：过去留也留一点，猪吃不到，人把猪的粮吃了。

□□□：实际上，把饲料解决了，人还省粮食。我们的城市供应，往年有鸡，有鸡蛋，有糕点，粮食吃不完，现在这方面少了，吃粮食就多了。

毛：你们搞糕点还要十亿斤粮食？

吴：用不了。

毛：工业用粮食搞一点，多搞一点糕点，市场就活跃了。

吴：一个饲料，一个工业和服务业用粮，解决了这两样市场就繁荣了。

毛：搞热闹一点，可以回笼货币，生意兴隆通四海。

吴：最近在订发展多种经济的方案，准备专门开个会。现在集体养的猪有七八百万头，准备今年年底达到一千五百万头。私人养猪准备平均一户一猪，就是九百万头。如有三千万头猪，就是一猪三亩地，积肥寻常是一猪两亩地。还有六七百万头牲口。一头牲口

两亩地，一头猪两亩地，这样肥料就差不多了。准备在二十五号开个多种经济会议，现在正做规划。

毛：多种经济会议，首先是农、林、牧、副、渔，每一类究竟有几项，开个单子。比如刚才讲的农就开了十一种，你们还加了一个胶，还加了一个漆，还加了一个桐油，变成十四种了。粮食要开个单子。农业里面的粮、棉、油、麻，这几项里头，每一项都有多种。粮食总有十几个品种。棉花也有多种，他们说有十二个品种，是根据绒的长短分的。麻有黄麻、青麻、大麻、芝麻。油刚才讲了，有那么多。要开个单子，做点规划。烟叶子也有品种，有什么云南种，还有本地种、四川种，有商品的，有老百姓用的，有烤烟，有不烤烟。经济工作的确是要搞细致一点，要各方面都考虑。过去一年我们的缺点，就是往往搞了一面，把另一面，或者几面，或者几十面，都忘了。搞起小高炉、小转炉，把洗煤、主焦煤、耐火材料、运输没有考虑进去，还有忘了钢的品种、质量。

你们的材料对我很有益处。特别是整个形势是稳定的、发展的、兴旺的。全省没有粮食恐慌，生产又很有希望，麦子已经到手了，秋收也很有希望，形势好，人心稳定。现在算账一来，把无偿占有的东西退还，开几级干部大会，人心这样拥护，干部又团结。你们在一百二十万干部里头，批评改正的是四十几万人，开除、处罚的只有三千六百人，刑事处分的仅七百二十人，这个政策好。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吴：食堂经过工作能够坚持下来。

毛：现在粮食归户，自愿参加，食堂能够坚持下来。搞食堂机械化、半机械化和什么自流水之类，以达到节约的目的。不仅是节

约人力，而且节约粮食、柴火、油盐。只要食堂能够达到节约的目的，群众会拥护的。

吴：昨天晚上跟前几天下去的两个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两个，一个是到夏邑县，一个是到郾城县。夏邑县是个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县，群众讨论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拥护食堂。坚决拥护的占百分之五十多到六十，包括有条件拥护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那百分之四五十是因为食堂办得不好，只要改进一下就好了。

□□□：七十多个人参加了自由辩论，也没有说是中央的政策，也没有说是省委的政策，也没有说是县委的政策，就是大家商量。

吴：大会套小会，完全自由。一个同志是到郾城县看的，那里对食堂完全拥护。

毛：你们这个食堂机械化还没有普遍搞。

吴：机械化占百分之十几到二十。

毛：你们搞一套到庐山去看一下，好不好？

吴：我们已经搞了一个指示，准备搞个方案。我们也反复研究这个形势，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就是城市里供应紧张，也没有什么大紧张，只是猪肉、鸡蛋、肥皂紧张。

毛：供应稍微紧张一点有什么要紧？河北省前年（粮食年度）中央同各省调给他们二十七亿斤粮食，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只有七亿斤，他们进步很大。山东西部粮食紧张一点。湖北粮食相当紧张，恐怕也是有区域性的，有些地区比较好，有些地区紧张一些。他们那四个模范县垮了：一个叫麻城，一个叫孝感，一个叫红安，一个叫谷城。说是亩产两千六叫双千斤县，但是假的，结果大闹其粮食紧张，征购完不成。本来富是相当富，还不很富，却当富

日子过了。

□□□：去年麻城的庄稼长得确实不错，八九月间我到汉口去开协作会议，经过那个地方，看见庄稼长得好，就是收得不净，浪费了不少粮食。

吴：稻子吃并秧的亏了，几十亩搞到一块，实际上是减少了。

毛：此外，广东粮食紧一些，就是这么几个省紧。其他省粮食都不紧，是副食品、日用品、工业用品比较紧张。现在我们正在抓，在上海开五十一个城市的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的会议，你们这里也去人了，先念同志在那里主持。大家商量一下，究竟我们整个形势好不好？如果要亡国了，就当作亡国的局面来办。现在又没有亡国，这个国家还是兴旺的，有那么几个小泥鳅掀了一点浪，就以为不了不起了，我就不信这个道理。

吴：我们研究了形势，认为农村现在已经是生产高潮了，比哪一年都好。农民今年收麦的秩序好得很，过去他们偷偷地割麦子，今年没有偷麦子的了。

□□□：今年没有吃青。

吴：过去是麦子熟六七成的时候就吃了，今年没有吃。

毛：我刚才讲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是讲国家。至于集体，它那个所有权就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生产权是在生产小队。要定下这一条：人吃一斤粮，给牲口吃半斤。

吴：大的牛、骡、马要吃三四斤。

□□□：牲口比人吃得多，最小的牲畜吃的也等于人的口粮。

吴：小牲口等于一个人，大牲口等于一个半人。

毛：要分类跟地方上谈谈，你们去布置一下。二十五号到武昌，中央会发通知的。

吴：主席在这里住两天吧，明天再走，看个戏。

毛：今天就走，到孝感，那个地方比较凉快一些。还要请王任重同志到那个地方来，今天下午、明天上午跟他谈一下。然后请陶铸、周小舟来。周小舟是要搞食堂的，李井泉也是要搞的，你们也是要搞的。如果食堂有几个省顶下来，基本不垮，就是说有七成不垮，垮掉三成，事情就好办了。至于春节食堂放一个星期的假，那也可以。

□□□：特别是妇女，普遍不愿意食堂散伙。有食堂，她经济上有地位，可以增加生产，也有收入，丈夫还要向妻子要钱。她不做饭，到地里干活，比干别的收入大。所以，妇女也很赞成食堂。妇女说：我才解放了几天，干净了几天，现在又要回到厨房里去，又要我窝囊去了。

毛：食堂，你们一个省顶下来，天下就顶下来了。大体上垮十分之七，留下十分之三。这十分之三能够坚持，搞一两年，其他的慢慢会起来。你们搞起食堂机械化这一套来，我看它就巩固了。你们可以搞小食堂。

吴：我们估计食堂能巩固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一点。也许垮得多一点，也难说。

□□□：一个食堂机械化，一个以食堂为单位种的菜、养的猪，它的力量很雄厚。

毛：家里也还可以种点菜，可以卖给食堂。

吴：我们现在觉得形势还是好。好的原因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算了账，农民因算账得现款两三亿，有的一户就得四五十元。另外，牲口、猪、鸡都给他们，光农具就给了将近一千万件，房子退还的也不少。

毛：你们有篇账，我在一个什么文件上看了。

吴：最后这个账还没有算清楚。形势比较好，群众心情比较舒畅。我们再进一步就是把制度稳下来，像自留地的制度，粮食分到户的制度，工资制度。

毛：搞个章程出来。从前那个卫星公社的章程不行了，那个东西有点“共产风”。

吴：这次到庐山可以拿几个社的章程。还有几天，我们在家里准备准备，再征求征求地、县各级党委的意见。我们最近已经放了一炮，就是坚决把粮食分到户，坚决留自留地。食堂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毛：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吴：最近还有一个争取秋季大丰收的指示，也快送来了。

毛：好，就这样，谢谢你们。

吴：主席什么时候走？

毛：我这是自由主义，现在就准备开车，开到广水，戏也不看了。

吴：我们去一个人。

毛：一个都不要，秘书都不要。我这个车上有管铁路的。

和毛宇居应对联^[1]

(1959年6月25日)

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宇居）

尊老敬贤，应该应该！（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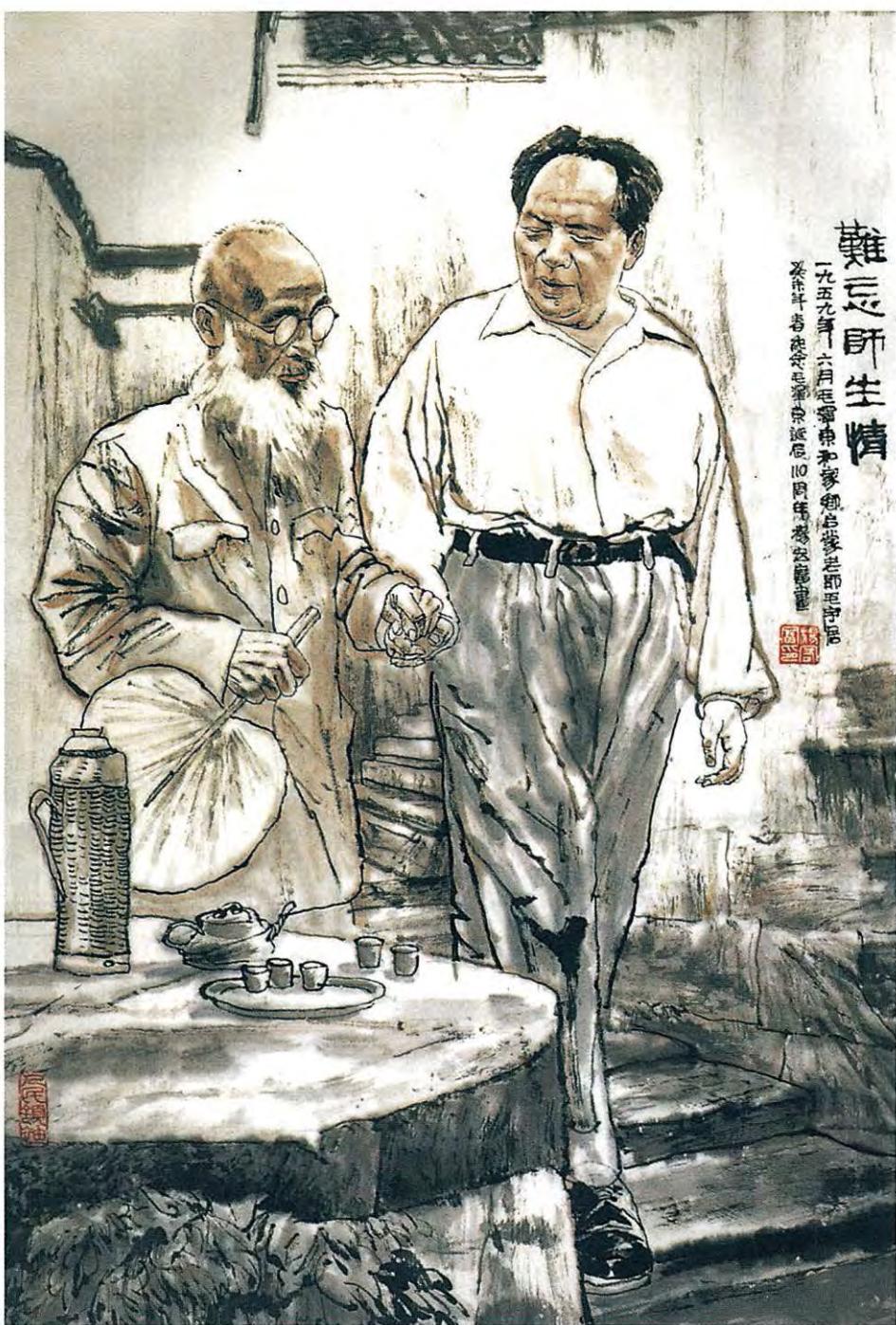
[1]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当晚，毛泽东请当年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农协、赤卫队队员及烈士家属们吃饭。席间，毛泽东向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一一敬酒。当敬到当年在南岸私塾教书的老师毛宇居老人面前时，毛宇居连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接着答道：“尊老敬贤，应该应该！”毛宇居（1881—1964），湖南湘潭人，又名蕊珠、禹珠、禹居。毛宇居和毛泽东共太高祖父，是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读私塾时的老师。1906年秋至1907年夏，毛泽东在距韶山冲上屋场约五华里的井湾里毛宇居的私塾里读书。毛宇居1926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古典文学功底较深，善于写作。1940年与毛国樵一同编修毛氏宗族四修族谱。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乡间教书。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64年去世。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和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携手同行。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和毛宇居携手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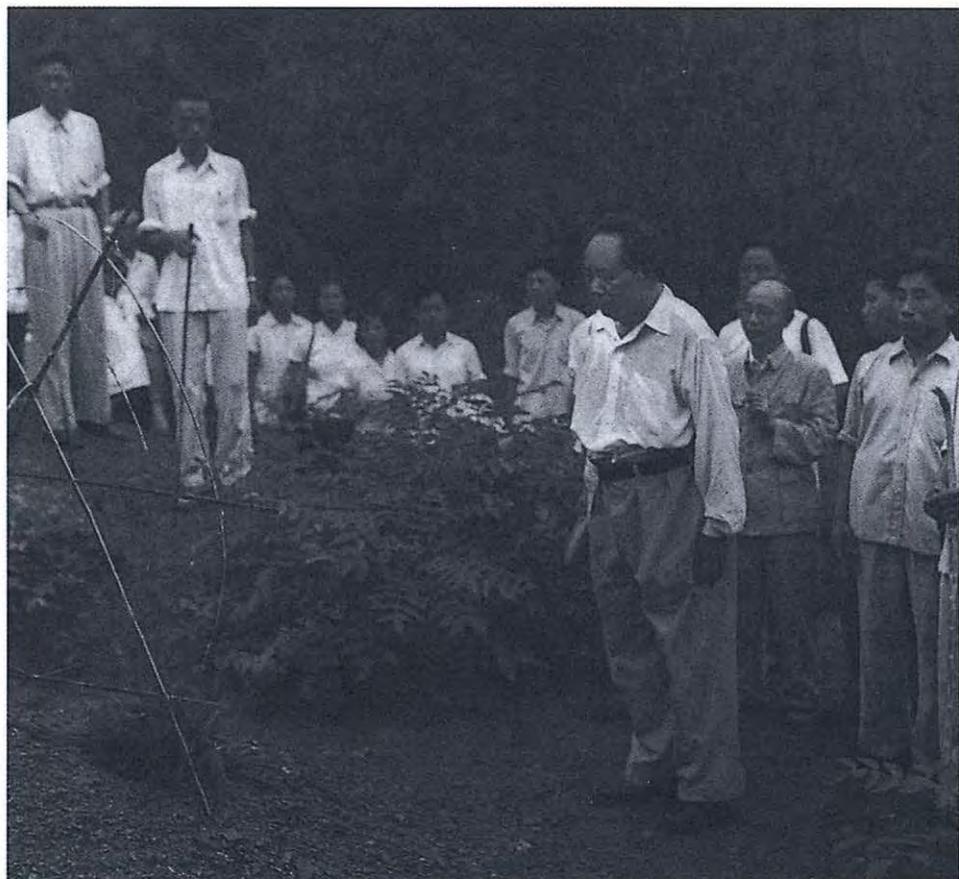
《难忘师生情》(中国画)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故乡湖南韶山冲象鼻山为父母亲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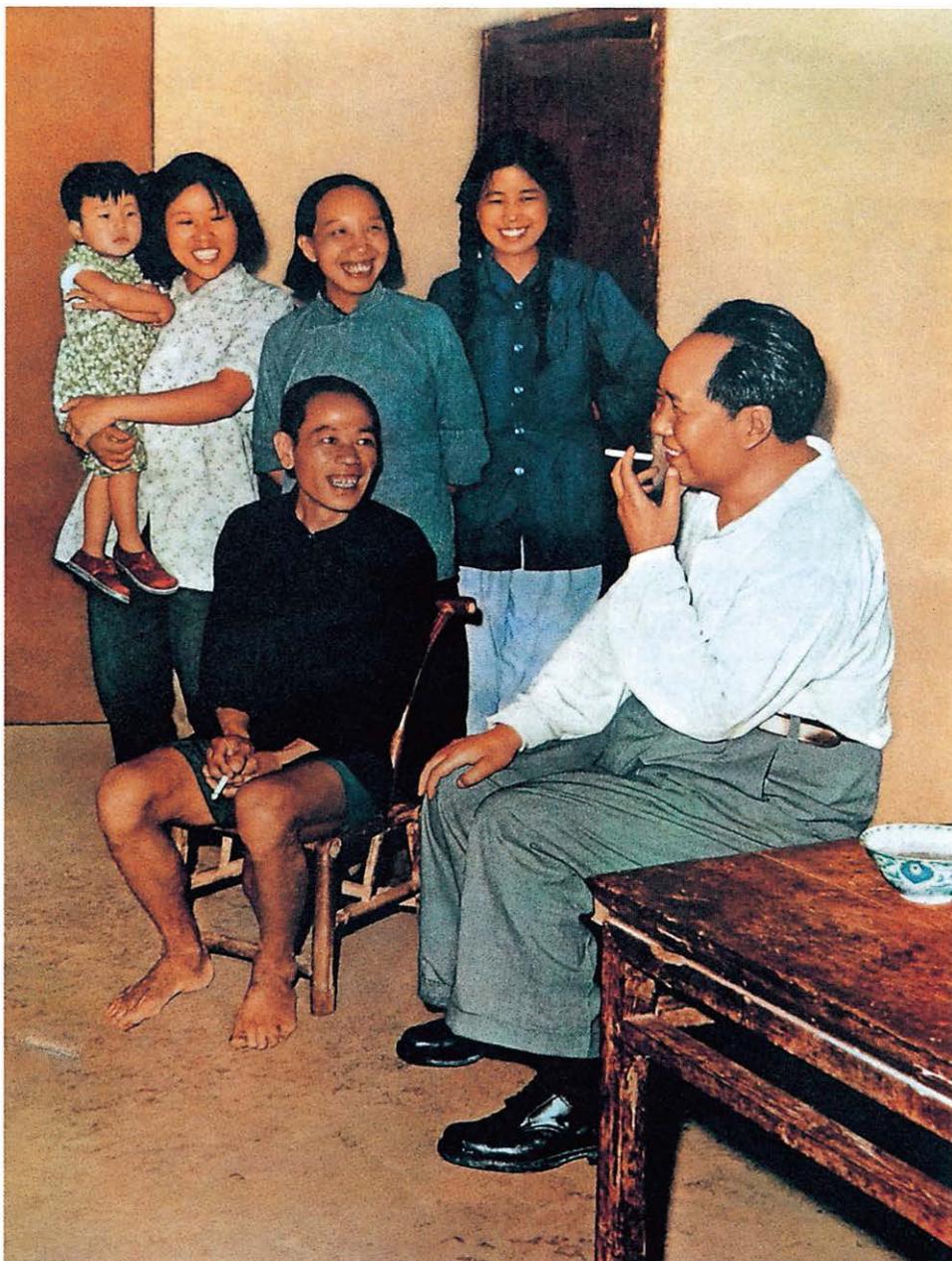
《祭扫》(中国画)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母亲墓前行鞠躬礼。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故居和家乡干部、群众合影。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故乡韶山和贫农社员毛霞生亲切交谈。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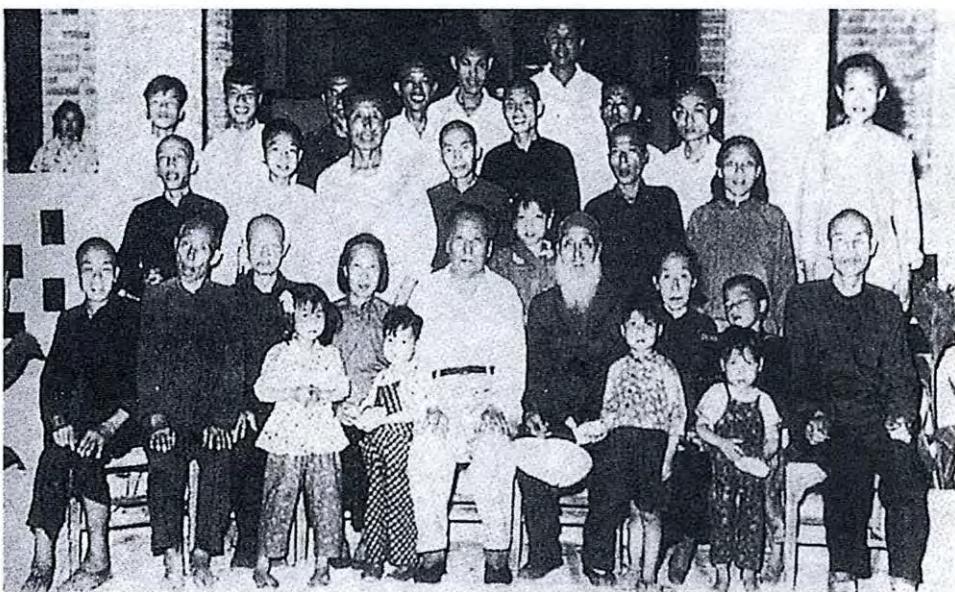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看望毛福轩烈士夫人贺菊英。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1959年6月，毛泽东和毛宇居等乡亲们在一起。



1959年6月，毛泽东和乡亲们合影。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故居晒谷坪。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看望邻居李文贵。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看望邻居李文贵。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倾听乡亲们的意见。



1959年6月，毛泽东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1959年6月，毛泽东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



1959年6月，毛泽东畅游湘江。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到牛头洲参观。



1959年6月，毛泽东畅游湘江后走上牛头洲和小学生交谈。



1959年6月，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在农家院内小憩。



《领袖与山伢子》(中国画)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视察家乡稻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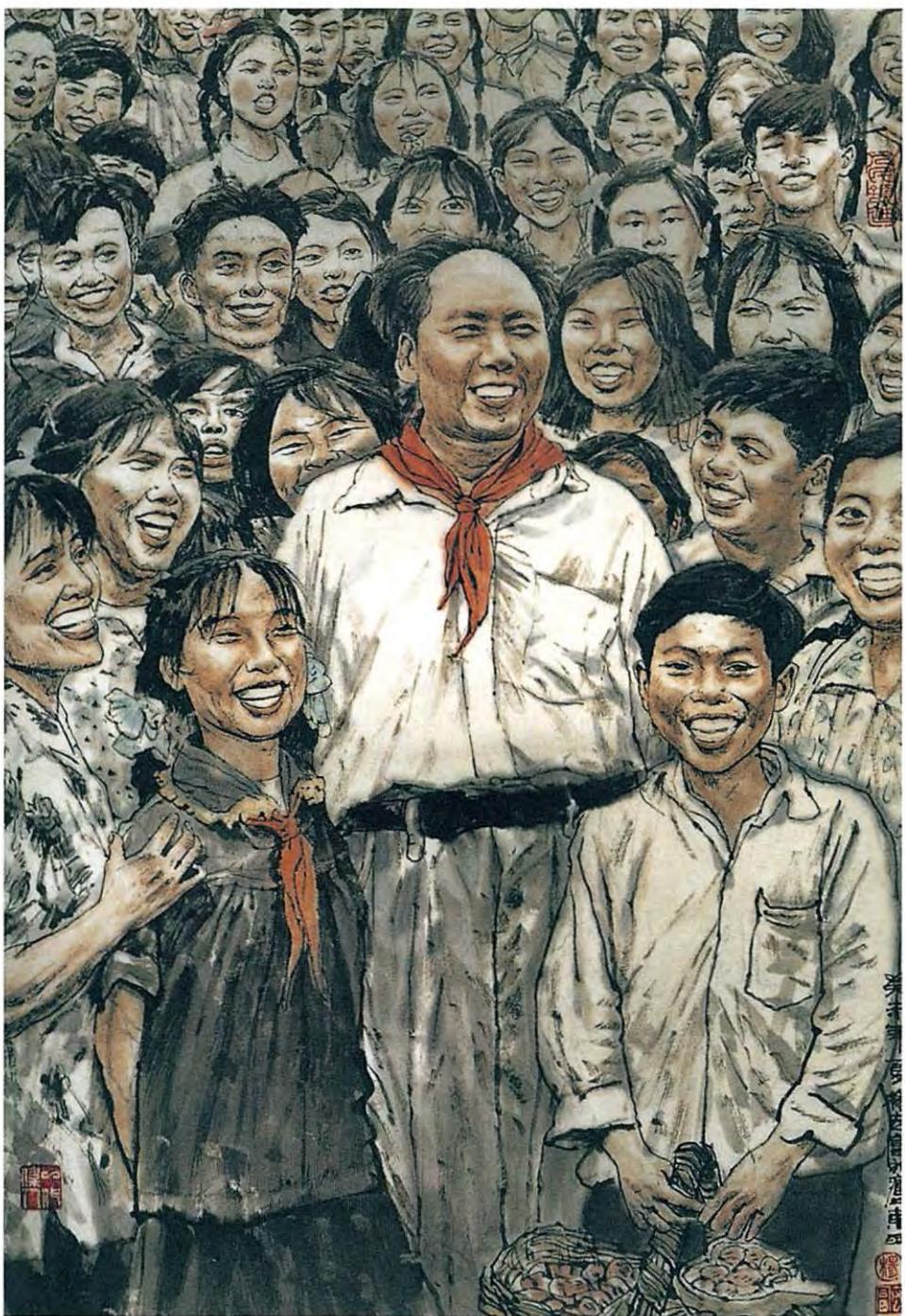
1959年6月，韶山学校的学生向毛泽东献花和红领巾。



1959年6月，韶山学校的学生给毛泽东戴上红领巾。



1959年6月，毛泽东和韶山学校的师生在一起。



《韶山的孩子们见到了毛主席》(中国画)



1959年6月，毛泽东离开韶山去长沙的途中和宁乡县的小学生交谈。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和湖南省地县委书记合影。



1959年6月，毛泽东和李淑一在长沙合影。



《与李淑一》(中国画)



《桃李情》(水粉)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

(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2]。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3]，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

[1] 这是根据毛泽东1959年6月29日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在船上同协作区主任委员的谈话和7月2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的。

[2] 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1]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

[1] 八大二次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

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

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1]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

[1]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1]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两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2]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

[1] 指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

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对新华社关于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 准备工作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6月)

退江青。此期我已全部看过。第一条新闻^[1]，你可以看一看。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6月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八八期上登载的第一条新闻报道，题为《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的准备工作》。报道说，据记者从煤炭工业部在抚顺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了解，生产准备不足，是当前煤炭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生产准备落后的因素，除生产成倍地增长，给掘进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外，主要是领导思想上有重产量轻掘进的片面观点，致使采掘不平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其次，违反技术政策，乱采乱掘，工程质量降低，巷道失修，对生产准备工作影响也很大。

关于一九五九年市场供应情况的批注^[1]

(1959年6月)

毛注：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59年6月11日关于1959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今年全国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市场供应方面，不论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情况都是比较紧张的。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在关于印度和尼泊尔联合声明的 报道^[1]上的批语

(1959年6月)

尼泊尔不满印对它的控制，在这里，印度方面似已作出了一种让步，以便拉住尼泊尔。^[2]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6月16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九三五期上登载的第一条新闻报道，题为《印新处报道印度和尼泊尔的联合声明》，介绍了印度总理和尼泊尔首相1959年6月14日在加德满都发表的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

[2] 印度和尼泊尔的联合声明说到：“总理和首相还确信，为了和平的利益以及为了民族的和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受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殖民控制，不管什么形式，都应该结束。”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这条批语。

对《参考资料》有关日本的 几条消息的批语^[1]

(1959年6月)

林克^[2]:

有两三条日本消息，值得一阅。

毛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9年6月18日编印的《东南亚和中近东情况》(《参考资料》专辑)第十八期上。这期资料登载了有关日本的几条消息。其中《〈香港时报〉评日本地方选举》的消息说，《香港时报》5月8日刊载了该报驻东京特派员芳亭写的题为《日本地方选举的总结》的通讯，指出这次选举结果显示日本保守势力有“退潮”的象征，日本舆论对选举中违法和贿选现象层出不穷极为不满。《美报掩饰日反动势力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的消息说，《纽约时报》5月10日发表一篇题为《日本的坚定》的社论，吹嘘日本反动势力的“胜利”，掩饰其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为美日反动派打气。《东京裁判所对砂川事件的判决鼓舞了人民斗志》的消息说，《日本新闻周报》4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引起了影响的“对砂川事件的判决”》的文章，指出东京地方裁判所对砂川农民为反对扩大美军基地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作出“美军驻扎在日本是违反宪法的”判决，大大鼓舞了日本人民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七律·到韶山^[1]

(1959年6月)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2]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3]，
黑手高悬霸主鞭。^[4]
为有牺牲多壮志，

[1] 韶山在湖南省湘潭县，是毛泽东的故乡。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曾回到韶山。三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屠杀革命群众，这就是马日事变（旧时用韵目代日期，马日即21日）。当时韶山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拿着枪和梭镖，准备配合其他农民武装力量进攻长沙。后来反动军队大举进攻韶山，农民自卫军在英勇抵抗后失败。毛泽东在1959年6月25日至27日重返韶山，离1927年1月已经32年多。这首诗便是对于32年来的斗争和胜利的概括。

[2] 别梦依稀咒逝川，久别重归，又唤起了已依稀如梦的斗争和失败的回忆。

[3] 戟，古代的一种刺杀武器。

[4] 黑手高悬霸主鞭，黑手，反革命的血腥魔掌。霸主，指蒋介石。本句和颔联出句，是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1]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伟人故里》(诗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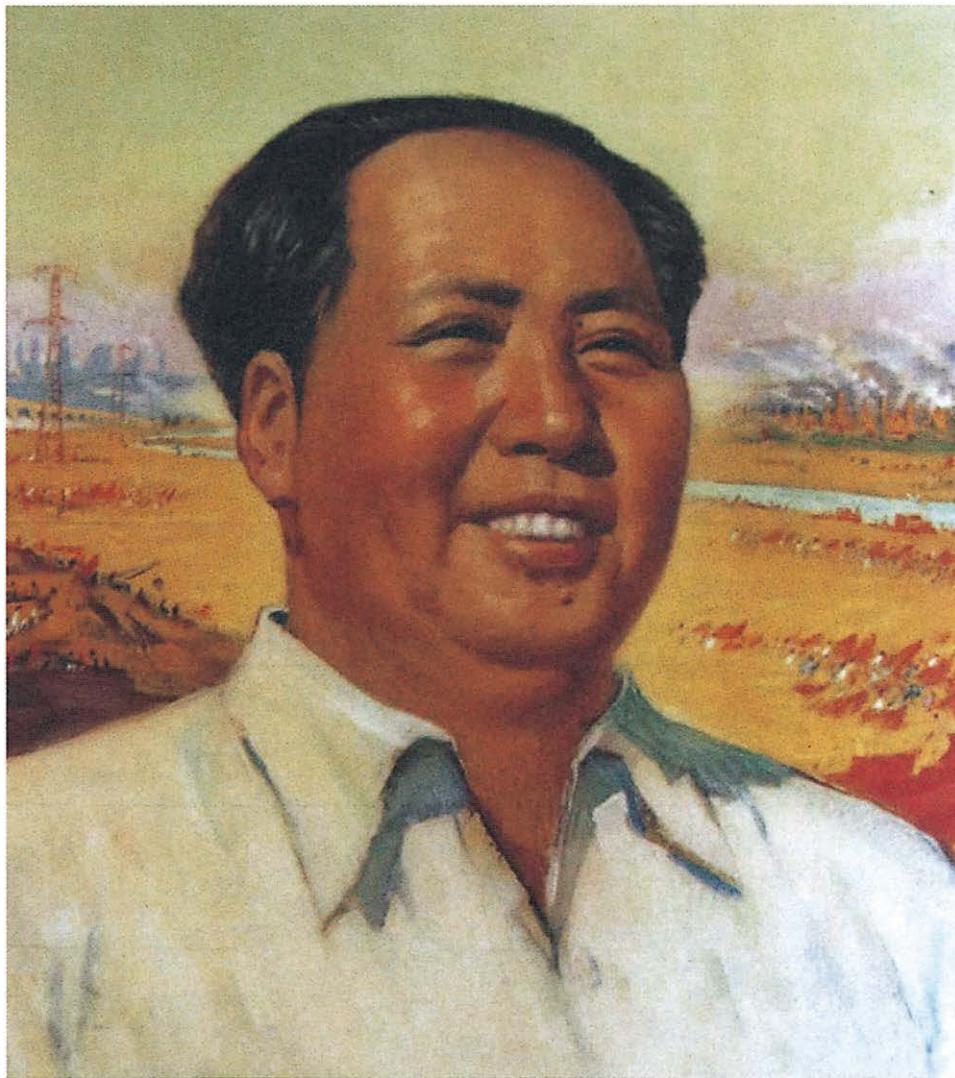
[1] 菽，豆类的总称。

丁巳年夏月
九月廿二日
晴。北风大作。
天高云淡。山
林中鸟声清脆。
偶得此景。甚为
快。因作此诗。
以志之。

毛泽东手书《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诗意图)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油画)



《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油画)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宣传画)

七律·登庐山^[1]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2]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3]浮黄鹤，
浪下三吴^[4]起白烟。

[1] 庐山，在江西省北部，屹立在长江和鄱阳湖之间。

[2] 跃上葱茏四百旋，葱茏，草木青翠茂盛，这里指山顶。庐山登山公路，建成于1953年，全长三十五公里，盘旋近四百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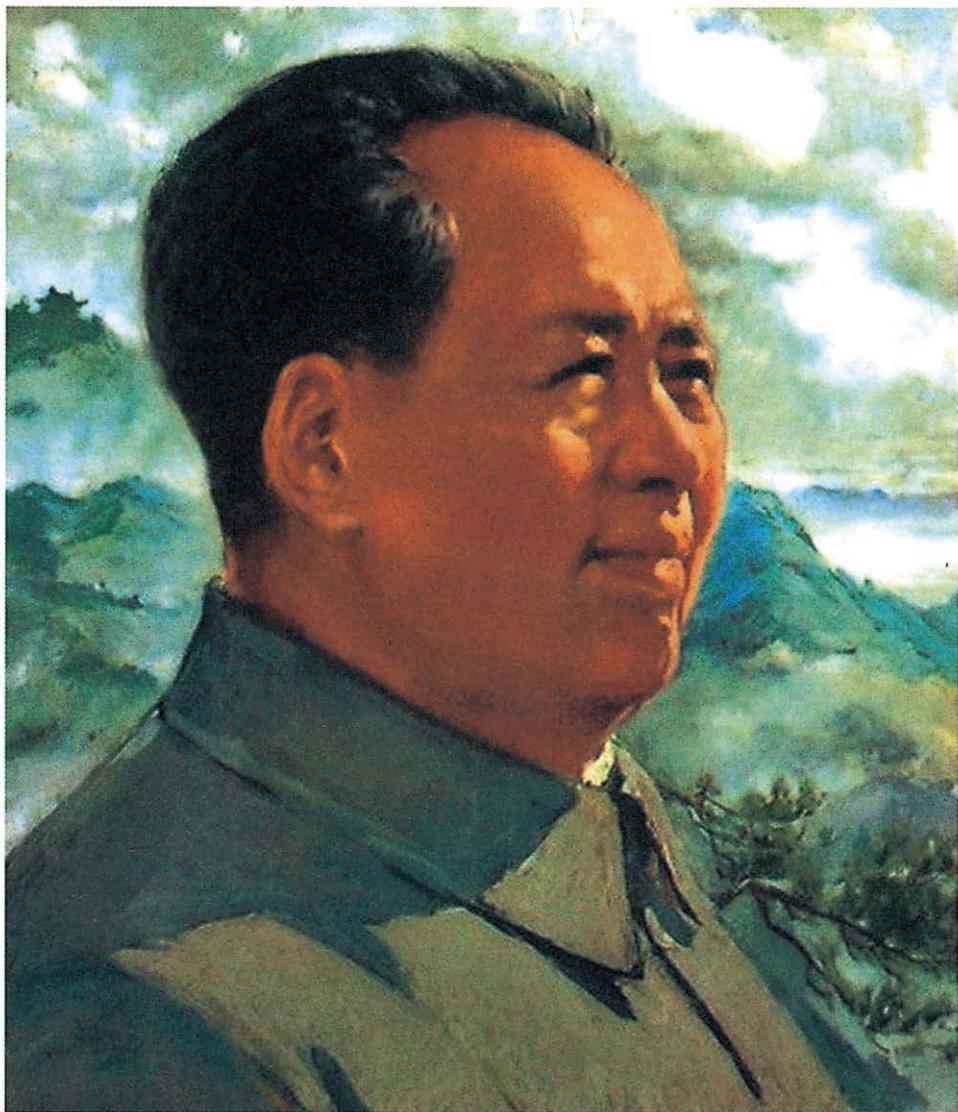
[3] 九派，见《菩萨蛮·黄鹤楼》注。《十三经注疏》本《尚书·禹贡》“九江”注：“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明李攀龙《怀明卿》：“豫章（今南昌）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毛泽东1959年12月29日在一封信上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

[4] 三吴，古代指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的某些地区，具体说法不一。这里泛指长江下游。毛泽东在1959年12月29日同一封信上说：“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

陶令^[1]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2]里可耕田？

[1] 陶令，指陶潜（365—427），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诗人。他曾经做过彭泽县令，故称陶令。据《南史·陶潜传》记载，他曾经登过庐山。他辞官后归耕之地，离庐山也不远。

[2] 桃花源，陶潜曾作《桃花源记》，文中说秦时有些人逃到一个偏僻宁静的“桃花源”（长满桃花的水源）地方避乱，从此与世隔绝，过着和平的劳动生活。直到晋朝才有一个武陵（湖南常德）的渔人因迷路偶然找到这个美丽幸福的奇境。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油画)



《热风吹雨洒江天》(诗意图)

庐山会议^[1]讨论问题^[2]

(1959年7月3日)

—

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县级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另读三本书：“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3]三本书不超过十万字，七天能够读完。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

每年轮训县社干部。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1] 指当时正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同各协作区主任座谈时，提出了在庐山会议上准备讨论的若干问题。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确定为十八个问题，印发庐山会议各同志。7月3日，毛泽东对这个提纲又作了修改，即本篇一。本篇题目也是毛泽东在这次修改时定的。

[3] 这是当时准备为县、社干部编印的三本书。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1]，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1] 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1957年以来为改进财经工作的管理体制而下放的人、工、财、商四大管理权限。

二

尚昆^[1]:

此件再印，换发，原发件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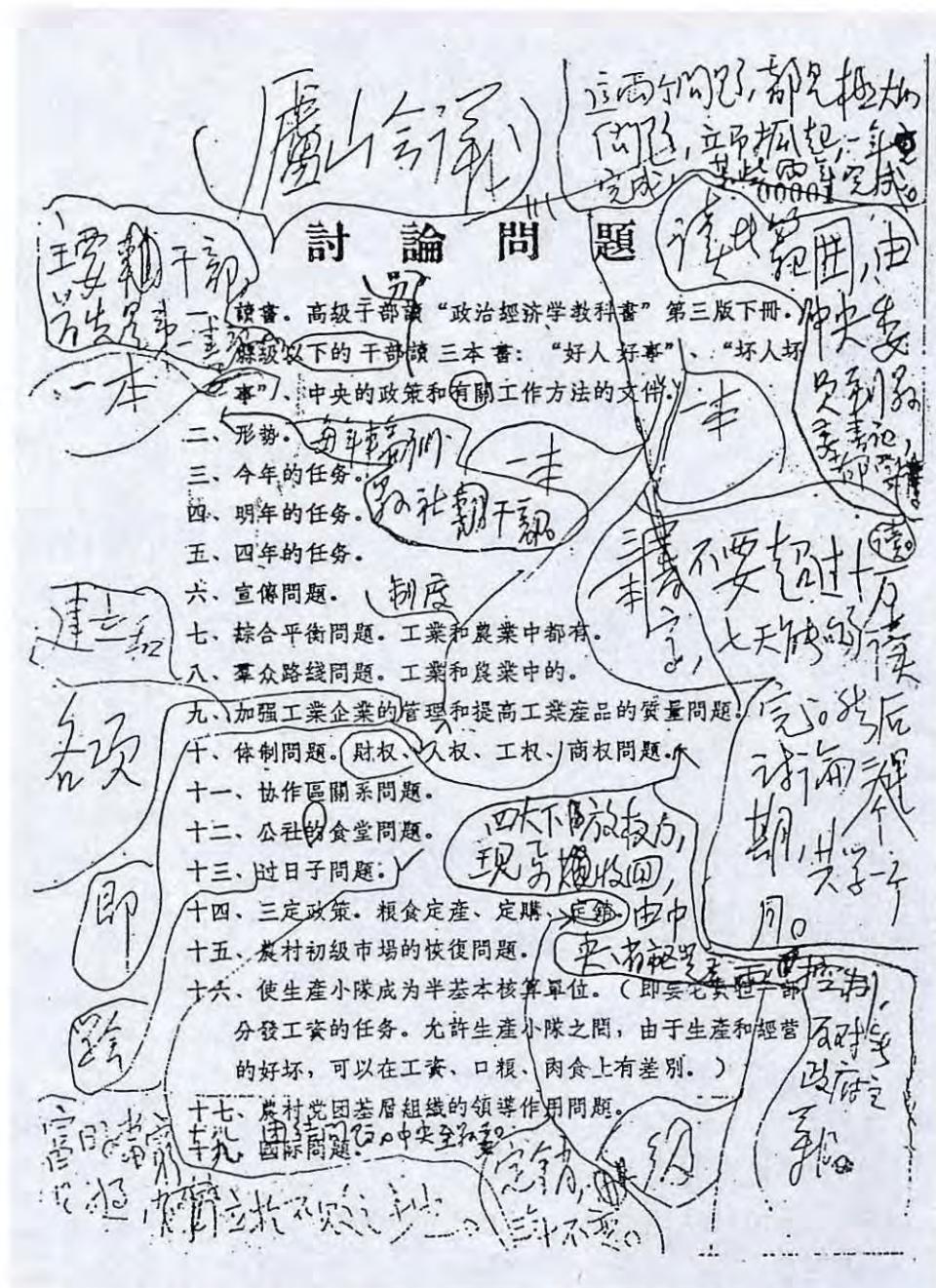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七月三日一时半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举行。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庐山会议上。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手稿。

发展副食品生产^[1]

(1959年7月3日、4日)

—

此件^[2]阅过，有所修改，是一个好文件。请先念再打清样，校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对这一指示稿的修改；本篇四是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转发上述指示及李先念关于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的报告的通知稿。

[2] 指李先念代拟的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为了早日缓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央特作如下指示：一、解决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城乡并举，组织发展副食品生产。大中城市应坚决实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二、必须大力加强郊区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明确郊区的生产方针。凡是城市郊区，都应当为城市生产副食品。三、发展郊区的副食品生产，应当以蔬菜和猪肉为纲，带动其他，全面发展。四、应当实行公私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副食品生产，又要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家禽和进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五、发展郊区副食品生产应当发动群众，因陋就简，逐步克服遇到的困难。六、必须做好副食品的收购供应工作。七、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的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实行农工交商四项并举的方针。八、加强大中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丝毫也不应当削弱广大农村的副食品生产，相反必须继续加强。1959年7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对勿错。改处有错误时，请先念动笔改正，我不看了。然后送交刘、周、朱、谭震林、彭德怀、胡乔木^[1]六同志阅过，交尚昆印发庐山到会各同志，另用电报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勿误为盼！

毛泽东

七月三日上午一时，书于床上。

送李先念。

二

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必须实行农工交（交通）商四项并举的方针。既要管好工业（这是城市的重点），也要管好农业；既要管好生产，也要管好流通。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四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批准李先念同志领导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彻底解决副食品问题及手工业问题的会议的报告^[1]及代中央起草的指示^[2]，现在发给你

[1] 指李先念1959年7月2日关于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们于6月18日到23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在副食品生产方面，会议一致认为，总的方针应当是城乡并举，除了乡村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支援城市以外，大中城市也应当执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手工业方面，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庆节至年底，把日用手工业的品种、质量恢复到去年8月以前的水平，数量上则要争取超过。至于手工业的所有制，可以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大多数维持现状。只有少数单位需要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个别的需要退回到个体经营。手工业产品、服务方式、生产过程、所有制都要多样化，才能适合客观需要。在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同时，对公社工业应当进行整顿。

[2] 即李先念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

们，望你们彻底遵照执行。先发副食品指示，后发手工业指示^[1]。

中央
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

[1] 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指示，于1959年8月5日下发。

关于印发两篇论述经济工作的 文章^[1]的批语

(1959年7月4日)

尚昆^[2]同志：

第2页起一篇，第8页起的一篇，共二篇，请即印发各同志^[3]。这两篇分开印，不要连在一起。

毛泽东
七月四日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6月2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十七期上登载的《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和《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说，最近有些省市理论刊物公开发表了有关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其中山西《前进》杂志第六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一文指出：大跃进中出现了某些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不正常现象；在目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不能盲目地发展“卫星”厂；不能片面强调人人当“多面手”。广东《上游》杂志第十一期发表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指出广东经济建设速度一九五七年慢了一些，1958年下半年

年又过快了一些；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最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万事仰求人的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北京《前线》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注意综合平衡，争取不断跃进》一文指出，现在国民经济出现许多不平衡，需要进行新的综合平衡工作。该刊第十一期还发表社论《产品和产值的计划要同时完成》一文，指出目前某些工业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不是先规定产品计划，而后算出产值计划来，而是先订一个产值的数字，再去凑产品计划，结果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了，产品却不符合需要，完不成国家计划。这样本末倒置，势必影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因此必须坚决按照国家的产品计划和社会的需要去安排生产。文章指出：1955年至1958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波动较大；1957年增长缓慢的原因除了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上一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有些失调；1958年流动资产积累在生产积累中的比重下降，影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近几年来，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以及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不完全相适应；原料工业资源用于基本建设部分的比重逐渐提高，而用于生产部分的比重逐渐下降。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当时正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同志。

粮食问题^[1]

(1959年7月5日)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

[1] 这是毛泽东在1959年7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1959年7月4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的批语。

[2] 指陈国栋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59年7月5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陈国栋的报告建议，在城市中继续执行粮食以人定量的办法，在农村中继续执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只是将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作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40%，农民得60%。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原定的粮食征购指标1155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原定的粮食销售指标975亿斤，则偏大了一些，可以调整为855亿斤。只有这样，补充国家库存才有保证，才能把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

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对张闻天关于国际问题的发言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7月5日)

—

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

毛泽东
七月五日

尚昆^[3]办。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1959年6月27日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关于国际问题的发言稿。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问题，关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间路线的问题，关于美英对外政策的变化的问题和对于国际形势的总体估计问题等四个方面。

[2] 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因此，在西方许多共同利害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致反对我们的。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甚至是某几个极重要的问题上，英美并不是一致对付我们，而是有严重分歧的。例如，打第三次大战问题，英国十分怕打，美国则有一部分人似乎有些想打。例如英国对苏联较美国为接近，这是因为西德攻击英国很凶，美国挤英国地盘又相当厉害的原故。例如在两个中国问题上他是一致的，而对于如果美中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话，英国是坚决反对的。对英国的变化不能估计过高，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章士钊来信^[1]的批语

(1959年7月5日)

井泉^[2]同志：

信三件，请看一下。回去，着四川文史馆负责人认真处理一下。如无大不妥处，宜予吸收，使其整理所学，较为有益。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1]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1959年7月3日给毛泽东写信说：“顷得湘潭刘柏荣书，甚为惊诧。此君名朴，所治确如朴学，性分不甚高而用力极勤。钊不得柏荣消息已三年，悠悠岁月，始终见摒于文史馆门庭之外，殊难索解。”章士钊将刘柏荣给他的信转给毛泽东，请求一阅。刘柏荣，原为四川大学教授，后调入四川文史研究馆工作。

[2]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印发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 有抵触情绪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7月5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请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
七月五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1959年6月24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第一二四号上转载的这篇材料说，据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告，有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攻击地方干部，对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各项规定也有不满，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

印发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 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7月5日)

此件^[1]请尚昆^[2]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
七月五日

[1] 这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搜集整理的材料说，国家机关的党外人士在听了各部领导人传达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解释当前国内经济情况指示”的报告后，大多数人认为报告做得及时、正确、有说服力，解决了思想问题，相信党和政府的解释，认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是可以克服的。但也有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一）对去年大跃进仍有怀疑。（二）认为去年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三）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四）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速度太快了。（五）对物资出口表示不满意。（六）对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发生猜疑。（七）对宣传、解释工作有意见。（八）对现行政策发生怀疑。此外，也有人对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缓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提出了许多建议。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7月10日)

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日

[1] 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6月22日给中央并各地、市、县委的这一报告说，我省整社算账工作已经在麦收前基本上胜利结束。整个算账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迅速的，始终实行了算账与生产相结合，加强领导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算清经济账与解决干部思想作风相结合，边清算边兑现，边鸣放边整改，不仅算清了经济方面的账目，同时也解决了干部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揭露出了不少坏分子。经过整社算账，整个农村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呈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生产高潮。当前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整社成果，结合生产解决遗留问题。

印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的 报告^[1]的批语

(1959年7月10日)

印发各同志，予以讨论。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

毛泽东
七月十日

[1] 农业部党组1959年6月29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说，冬种准备会议于6月23日至26日召开，河北、上海等14个冬种任务比较大的省市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一）1959年全国小麦总产量预计700亿斤，与1958年实产数相等或略多，比1957年增长约50%，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够连续跃进。（二）1959年冬播面积要求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数量，力争1960年小麦总产量突破1000亿斤大关。（三）要求各地在7月份和8月上半月内，把今年秋后播种冬麦等的计划肯定下来，面积和产量都要落实到包产单位。（四）到会各省市都根据今年小麦密植的初步经验，对今年冬播小麦，提出一个有相当幅度的用种量。（五）强调做好冬播前的准备工作。（六）南方有些对麦子等夏收作物不重视的地方，建议当地领导认真地抓一抓。此外，还应注意加强领导，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积极领导农民实事求是地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中央7月10日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 报告^[1]的批语

(1959年7月10日)

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日

[1] 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6月3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我省大量办公共食堂，已有一年多的历史，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优越性是：（一）可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二）适合公社化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三）便于改善群众生活。（四）办好了可以节约粮食、燃料和用具。（五）便于进行基本建设，实现炊具改革。（六）便于搞小集体副业生产。（七）便于搞好公共卫生。（八）可以养成集体生活习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学习。今后要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把中央关于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交给群众讨论，让他们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第二，教育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第三，改善食堂的经营管理。第四，各级党委必须继续加强对公共食堂的具体领导。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 胜利三十八周年的电报

(1959年7月10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巴·贾尔卡赛汗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八周年的時候，我們謹代表中國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为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在进行着热情的劳动，在工业、农牧业等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农牧业合作化的迅速完成，更为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蒙古人民所获得的各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一年来，中蒙两国人民间的亲密友谊和互助合作又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友谊和合作将进一步促进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高涨并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保卫亚洲

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祝蒙古人民共和国繁荣富强，祝中蒙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7月10日

统一认识，搞好团结，承认错误

(1959年7月10日)

团结问题。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

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

要承认缺点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他们隔十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说应该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来的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关于起草“庐山会议^[1]诸问题的议定纪录”给杨尚昆的信

(1959年7月13日)

尚昆同志：

五人起草小组^[2]，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3]六同志，成为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十一人小组起草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你们在几天

[1] 指当时正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起草小组，原定五人：胡乔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田家英（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

此信收到，今天上下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上午五时

印发王青林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1]的批语

(1959年7月13日)

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王青林1959年7月4日的这一来信说，山东省日照县去年的“共产风”刮得不大，大跃进使这个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去年农业大丰收，家禽家畜也大量增加。目前群众的生产劲头很足，已掀起了夏季生产的高潮。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生产小队都经营了不少菜园地，充分供应社员的需要。夏收后，绝大部分生产小队实行伙食供给制，食堂没有垮台，但也有个别的办得不够好。根据县、社、队的干部反映，这里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直到现在还没有分给社员自留地。（二）夏季口粮还未全部分配到户。（三）群众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但对长期吃不上肉不满意。（四）县、社干部认为现在的文件、会议太多，没有时间下基层，学习时间很少，无法提高。

对陕西省委召开工农商交协力解决 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7月15日)

—

这是一个好文件^[1]，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1] 中共陕西省委1959年7月7日给中央的这一报告说，为了迅速改变目前市场供需关系紧张的状况，我们最近召开了县以上工农商交四个方面人员参加的市场问题会议。会议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围绕着解决市场问题，工农商交各个方面在会上都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各自的和相互间的矛盾，并且基本上解决了这些矛盾。在思想认识方面，进一步统一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明确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二）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根本关键在于增加生产，增加商品的供应量。因此会议用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来落实这些具体计划。在落实计划中，一是抓思想认识的提高，一是抓四个部门的相互衔接，综合平衡。（三）相信只要各个方面都能认真执行中央有关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加生产和商品供应量，压缩社会购买力，改善经营管理，目前市场紧张的状况，在不要很长的时间内，是可以基本上缓和下来的。

二

毛注：各地都应当这样做。¹¹

[1] 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讲到：“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除各按系统制订计划外，又随时进行互相衔接，综合平衡。”毛泽东在其中的“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关于改变庐山会议^[1] 人员分组办法的建议

(1959年7月16日)

少奇、恩来、尚昆^[2]同志：

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至于各区省委书记，是否也应有一部分人（例如一半或三分之一），也照此样，改入他区，以广见闻，请你们酌定，我无定见。是否由你们找各大区区长及中央少数同志，座谈一下，以利决定？谈一个钟头就够了。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上午六时

[1]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请彭真^[1]等来庐山参加会议 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9年7月16日)

少奇、恩来、尚昆^[2]:

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3]，若干部长，三委^[4]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5]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此点亦请酌。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4] 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5]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正因病休养。



1959年7月，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游庐山。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水库。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

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批语^[1]

(1959年7月16日)

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封信时，拟题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信的主要内容是：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安排1960年计划，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

跃进速度。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过一段混乱，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逐步走上了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中，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因此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些是难以避免的。在伟大的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这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去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加上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也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此外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也是促进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而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也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感到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浮夸风气，吹遍各部门，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产生浮夸风，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研究。当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有关系。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

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于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原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一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表现。在一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通过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必须并重，不可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的“左”的方面。经过去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否则，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不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附了这封信。

转发兰州军区骑兵一师 关于政治争取工作总结的批语

(1959年7月16日)

彭德怀^[1]同志：

此件^[2]好，应发各剿匪区照办。特别是昌都区极需要此种作法。如同意，请交尚昆办理。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部1959年7月10日转发的骑兵一师6月份政治争取工作的简要总结。其主要内容是：一、班玛地区6月份的政治争取工作阵势大，力量强，取得了较大战绩，叛乱武装归降与日俱增，干群信心越来越大。二、6月份的政治争取工作除宣传和体现党的政策外，还取得了以下两点经验：（一）贯彻党的平叛方针越自觉、越熟练，效果越大。在兵力部署上，应注意对叛乱武装施加军事压力，以利政治争取。（二）争取反动头人投降，派遣归降的头人去招降，都会愈加迅速地瓦解叛乱武装。三、在执行党的平叛政策上，还存在着对党的政策有怀疑，对投降人员看法不正确，以及对待俘虏与归降者界限不清等问题。为了大量开展政治工作，所属各单位接此件后，应立即组织学习，克服偏向，纠正错误。195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兰州军区骑兵一师的简要总结和毛泽东的批语一并转发给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西藏工委并兰州、成都、昆明、西藏军区党委。

对西藏工委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会议情况和周仁山^[1]关于边境工作意见报告的批语

(1959年7月17日)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一阅，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情况。

毛泽东
七月十七日

[1] 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2] 指中共西藏工委1959年6月30日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和周仁山6月29日关于边境工作的意见给西藏工委的报告。西藏工委的报告说，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息叛乱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而召开的，同时要对当前农村工作、牧区问题等方面的若干政策作出决议，然后公布执行。开会前张国华已同班禅、阿沛等开了四天小会，并进行了个别谈话，就若干政策原则反复地充分地协商。班禅等都同意西藏必须进行改革，他们反映了不少具体情况，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提出了若干意见，也讲了不少心里话。通过交谈和酝酿，最后在政策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给大会通过决议打下了基础。周仁山的报告说，他与江孜、日喀则分工委一起召集有关干部研究了边境问题，大家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边防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控制，打击叛匪，稳定群众，缓后一步再考虑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

印发《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的批语

(1959年7月19日)

此件^[1]印发各同志研究。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6月2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十五期上登载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对1958年大跃进的一些看法：一、否定去年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农业没有并举”，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有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账可以，算经济账就不行了，其害处是：第一，影响了秋收；第二，影响了工业生产；第三，砸了水车、锅，炼出钢来不能用；第四，国家赔了23个亿。“总之是劳民伤财，很不合算，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弄得全面紧张。”四、认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一材料时，将材料的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

印发《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 议论纷纷》的批语

(1959年7月19日)

此件^①印发各同志研究。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1]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7月2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谈论我们没有公开过的某些具体数字。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不同的看法。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对我们的实际情况，由中央、外交部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以争取主动。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个材料时，将题目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

对一份关于苏联建设中遇到问题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7月19日)

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7月17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五十八期上登载的这篇材料说，苏联国家计委远景计划司司长瓦修金教授，最近对我驻苏使馆作了几次有关苏联七年计划的制定，以及在执行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报告。其中讲到：一、远景规划中关于工业发展速度问题。苏联在建设初期，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后来因每年增长的百分数所代表的实际量增大了，速度就逐渐下降。苏联的计划工作者，在远景规划中也把发展速度订得越来越低，存在着右倾思想。二、对打破平衡的争论。苏联有些人已经习惯地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这种不能打破旧比例的思想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表现最明显。三、农业发展问题。苏联的粮食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因而畜牧业发展不起来，至今肉类供应不足。四、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目前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只等于美国的一半，还有50%的工人从事手工劳动，而且七年计划后生产将增加90%，劳动力更显不足，因此必须大力革新新技术，才能保证生产以高速度向前发展，很快赶上并超过美国。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业 原材料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7月21日)

印发各同志。是一个重要建议^[1]，应当予以处理。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

[1] 中共中央军委1959年7月4日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国防工业的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原材料的数量、品种、规格的保证问题，这已成为国防工业能否继续迅速发展的关键。形成原材料紧张的原因，主要是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及其品种与数量在发展上的不平衡，反映在材料供应上必然是品种不全，规格不符。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的原材料工业在继续提高产量的同时，挪出一部分力量，积极发展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提高质量，弥补空白。而解决这一矛盾，首先要有一个平衡的计划。在管理体制上，建议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汇总，统一筹划。在基本建设上同样要贯彻大、中、小企业结合的方针。只有加速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供求矛盾。

对国家计委商计局 关于市场情况的研究材料^[1]的批语

(1959年7月21日)

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并应研究。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

[1] 指国家计委商业计划局1959年7月9日对1959年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和1960年的展望材料。主要内容是：（一）对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在中央发出六一指示和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会议之后，市场全面紧张的状况即逐步停止发展。压缩机关、团体购买力已见效果，商品供应状况开始好转。（二）对1960年市场情况的初步估计。明年的市场情况决定于今年的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的全局是好的。因此明年粮食作物有可能避免出现类似今年上半年的过分紧张局面，但棉、麻等轻工原料供应估计仍比较紧张。副食品、手工业品的情况则会比今年大为好转。（三）对稳定明两年国内市场的几点建议：（1）大搞野生植物和代用品的采集、收购工作。（2）充分地合理利用废次钢铁。（3）继续抓紧进行副食品的增产工作。（4）继续提倡节约。（5）继续控制社会购买力。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的电报

(1959年7月21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五周年的時候，我们謹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十五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久以前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地总结了波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通过了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指示。这个指示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波兰人民展示了光辉的远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波兰人民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保障欧洲安全作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波兰人民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感到十分高兴。

中国人民深信，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波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必将有助于我们两国的共同繁荣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合作。

祝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祝中

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7月21日于北京

印发阿里分工委关于 接管旧政权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7月22日)

印发各同志。读后可以知道西藏极西部阿里地区一些情况，很有益。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1] 指中共西藏工委转报的阿里分工委1959年6月26日关于接管原噶本各级政权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说，阿里地区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解散和接管了原噶本政府和四个宗级政权四个世袭本堡。接管过程中，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一）对原噶本政府和普兰、日土两宗政府的接管工作比较彻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比较深入。目前中上层中进步和反动的都是少数，多数持中间观望态度。一般群众则欢欣鼓舞。（二）对泽布兰宗、达巴宗的接管不很彻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也不够广泛深入，坏分子的活动比较嚣张。（三）对仲巴洛强宗，因为交通不便，情况不明，无法直接前去接管，只派人送去了限期交来枪支、文件的命令，目前尚无动静。

反对两种倾向，维护党的团结^[1]

(1959年7月23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2]说：孙科^[3]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1]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 吴稚晖，即吴敬恒（1865—1953），字稚晖，国民党右翼政客，积极反共。

[3]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其母是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1]。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

[1]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一九五六年好，一九五七年较好，一九五八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苏联建国四十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十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个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个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务。

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見，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1]。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

[1] 指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彪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共产风”，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剥削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

看可以的。宋江^[1]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1] 宋江，这里是口误，应该指的是晁盖。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作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哪一边，向哪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

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恩来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多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就是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不过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1]。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

[1] 左派是正确的，带引号的“左派”表示极左，是错误的。

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1]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这个，吴芝圃^[2]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百分之五十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

[1] 马歇尔（1880—1959），美国民主党人，美国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1945年12月曾被美国总统派为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1946年8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2] 吴芝圃，当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1]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少了）。食堂哪能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1] 曾希圣，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至少是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他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料到。我这样的人，少奇、总理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过去说总理、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1]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你说要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2]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薄一波^[3]建议搞在北戴河公报上，我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铁还可以炼，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含量，要为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

[1] 柯庆施，当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委员。

[2]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3] 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棉、麻、丝、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副、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嘛，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总理着急他们却根本不急。人不着急就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就办不好事情。

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1]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你们有话讲出来嘛！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听不得坏话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如果你们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已经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四十亿人民币，“得不偿失”。第二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

[1] 李富春，当时任计划委员会主任。

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远点〕。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〇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

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1]，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老板^[2]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〇七〇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1] 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2] 谭震林，外号“谭老板”，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

对《关于形势和任务》 修正草案^[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7月24日)

—

退胡乔木^[3]同志。

毛
廿四日

[1] 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7月23日印发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修正草案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的第一部分。

[2] 毛泽东在草案中“过早地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一句之前，加上了“许多同志，主要〔是〕公社干部”等语；在“现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产生的缺点经过整社、算账，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一句中，删去了“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一语。

[3]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

应安题目^[1]。

二

全国职工人数由一九五七年底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底的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职工人数的增加虽然过多过猛，增加的职工中约有一半人需要返回农村去，但是就业增加，收入增加，人民群众是高兴的。

三

但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我们的学习也还不够，因而在工作中还发生了不少的问题。我们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部分问题已经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没有解决。

[1] 《关于形势和任务》修正草案共分六部分，送毛泽东审阅时每个部分还没有题目。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写的。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1]

(1959年7月26日)

收到一封信^[2]，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

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3]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4]，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5]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

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与鼓劲两个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进行九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后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1] 这是对李云仲1959年6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一封信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李云仲的信中说，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联系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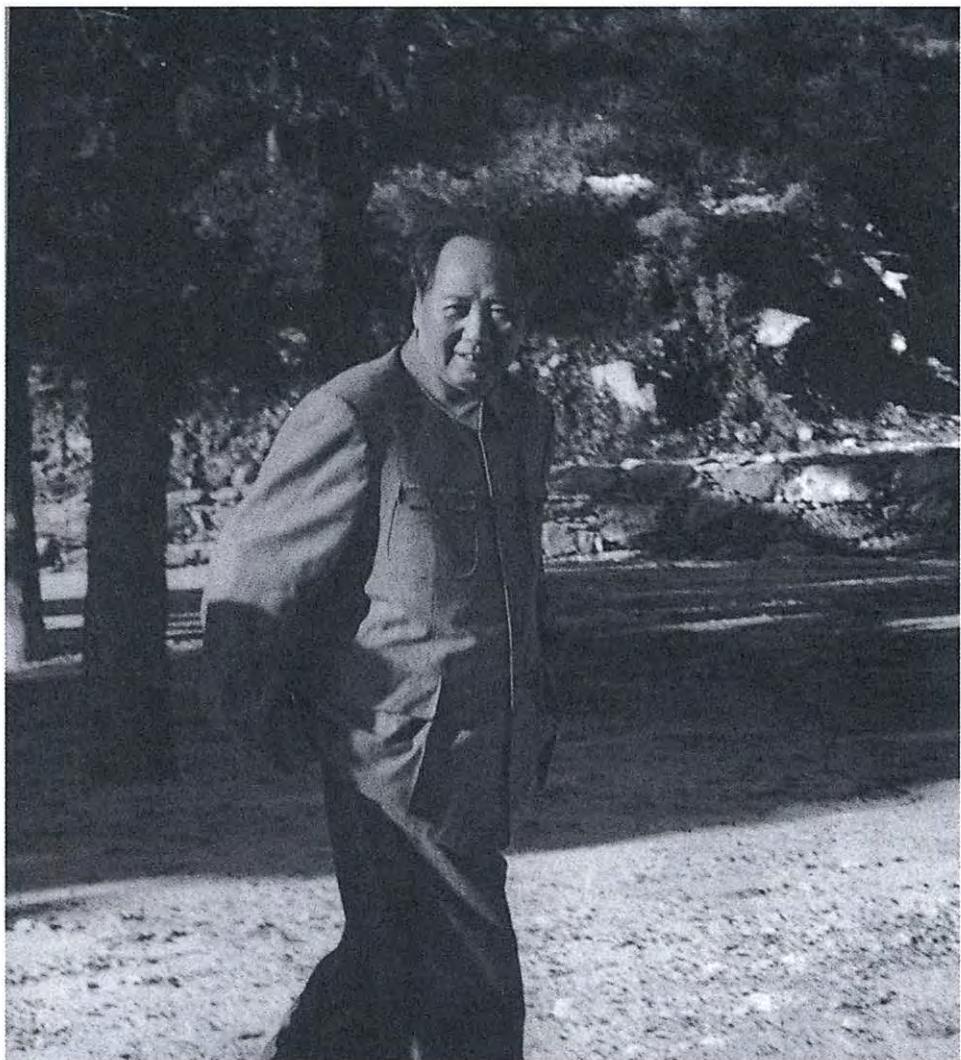
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党内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要时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侵袭。（转发这封信时，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加括号写了以下批注：“毛注：时而反对这样，时而反对那样，时〔然〕而后言，可见不是同时。”）但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们多少有些忽略了这些历史经验，因而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办水利当然是好事，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在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似乎造成了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内，不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第二，以钢为纲的方针是对的，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切。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第三，人民公社运动无疑是一个方向，是解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问题是根据客观条件逐步地向前发展。而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可能是跑得太快了，具体结果是“一平、二调、三收款”。第四，去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达1900多个，为第一个五年的两倍，几乎每省都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由于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已一减再减，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看到这些浪费和损失是很痛心的。第五，由于到处都大搞钢铁，大办各种工业，大搞各种基本建设，去年职工增加了2100万。总之，这些方面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花费得太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对任何工作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典型示范，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但去年的一些重大运动，很少是按照上述方法进行的。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巨大，但同时“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却有所抬头，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也有所发展，可否考虑在党内，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观主义在一些工作领域畅行无阻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够在党内形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

合情绪却很浓厚，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第一，去年下半年以来，以钢铁为中心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很快，农业劳力抽调太多，对今年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六级干部会议以后，农民的情绪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但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还有些问题未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还未完全调动起来。第三，最近一个时期工业品的价格有些提高，但很多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未动，因此一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不上来。第四，农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许多地区不能保证供应。第五，农业生产计划制度要研究改善。过去常说农业计划是间接计划，实际上比直接计划还要死，农民自己毫无机动。（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第一，计划工作要做好综合平衡，但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一直是顾此失彼，而且往往是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而缺少检查。第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不能归咎于缺乏经验，而在于计划工作中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很严重。几年来对国民经济情况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各方面自下而上的讨论研究，也很少考虑具体经济计划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第三，在大的运动中，往往不能正确地坚持党的原则，各部门、各地区时冷时热，只是程度上稍有不同而已。当前计划工作中另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必须尽快编制长期计划，否则许多重大的问题不能解决。（五）关于体制问题。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体制下放了一些，这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一些作用。今年在工业、物资方面又收回去一些，现在看来问题很多。比如体制变化后的工作未跟上，造成产、供、销脱节，对生产和市场影响都很大。（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铺张浪费，最近又有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第二，会议伙食标准太高。第三，领导干部生活上过分特殊的风气，有些地方仍未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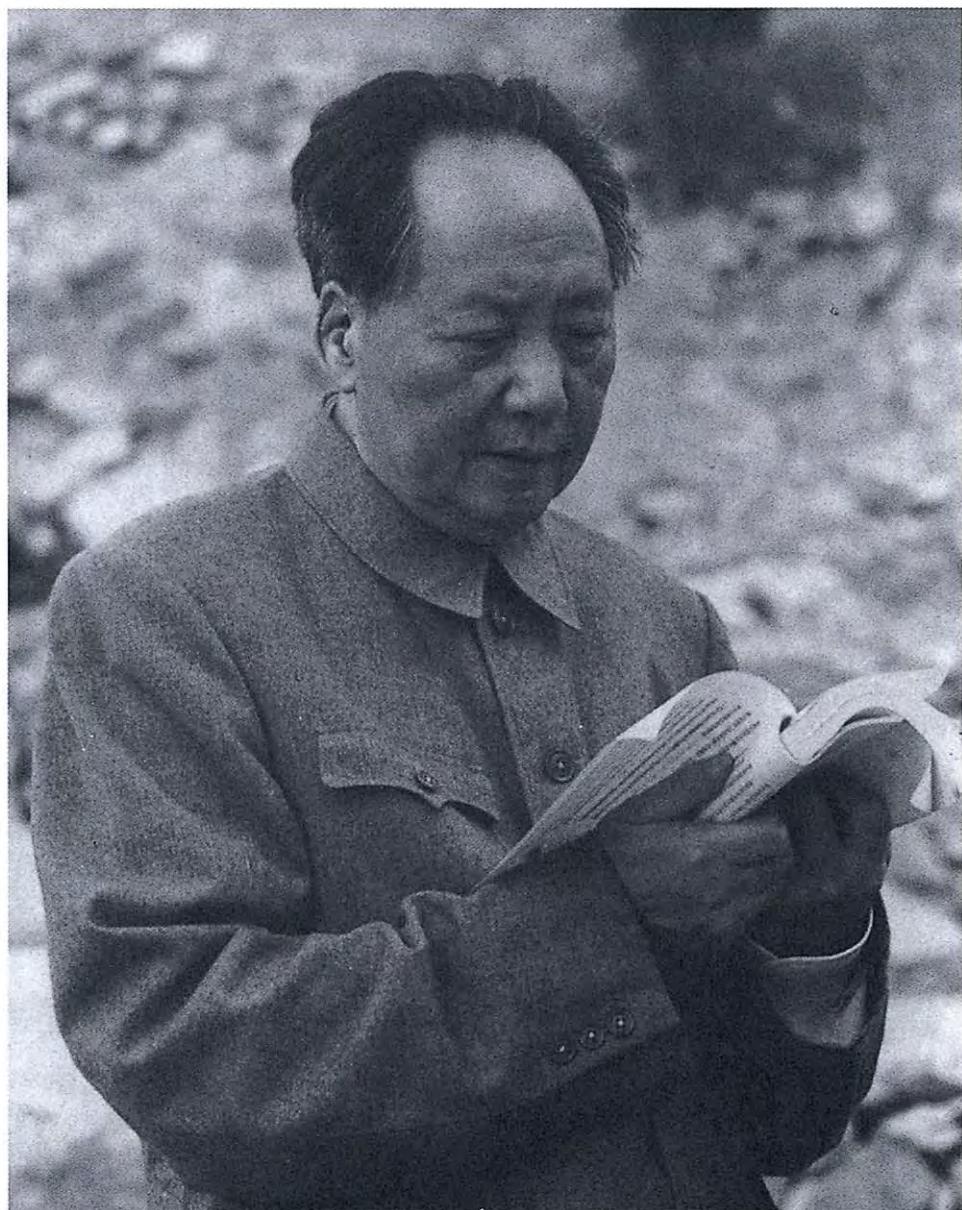
[3] 指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4]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指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



1959年，毛泽东在散步。



1959年，毛泽东在散步途中读书。

对日本首相岸信介关于中国经济现状 和前途的评论的批语^[1]

(1959年7月27日)

印发各同志。

我想请同志们看一下岸信介的话。他说：“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远景并不是不顺利的。”^[2]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他比我们的一些悲观主义者，泄气主义者，就对同一事件的评论这一点来说，不是还要好一些吗？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1] 这是对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1959年7月20日关于岸信介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给外交部的报告的批语。

[2] 岸信介的这段话是他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的。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报告中转引了这段话。

在国务院秘书厅 一份学习简报^[1]上的批语

(1959年7月27日)

立即印发。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1] 指国务院秘书厅党委办公室1959年7月9日编印的第二十五期《秘书厅学习简报》。简报说，近两周来，我厅多数单位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过程中，空气较前大为活跃，议论很多，综合整理如下：（一）关于人民公社问题。1. 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2. 认为人民公社所有制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不太适应。3.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适应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吃饭不要钱也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4. 人民公社的发展太急太猛了。5. 人民公社是群众运动搞起来的，但政策没有跟上去。有的有了正确政策，但在执行中又发生了偏差。（二）关于去年大跃进和全民大炼钢铁。1. 认为“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2. 钢的指标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地规定的。3. 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只有钢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材料^[1]的批语

(1959年7月27日)

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1]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1959年7月编印的《思想动态》第三十期上刊载的这个材料说，自5月初开学以来，省委党校学员在学习中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有近半数的学员对目前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现将他们对人民公社问题的主要看法汇集如下：（一）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的出现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是根据上级指示自上而下从主观愿望出发搞起来的，是人为的产物。（二）人民公社建立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有人虽然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适时的，但又认为全国公社化是快了，应分阶段发展。（三）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两大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的复活，其中许多提法是错误的，给下面造成了很多困难。（四）对“共产风”的来源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和省、地委应负责任；有人认为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应由下面干部负责；还有人认为中央、省委有错，下面也有错。（五）对人民公社生产方

针和分配制度的看法：（1）认为目前实行工农业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为时过早，行不通，公社应以农业生产为主，把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关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有人认为公社化后商品生产不应扩大，而应逐步缩小。（2）关于分配制度问题，认为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提得过早，应该取消。（3）认为公共食堂不是共产主义因素，害多利少。（六）对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认识：有人认为实行三级所有，说明过去公社是搞快了，现在是纠偏；有人则认为实行三级所有制是使人民公社倒退，成了无权的空架子，权力下放，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经营思想。

关于编印逻辑学文集给康生^[1]的信

(1959年7月28日)

康生同志：

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2]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3]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 姜椿芳，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3] 指姜椿芳等编辑的《逻辑学论文集》第一至第六集。

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

(1959年7月29日、8月1日)

—

此三件^⑩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⑪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

二

稼祥^[3]同志：

此件^[4]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毛泽东

八月一日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7月28日送阅的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二八三〇期上登载的《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和第二八三一期上登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等三篇文章。其中《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一文说，最近记者访问了受暴雨侵袭的广东省增城县石滩、增江两个重灾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灾民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党群关系出现了近两三年来不曾有过的密切现象。《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一文说，苏联《真理报》7月21日发表了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县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关公社方面的内容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一文说：广东省番禺县部分公共食堂停伙后，有些农民又自动串连办起一种小型的“新式公共食堂”，特点是参加户数较少，完全由社员自己管理，自负盈亏，并贯彻了参加自愿，吃饭多少自愿，吃菜多少自愿的“三自愿”原则，体现了合理负担、节约、互利等优点。目前番禺县许多社员正在酝酿组织这种“新式食堂”。

[2] 胡乔木送阅的第二八三一期《内部参考》还以《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为题，登载了中央社7月22日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在《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看来，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3] 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4] 指本篇一及其附件。

印发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当前生产 和群众运动等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9年7月31日)

印发各同志。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2]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辽宁省委转报的鞍山市委1959年7月25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8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上。鞍山市委的报告说，自7月17日开始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扭转当前钢铁生产下降局面的指示以来，鞍钢的群众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生产情况也随之趋向好转。为了保证完成8月份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和节约指标，目前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1）继续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彻底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大干苦干巧干，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季度计划。（2）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目前着重提高技术水平，精简企业多余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3）继续抓紧解决原料、材料问题。（4）采取紧急措施，解决铁路运输暂时中断后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个报告时，将报告题目改为《鞍山市委报告》。

[2] 指当时正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印发广东省委关于纠正农村副产品 自给部分过多现象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8月1日)

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1]印发各同志。各省、市、区情况如何？是否同广东相似？你们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是否认为广东省委的措施是适宜的？广东的措施是：关于农村副产品，坚决压缩供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7月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六十期上登载的《广东省委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一文。文章说，广东省委最近批转了番禺公社党委《关于当前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到，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已经收获的农副产品，产量比去年大为增加，可是作为商品的部分少得可怜，有些产品原来商品程度很高的，现在也变成自给的了。这一现象是由农村公社的分配制度上的问题带来的，即采用了产品直接分配的方法，供给部分比例太大。这是目前农村副产品浪费过多，上市量减少，市场供应特别紧张的重要原因。广东省委认为，为了缓和副食品供应紧张情况，除了采取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和压缩购买力等措施外，还必须从分配环节上去解决问题，必须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195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将广东省委关于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现象的材料和毛泽东的批语一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抄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和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二、适当限制供给部分，逐渐增加工资部分。三、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你们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照我看，是适宜的，你们以为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请你们回去研究施行。

毛泽东
八月一日

给周小舟^[1]的信

(1959年8月1日)

送周小舟同志：

“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2]。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3]喋血于友于，张绣^[4]割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八月一日夜十时

[1]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丘迟，南朝梁人，官至司空从事中郎。善诗赋文章，曾作《与陈伯之书》。陈伯之，南朝梁人，曾为北魏平南将军。梁北伐，丘迟函劝陈归梁。陈后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3] 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之长兄刘演。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

[4] 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袭曹操，曹军败，长子曹昂在战斗中身亡。曹操征袁绍时，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力战有功，任破羌将军。

如克诚^[1]有兴趣，可给一阅。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给张闻天^[1]的信

(1959年8月2日)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1]第三十四卷，枚乘^[2]《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 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收载自秦至南朝梁诗文词赋700余篇，是现存我国古代第一部质量较好的诗文选集。

[2] 枚乘，西汉辞赋家。

印发河南、湖北两省 关于抗旱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8月2日)

此两件^[1]印发各同志。今年旱区达五六省，情况严重。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的伟大的抗旱斗争，已经起来。

吴冷西^[2]同志：

各省旱情及抗旱斗争，请令新华社如实报导，鼓干劲，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人定胜天，争争〈取〉丰收。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情绪。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 指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7月30日关于抗旱保苗情况给中央、国务院的简报和中共湖北省委7月28日关于抗旱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河南省委的简报说，我省进入7月以来，普遍呈现旱象，而且日趋严重。呈现旱象初期，省委就发出了抗旱保苗争取秋季丰收的紧急指示，各级党委立即投入了抗旱斗争。现在群众性的抗旱保苗运动已经形成高潮，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旱象仍在向严重方向发展，抗旱保苗斗争进入艰苦阶段，省委要求必须同干旱斗争到底，保证抗旱斗争的彻底胜利。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我省自7月以来，旱情发展非常迅速。省委决心要抗旱保丰收，已于7月16日发出了关于防旱抗旱的紧急指示，19日又召开了全省防旱抗旱紧急动员电话会议，明确以抗旱为当前工作的突出中心，提出了战胜灾害确保丰收的几个具体措施。

[2] 吴冷西，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中央全会的团结， 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1]

(1959年8月2日)

中委、候补中委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2人，会议议程：

(一) 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二) 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等一些“左”

[1]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瘾，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月、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庐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做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争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换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

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讲策略，不会做政治工作。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的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收款”没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和错误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8月2日至17日)

一

送乔木同志：

有一点修改^[2]，请你们斟酌。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 本篇一、二、三是分别写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草案)第二、第三、第四次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晚送审的这一决议修正稿上的批语；本篇五至八是决议草案中毛泽东历次修改之处的最后定稿。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毛泽东对决议草案第二次修改稿的修改，主要是将第一页“全国广大人民，正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下，满怀信心地为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伟大的胜利成果而斗争”一句，改为：“全国广大人民，正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下，满怀信心地为争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此外，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二

即送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三位同志：

加了一段^[1]，认为有必要，不知你〔们〕以为然否？请你们讨论一次。有小部分的分析及字句，与（四）节重复，如何调整一下，亦请斟酌。

毛泽东

八月六日九时

三

尚昆同志：

此件请印20份，发常委，彭真，伯达、稼祥、乔木，七个大区组长^[2]及曾希圣^[3]。

毛泽东

八月八日

[1] 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第三次修改稿上加写的这段话，后来几经修改，正式定稿为本篇五。

[2] 这次庐山会议按协作区分组开座谈会，由各协作区主任委员任组长。各协作区的主任委员分别是：欧阳钦（东北）、林铁（华北）、柯庆施（华东）、陶铸（华南）、王任重（华中）、李井泉（西南）和张德生（西北）。

[3]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四

有点修改^⑩，在第2页，第3页，第4页，第5页。

毛
十七日

五

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此外，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当然，在国家和公社的正确的管理之下，这些成分不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1] 毛泽东对胡乔木8月16日晚送审的决议修正稿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三页“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现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句中的“一小批”之后，加括号写了“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等字；在第四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一句之前，加写了“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语。此外，在第二页、第五页，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彻底克服。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离完成还很远。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的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猖狂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除了那些查明属实的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需要开除出党以外，对于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他们善于自处，不走绝路，我们的政策恰当，把他们争取过来，重新合作，还是可能的。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

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六

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管性质如何严重，党的方针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七

犯错误的同志必须用实际行动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则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八

至于完全从拥护总路线的立场出发，向党的组织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人，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正确的，必须坚决保护，不允许有打击压制行为。

关于庐山会议^[1]简报上 应一律称同志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9年8月3日)

少奇、恩来、彭真、尚昆^[2]同志，各组组长^[3]同志：

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毛泽东
八月三日

[1] 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当时庐山会议所分各组的组长。

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 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8月5日)

印发各同志。此件^[1]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

[1] 指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1959年7月1日整理的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情况的材料。材料说，稻竹大队6月初有63个食堂，后来解散了61个。20天后，又都恢复起来，办成了89个。散伙的原因是群众对食堂议论纷纷，评价不一，干部也有矛盾心理，而直接的原因则是因为口粮紧张。后来食堂恢复的原因有三：1. 部分社员提出要办。2. 有的生产队长、作业组组长感到食堂解散后，生产难于统一领导。3. 上级领导对解散食堂提出批评。从这个大队的情况看，对食堂的争论之点基本上都是经营管理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吸引大多数群众。

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

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毛泽东

八月五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 《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1]的 批语和修改^[2]

(1959年8月5日)

—

即送吴冷西同志。如六日来不及见报，七日见报也可^[3]。

毛泽东

八月五日下午十一时半

[1] 这是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遵照毛泽东指示起草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原题为《克服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

[2] 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对社论稿还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3] 这篇社论于1959年8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二

抓紧八、九两个月，进一步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在一部分干部中新近抬头的右倾情绪，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这是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当前的迫切任务。

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8月5日至17日)

—

退恩来同志。有一点增补^[2]。

毛泽东

八月五日

—

退恩来同志。有一点修改。

毛泽东

八月六日上午四时

[1] 本篇一、二、三分别写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上。本篇四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晚送审的公报修正稿上。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公报。

[2] 毛泽东在公报初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后来几经修改，正式定稿为本篇五。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周^[1]看后，尚昆^[2]办。

四

有一点修改^[3]，在第2、第3、第4、第5页上。

毛

十七日上午四时

[1] 周，指周恩来。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毛泽东对胡乔木8月16日晚送审的公报修正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在第2页，将1959年上半年“市场供应状况曾经有些紧张”一句改为：“市场上一小部分商品的供应状况曾经有些紧张。”在第3页，将1958年“割打收藏工作进行得粗糙”一句改为：“割打收藏工作进行得有些粗糙。”在第4页，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从而使‘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可以争取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实现”一句，改为：“从而使‘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可以争取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人民日报》1959年8月27日发表的公报上，又将“八年左右的时间”改为“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第5页，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句改为：“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五

八届八中全会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以后指出，对于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来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那些根据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去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估计过低，而对于这两个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并且已经迅速克服的若干缺点，则估计过于严重。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

印发《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1]的批语

(1959年8月6日)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8月5日送阅的《经济消息》上登载的四篇文章。其中《苏联专家近来的一些表现》一文指出，近来许多苏联专家对我党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表示热烈拥护，他们感到最满意的是各地注意了生产指标的落实和提高产品质量。许多专家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积极，提出的建议也比过去增多。现在心情还不大愉快的是某些要“下马”的基本建设单位的专家。《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说，七年前曾被称为“穷棒子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去年和其他农业社合并成建明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和生活都搞得很好，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远因是合作化以来，当地党组织一直坚持了勤俭办社的原则，逐年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添置了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近因是当地党组织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作踏实，坚持了群众路线，挡住了“共产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鼓励私人养猪，办好食堂，实行“以人定量、节约归个人”的办法。以王国藩为核心的领导骨干一直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遇事找群众商量，向上级请示。《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介绍了中共长沙市委最近对郊区临福公社各阶层的政治思想情况调查，指出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一些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但他们人数很少；占农村人口最多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则是衷心拥护党，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一文介绍了国家计委一些同志最近在研究明年计划时，对调整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应当少增产铁和钢，多增产钢材；多进口石油和橡胶，多搞些这方面的基本建设，少搞些消耗石油、橡胶的机器和车辆；应多注意发展基本化学工业。

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1]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毛泽东
八月六日

印时注意次序：1. 苏联专家……；2. 王国藩……；3. 目前农村中……；4. 明年重工业……。

[1] 王国藩，当时任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主任。

给刘松林^[1]的信

(1959年8月6日)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1] 刘松林，1949年10月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结婚。当时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

娃：你要我写信
好些了？娃：老了，没
没有了。我忘了你，没
比在此时更想你。在，没
有高壮气魄天地间，
大江横流，
碧空万里，
万马奔腾。
色，白浪九天。
雪山。这是我的

其乐无穷。
用。此言消愁破闷，
久矣。

毛泽东致刘松林信的手稿。

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关于统一学员 对人民公社认识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7日)

[1]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委给江西省委的这一报告说，党校学员关于人民公社的分歧认识暴露以后，我们认真分析了产生动摇的原因，在省委的指示下，决定采取辩论、读书、辅导、总结的办法，来解决学员们的思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辩论开始后，持否定观点的人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人则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列举事例，说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学校组织学员精读马恩列斯著作，从理论上弄清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等问题；在学习中，省委负责同志前来作了五次有理论有实际的总结性报告，指出了人民公社的现实作用和深远意义。第二阶段研究和辩论了主观如何反映客观、工作方法不适当就不能实现党的方针政策等实际工作问题。第三阶段则进一步辩论了人民公社中的生产方针、分配原则等实际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全体学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在一个总支82人中的调查统计，开始时有将近2/3的人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有6个人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搞糟了。经过学习后，持肯定观点的人更加坚定了，模糊不清的人清醒明白了，持否定观点的人没有了。从这一期的教学中，我们体会到：第一，从学员的思想情况来看，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怀疑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个人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党内外一部分人的思想的缩影。第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事物达到全面正确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在未认识到之前容易发生混乱。第三，这些干部中的分歧认识，肯定是可以统一的。1959年8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四三期摘要登载了江西省委党校党委的这一报告。

印发各同志。我们谈论的江西党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的辩论，现在已经解决了。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庐山会议^[1]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江西党校持否定态度的在八十二人中有六个人，我们这里也是五六个人。我们这里持肯定态度的人比江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也比江西党校较少，这两点是不同的。两处辩论的问题全然相同，都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阵线也相同，都分左、中、右。同志们可以看一下。报告写得好，一气可以读完。请同志们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辩一场。时间秋季好，冬季好，春季也好，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作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利益。

毛泽东
八月七日

[1] 指当时在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对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 指示稿^[1]的批语

(1959年8月7日)

退彭真^[2]同志照发。

毛泽东
八月七日

[1]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稿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5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指示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稿的批语^[1]

(1959年8月7日至17日)

—

伯达、稼祥、乔木^[2]同志：

增产节约决议初稿写好了没有？不要字斟句酌，有了一个轮廓就可印发常委及你们三人，看一下，提些意见，再改为第二稿，最后改第三稿，那就是字斟句酌的阶段了。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初

[1] 本篇一是为布置起草和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三个决议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草案）的批语；本篇三是对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晚送审的这一决议修正稿的批语；本篇四是对胡乔木8月16日晚送审的这一决议修正稿以及同时送审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修正稿的批语。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稿，请即办。

八月八日，以一天时间改成反右倾机会主义那个决议^[1]，主要把我写的第三节，同第四节不调和的地方，改得协调起来^[2]，八日晚上交我看。以上两个决议，九号就要印发给一切同志付讨论了。你们则以九日、十日两天时间转到写第三个文件，即写关于彭张^[3]错误的决议^[4]，十日下午交给我看（初稿）。时间紧了，要加紧工作。以上即照办，为盼！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上午五时

[1] 指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2]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的第三节是毛泽东加写的，后来又略有修改。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4] 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发表在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

乔木同志：

此件好。有一点修改^[1]。即交尚昆^[2]印20份，分发常委、彭真^[3]、起草小组、各大区组长，征求意见。

毛泽东

八月八日

[1] 毛泽东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草案的修改，主要是将第3页讲到1959年上半年市场供应紧张“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地开始了逐步的好转”一句，改为：“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有更大改变。”将第6页“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一句，改为：“勤俭建国，勤俭办人民公社，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将第8页“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松劲情绪，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一句，改为：“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并且坚决打击这类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争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

有点修改^[1]，在第3页，第4页（七年改为八年），第8页。

毛
十七日

四

即刻送刘、周、朱、林^[2]、彭真、乔木阅，即刻看一下，如同

[1] 毛泽东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修正稿的修改，主要是将第3页“但是由于人民购买力增长得更快，市场供应曾经显得比较紧张。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有更大改变”，改为：“但是由于人民购买力增长得更快，市场供应的一小部分商品，曾经显得紧张。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必然会有根本的改变。”在此页，毛泽东还批有“注意修改处”字样。在第4页，将“我们就有可能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一句，改为：“我们就有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人民日报》1959年8月27日发表这个决议时，又将其中“八年左右的时间”改为“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第8页“为在两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一句中的“两年内”后面，加括号写了“即1958和1959”，并批有“注意修改处”字样。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意我的那一些修改^[1]，即刻付印，务于今日下午至迟晚上发到各同志手里，以便他们明日带回去。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上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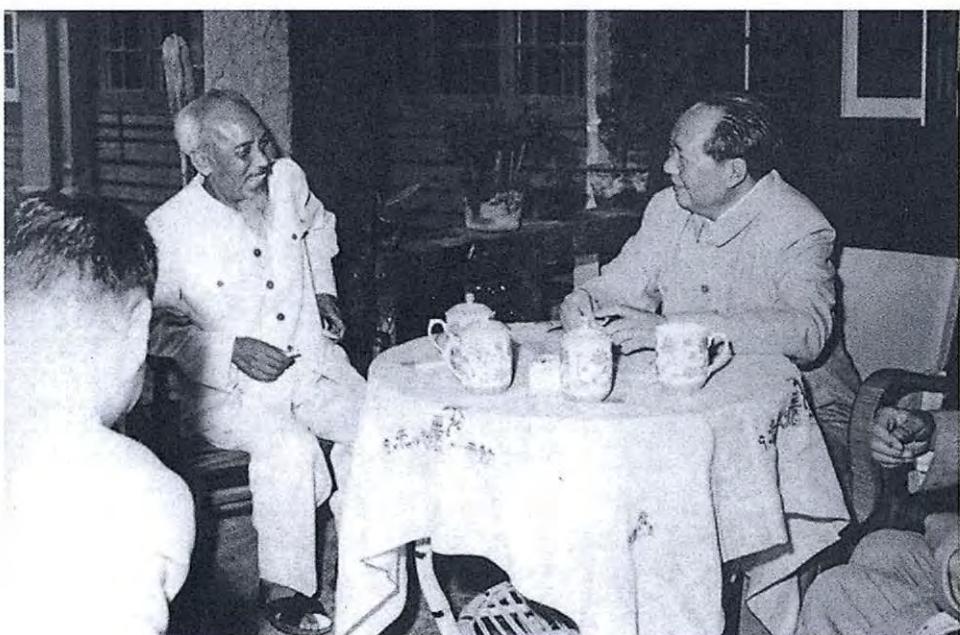


1959年8月9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胡志明等在庐山。

[1] 毛泽东对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送审的这3份文件均作了修改。



1959年8月9日，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庐山。



1959年8月9日，毛泽东在庐山和胡志明亲切交谈。



1959年8月9日，毛泽东在庐山和胡志明亲切握手。

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1]

(1959年8月10日)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2]；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恺帆^[3]。我怀

[1]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中共安徽省委1959年8月4日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并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报告的批语。安徽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做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方针政策的。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无为县委8月1日给地委并报省委的报告说：张恺帆于7月4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9日下午在下大队检查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个食堂坚决不散。芜湖地委8月2日给省委的报告说：地委同意无为县委的报告。我们认为张恺帆提出的“三还原”，特别是命令解散食堂，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方针政策的。张恺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加以研究。

[2] 这里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

[3] 张恺帆，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的错误处分。

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毛泽东
八月十日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9年8月11日)

讲讲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人生观这个词，在外国书上看得很少。中国人喜欢说人生观。其实世界观、人生观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谓人生观就是社会观、世界观，包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部分。为了通俗起见，说人生观也可以。在一部分同志中，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就是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有个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有些同志讲话只讲方法论，不讲世界观。这就是讲历来犯错误的同志，据我观察，以及中央常委和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俄国有造神论、神论和迷神论，把精神来造人。是谁呢？是不是芦那察尔斯基、波格达洛夫，他的著作我看过了，现在忘记了，马赫主义说，是奥地利和德国的，美国叫实用主义，又叫功利主义，是一个东西。他们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不承认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真理是固有的，不是个人主义的真理。由感性到理性，客观真理又变成主观真理。

主观真理是来自客观真理。同宗教不同，和主观唯心主义不

同。相反地，我们的这些同志一厢情愿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而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是客观真理，求是者是主观反映客观真理，要经过脑筋。要千百次反复地感觉，然后变成概念，山水草木、人马牛羊、鸡犬猪都是概念；人有资产阶级的人和无产阶级的人。男、女、老、幼都是概念，都是抽象来的。具体的人，张三、李四。如董老、林老、吴老，你们是老年人，你们的娃娃是青年人，你们的夫人叫女人。

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英国巴克莱的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流派，是最主观唯心主义的一个宗教家，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名言：为什么有我，因为我想。我不想，我就没有。世界也是“我思则在”，否则世界上也没有了。他们是唯我主义。

为什么要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

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1]同志错误的决议》稿的批语^[2]

(1959年8月11日至16日)

—

退胡乔木同志。有点小的修改^[3]。

毛泽东

八月十一日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本篇一、二是分别写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的两个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三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4时半送审的这一决议修改稿的批语，在这一稿上，决议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3] 毛泽东对胡乔木1958年8月10日送审的这一决议草案，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二

即退乔木同志：

即付印，今晚发给到会所有各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下午七时

三

彭真^[1]同志：

即刻照此印发。其他三个决议^[2]，一个公报^[3]，请你督促即行做最后一次修改，务于明（十七）日下午发给各同志，以便十八日各同志动身回去时能带回去照办。

毛泽东

十六日五时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3] 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给周小舟的信

(1959年8月12日)

小舟同志：

昨谈甚快。请你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我^[1]。希望今天能送给我，不然，明日送来也可。交我的秘书高智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上午六时

[1] 周小舟1959年8月13日早2时遵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8月14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给八届八中全会各同志。

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12日)

印发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气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

[1] 中共辽宁省委1959年8月9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接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我们两次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决定采取如下措施加以贯彻执行：一、立即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学习，对消极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鼓足干劲，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二、召开了全省重点企业党政领导干部及市委书记参加的紧急会议，在正在召开的全省基本建设会议上传达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并部署下半年特别是八、九两个月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三、定于8月10日召开全省工农商学兵各个战线全体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鼓足干劲，增产节约。四、上述工作完成后，立即派检查团到各地督促检查和帮助工作。同时大力提倡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对辽宁省委关于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和安排意见的批语

(1959年8月12日)

印发各同志。各省应根据〔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个较长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计划。辽宁省这个意见书^[1]，可供各省、市、自治区参考。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1] 指中共辽宁省委1959年8月7日关于辽宁省今后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由于我省国民经济发展还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的状况，因此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应当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大力挖掘企业潜力，更好地支援全国，并在此前提下，逐步扭转国民经济中某些不协调状况，使之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打算作如下安排：（一）大力发展农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增加化肥、农药生产。（二）我省重工业比例特别大，今后一般不再扩大生产规模。至于其中的薄弱环节和紧缺门类，应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下统筹安排，逐步加强和弥补。同时注意加强煤炭、电站等先行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三）根据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可能，积极发展轻工业。（四）搞好城市建设，大力解决各城市严重缺水问题，适当发展城市煤气工业，注意有步骤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适当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五）大力发展水产事业。

对商业部党组关于支援 抗旱、防洪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13日)

已阅，很好。退程子华^[2]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1] 商业部党组1959年8月7日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为了积极支援各地抗旱、防洪工作，商业部目前已成立专门办公室，负责与有关省区联系，以便了解并及时督促检查救灾工作。在救灾物资供应方面，拟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在抗旱、防洪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要优先供应灾区。（二）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要求非灾区积极主动支援灾区。（三）受灾地区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地方资源，就地取材，就地使用，并进一步清仓，充分发挥现有库存力量。在已成灾地区，商业部门还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帮助灾民发展多种经济，做好灾民生产所需原料的供应和成品的推销工作，做好灾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保证灾民药品的供应，并及早做好防寒取暖物资的准备。

[2] 程子华，当时任商业部部长。

印发鞍钢克服右倾松劲情绪 厉行增产节约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8月14日)

印发各同志。请令各重点企业研究鞍钢的经验。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1] 中共鞍山市委1959年8月8日给辽宁省委的报告说，接到毛主席7月31日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的批示和省委常委8月3日至5日扩大会议的指示精神后，受到极大鼓舞，决心立即采取下列措施，进一步克服右倾松劲情绪，迅速地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一、立即在广大干部和职工中，开展学习和宣传《人民日报》社论《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运动，使他们从思想上充分发动起来。二、抓紧当前有利时机，迅速地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三、认真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四、加强薄弱环节的领导，抓紧重大措施的实现。五、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分秒必争，按日、按班完成国家计划。辽宁省委1959年8月11日将这一报告批转各市委并报中央。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 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9年8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解放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忘我的劳动，发挥了无穷的创造性，以千里马的快速步伐，胜利地提前两年半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值计划。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朝鲜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为缓和远东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朝鲜人民广泛开展的要求美国侵略军队撤出南朝鲜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普遍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

持兄弟的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坚信美帝国主义一定会被赶走，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一定胜利。

一年来，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和亲密合作，在谋求两国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事业中更加巩固和发展了。这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事业具有重大作用。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自己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兄弟人民的亲密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8月14日

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

(1959年8月15日)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第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

(1959年8月15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乓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

[1] 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一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刘澜涛1959年8月2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写信说：“为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我同我周围工作的两位同志选择节录了毛主席和列宁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论述。”“这本小册子，是由我编好后，经团中央同意后印的，现送上一份，请有暇时看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节录了毛泽东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1917年8至9月《国家与革命》、1907年2月《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21年10月《十月革命四周年》、1919年6月《伟大的创举》、1907年7月《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七期上。

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弯〉”“一转弯〈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1]，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是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2]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

[1] 巴黎公社是法国巴黎工人1871年3月18日举行武装起义成立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用无产阶级政权代替被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由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注意团结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对反革命又过于宽大，使得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对起义的群众进行大屠杀。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

[2] 指1905至1907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它成为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预演。

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1]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2]，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1] 指列宁1919年6月《伟大的创举》和1921年10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均被节选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毛泽东下文引用的几句话，均出自这两篇文章中被节选的部分。

[2]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

(1959年8月16日)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2]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

[1] 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二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59年8月15日在一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铅印件上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短信说：“那个文件系刘澜涛同志和其他两个同志选集的，印时把北京来信漏掉了，没有把刘澜涛同志的信一道印上去。现送上给你看。”刘澜涛来信，指刘澜涛8月2日为送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小册子给彭真的信。后来印发《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时，毛泽东批示将彭真和刘澜涛的信都附印在后面，并将彭真的信抄改了一遍。

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1]，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2]，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

[1] 高，指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指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1]、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

[1]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罗章龙，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张国焘，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1979年死于加拿大。

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适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关于枚乘《七发》

(1959年8月16日)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1]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2]、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膴，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元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3]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讌，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滯、永久而

[1] 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

[2] 宋玉、景差，均为战国时楚国辞赋家。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3] 巴夫诺夫，今译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

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涩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

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1]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2]所收曹植^[3]《七启》，张协^[4]《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1] 刘濞，西汉诸侯，封吴王。

[2] 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收载了自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词赋等700余篇，是现存我国古代第一部质量较好的诗文选集。

[3] 曹植，三国时魏国诗人。

[4] 张协，西晋文学家。

一次讲话

(1959年8月17日)

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鞍钢工厂和耕田不同，耕田慢一点快一点没关系。工厂技术那样复杂要听指挥。像乐队，没有指挥，一群人就不知所措。这就是生产秩序，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交通警察不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纪律将会更加森严，上街可能要排队。不信，请你注意健康，再活一百年，就可以看到。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布朗基主义者“左”得不得了，巴黎公社是无政府主义者搞起来的，但是群众超出了他们的意志，被迫不得不搞。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船要有船长，组要有组长，无非他们要搞派别活动，反对敌对的派别。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的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常委会的同志年纪都大了，总要办交代，总要新的人来代替，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对破坏，无产阶级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你要讲破坏，我就不能谦虚了。列宁说你

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地方上也有这个问题。省、地、县都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但要有一个过程，不然不行，每个县、公社都要如此。河北昌黎县委就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有意识地健全我们的领导机关，当挡的风挡回去，很有必要。彭德怀二十四日信没有通知讨论，我告诉两方面都要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公道，□□到昨天以前还硬着头皮顶住。

这次会开得很好，逐步发展，中期、后期解决了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我建议地方的会议不必等都到齐了才开，到一半人就可以开，有老兵有新兵。这次会议是胜利的会议。避免了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马鞍形。大跃进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的，是群众的要求。革命和建设两个运动，搅在一起，是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比如农械问题，东北是工业化地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其他地区也要力争嘛！国内形势是好的，有的同志欢迎中央的同志去看，有些同志不去看。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两种看法，有缺点可以改，并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印度、印尼要搞和平，但如果准备夺取政权，是要犯错误的。这与和平民主新阶段不同，因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一化三改，一条是现在的建设路线。去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今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仅一年多，出了乱子，不是说路线不行了吗？经过这次会议，又说行了。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并非太平无事。将来风波还是有的，但总的趋势是好的，不管出什么乱子，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总要占优势，即使不占优势也是暂时的。现在建设有了保证，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是团结一致的，但也要估计到不是那样风平浪静，

自然界的台风年年要来的，政治上的台风什么时候来，料不到，但一定时期内，总会有的，因为有阶级存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是没有战争的可能，一定要有准备。

给赫鲁晓夫^[1]的信

(1959年8月17日、21日)

—

请总理带交陈毅^[2]同志办。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您8月7日给我的信和附来的您同艾森豪威尔^[3]所交换的信件副本已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转交给我。非常感谢您的这项通知。美国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邀请您去访问，这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又一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次重大的胜利。我深信，即将到来的您对美国的访问必将使美国好战分子们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祝您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共产主义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对张闻天^[1]来信的批语

(1959年8月18日)

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2]。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1] 张闻天，又名洛甫。

[2] 张闻天1959年8月18日上午给毛泽东的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为感动。”“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所以我没有去见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封信时，拟题为：“洛甫同志8月18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 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1]的信

(1959年8月19日)

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三位同志：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进行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2]），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社^[3]，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人民日报》1959年8月18日发表《靠大集体之力，兴大协作之风》一文，介绍了广东省增城县石滩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迅速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水利工程的事迹和河南省长葛县坡胡公社工农商协同作战，巧胜严重干旱，力争把灾年变成丰年的事迹。

[3] 指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当时的社长是王国藩。

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的同志们一道去办。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二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三十天、四十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二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1]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习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此书出版及我的文章，国庆节不可能，最快要到秋天、冬天，最慢要待明春，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此信你们看后，如以为可，交尚昆^[2]同志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县三级及新华社、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另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于庐山。

[1] 指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卡斯特罗^[1]关于发展 中古关系的建议的批语^[2]

(1959年8月19日)

周恩来、陈毅^[3]同志：

这件事处理了没有？似宜派一位相当于公使或代办级的有政治头脑的同志去，以新华社分社长或记者资格驻古巴，是否可行，请酌。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1] 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1959年8月4日给外交部、外办、中联部的电报上。电报说，在古巴期间，卡斯特罗两次接见了我们。在谈到古巴和中国的关系时，他说应当把事情想得远一些，建议设法在哈瓦那的新华社机构中增加一位中国方面的较重要的人，作为中国的非正式的代表机构，进行宣传和各种联系工作。这样逐步把各种工作进行起来，将来水到渠成，就可以正式替代蒋介石方面驻古巴大使馆。

[3]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中央转发青海省委第十二次 全体会议简报的批语

(1959年8月19日)

这个报告^{[[1]]}很有用，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八月十九日

[1] 中共青海省委1959年8月13日给中央的这一报告说，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扩大）于8月1日召开，首先讨论、布置了今年的粮油征购工作，然后根据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立即转入反对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斗争。省委决心用八、九两个月的时间开好这次会议（包括安排下半年生产工作在内），把反右倾斗争搞深搞透，对犯错误的人进行具体分析，弄清他们的错误性质，要求他们痛改前非，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同时通知各地，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学习中央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运动，并拟在十、十一月间集中进行州、县级党组织内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省委在会议期间还对当前工业、农业、畜牧业生产作了具体部署，号召群众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19日)

河北省的情况极好。发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1] 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8月17日给毛泽东、中央的这一报告说，省委在接到中央8月7日下发的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进行了讨论，总的精神是：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彻底批判和纠正部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鼓起干劲，大战八、九月，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建设跃进计划，迎接国庆十周年。目前全省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彻底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省委确定：(1) 各级党组织都要集中时间，展开对右倾思想的彻底批判，发动职工利用多种形式检查领导上的右倾思想，鼓足干劲，超额完成任务。(2) 各地区召集重点企业的党政干部开会，对右倾思想进行检查批判，制订新的增产节约计划。(3) 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促进增产节约新高潮。省委认为，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必须与当前的生产和工作密切结合，既解决思想问题，又使生产、工作迅速跃上去，而这一工作的关键则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 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1959年8月22日)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值此罗马尼亚解放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罗马尼亚工人党、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十五年来，勤劳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罗马尼亚已经完全改变了解放前的经济落后状态，成为具有先进的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罗马尼亚人民为胜利完成1959年经济建设计划和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进行着忘我的辛勤劳动。

罗马尼亚人民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为维护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奉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它在发展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友好联系、反对帝国主义的

战争和侵略政策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欢欣和鼓舞。

中罗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近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关系正在进一步地发展和巩固。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两国的共同繁荣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加强。

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

祝中、罗人民间的兄弟友谊如松柏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文章

(1959年8月23日)

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1]四同志：

此版右角甘薯问题^[2]，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五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八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六时，倚枕

[1] 伯达，即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家英，即田家英（1922—1966），四川成都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9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的《关于甘薯翻藤问题的讨论》一文。

对黃克诚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1959年8月24日)

—

克诚同志：

信^[1]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

大进一步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1] 指黃克诚1959年8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本篇三就写在这封信上。

—

此信^[1]及黄来信送刘、周、朱、林、彭真^[2]同志一阅，尚昆^[3]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

刘、周、朱、林、彭真阅，退毛。

已复，欢迎他这种态度。

[1] 指本篇一。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 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1]

(1959年8月24日、9月14日)

—

少奇同志：

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2]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问题给刘少奇的信。本篇二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书面建议，载于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2]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我月底可回。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于杭州

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1]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1959年9月17日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1959年8月29日，毛泽东参加李敏、孔令华的婚礼。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 和市场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9年8月30日)

—

此件^[1]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

[1] 中共贵州省委1959年8月27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 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得到解决。2. 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中央
八月三十日

—

刘、彭真^[1]阅后，尚昆^[2]即办。要印几千份。

毛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 会议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30日)

—

发各省、市、区党委，在京各同志，各部、委党组。竞赛的方针提得很正确，全国都应当这样做。

中央
八月三十日

[1] 中共浙江省委1959年8月28日给中央、上海局的这一报告说，省委于8月23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确定本省1959年工农业增产的主要指标，并且着重讨论了如何鼓干劲、争上游，开展劳动竞赛，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的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环节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一个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群众运动。大家体会较深的是：(1) 劳动竞赛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表现，因此在竞赛中必须树立总路线的思想。(2) 开展竞赛必须是群众性的竞赛，竞赛的指标、措施，必须落实到群众当中。(3) 竞赛中必须发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

刘、彭真^[1]同志阅，尚昆^[2]办，如贵州例。

毛

-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吴冷西^[1]报送的八届八中全会宣传计划和人民公社调查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9年8月31日)

电话告吴冷西同志：

信^[2]及附件^[3]看了，很好。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吴冷西1959年8月31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宣传，都已拟订了初步计划，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人民日报》社论计划中，还增加了两篇，一是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另外，我们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将在第七版上发表。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现正在积极进行。各省对此十分热心，大都书记挂帅，组织大批人马下去，准备从中选些好的典型材料送给我们。我们也已组织了50多人下去支援。

[3] 指吴冷西报送的《人民日报》关于宣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初步计划、新华社关于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的报道计划和关于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简报第一至五期。

印发《关于公社问题的材料》的批语^[1]

(1959年8月31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1] 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1959年8月29日报送的3份材料：一、中央宣传部1958年1月7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期上登载的《有关“公社”的一些资料》，内容包括：1. 对“公社”一词的解释；2. 公民公社，共产主义联合体；3. 巴黎公社；4. 苏联农业公社。二、苏联加·安·库尔巴诺夫关于十月革命初期一个公社情况的回忆。三、苏联大百科全书旧版中的“农业公社”释义。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些材料时，拟题为《关于公社问题的材料》，并将其中第二份材料拟题为《第一个俄国公社的回忆》。

在北京市委关于京郊涝灾 和抢救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8月)

大问题。

江青阅。

老下大雨，菜量大减。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9年8月14日关于北京郊区涝灾和抢救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自8月6日暴雨过后，13日北京地区又下了一场大雨，郊区菜地受灾严重，近几天蔬菜上市量日渐减少，供应十分紧张。今后一段时间内，上市蔬菜还会减少。目前正在从各方面想办法，力求增加供应。

关于阅看《人民日报》两篇文章 给林克^[1]的批语

(1959年8月)

共两篇^[2]，6版一篇，7版一篇，都可看。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1959年8月22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登载的哈尔滨经纬小学语文教师张兆英的《我怎样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和第七版登载的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副研究员王绶琯《射电天文学——打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旁当，毛泽东都批有“林克阅”字样。

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 给臧克家、徐迟^[1]的信

(1959年9月1日)

臧克家、徐迟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2]，录上呈政〈正〉。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

[1] 臧克家，当时任《诗刊》主编。徐迟，当时任《诗刊》副主编。

[2] 两首七律，指《到韶山》《登庐山》，当时均未在《诗刊》上发表，后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

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

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泽东

九月一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9年9月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勤劳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近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全面胜利，为越南人民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在越南人民正在以高涨的劳动热情为实现发展和改造经济、发展文化的三年计划而努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和严格地履行日内瓦协议，为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和实现祖国的统一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赞扬和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

坚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维护日内瓦协议和制止美国分裂越南、破坏印度支那和平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赢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

一年来，中越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和全面的互助合作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共同斗争中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从而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

祝中越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在李富春^[1]关于国家计委等单位 最近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9年9月2日)

电话告富春：

此件^[2]及前件^[3]均已看过。同意他们会议的安排。

毛泽东

九月二日

[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 李富春1959年9月1日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从庐山开会回来已10天，除布置计委和各部着手搞明年的计划外，主要是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的决议。从8月26日起，国家经委、建委、科委和计委党组共同开会讨论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问题。30日下午又召集了扩大的四委党组会议，中心是要把思想搞透，特别是要克服计委干部中的混乱思想，认识总路线，维护总路线，在克服工作上的缺点错误过程中来贯彻执行总路线。在9月15日左右，争取先搞一个明年计划的纲要（准备提出以钢为纲的三个不同的方案作比较）。在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搞明年的计划工作中，要求计委的干部把方向和方法两个问题搞清楚，这样思想才能一致，方法才能提高，计划才能做好。

[3] 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1959年8月给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

转发湖南省委扩大会议 情况汇报的批语^[1]

(1959年9月2日、3日)

—

彭真^[2]同志：

此件^[3]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同时印发军委扩大会及外事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九月二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1959年8月30日关于省委扩大会情况给中央的电话汇报上；本篇二、三写在湖南省委9月1日关于省委扩大会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书面报告上。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指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1959年8月30日的电话汇报。汇报说，省委扩大会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了今年主要产品的跃进指标。二、突出地抓了当前的生产。三、对于生活安排问题，强调当前主要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口号是：鼓足干劲搞生产，精打细算过日子。四、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

二

此件^[1]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日

三

刘^[2]、彭真同志阅，尚昆^[3]办，另印如前示。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9月1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书面报告。报告补充说，这次会议提出了抓好当前工作的几个关键：第一，迅速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第二，加强领导，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第三，坚持政治挂帅，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第四，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指挥生产。

[2] 刘，指刘少奇。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关于团结一切在我国工作的 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的指示

(1959年9月4日)

一

此件^[1]发给各有关部门和同志。

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志及其他外国专家同志，和我们一道，反右倾，鼓干劲，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好好说服他们。总之，要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好好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

中央

1959年9月4日

二

刘、周、林^[2]、彭真阅后，尚昆办。

毛

[1] 指国务院外国专家局1959年8月26日整理的《苏联专家认为反右倾保守很好，希望能反彻底，并称赞中国人民干劲大》的材料。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扩大会议 情况汇报的批语

(1959年9月4日)

—

此件^⑩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办理。

中央
九月四日

[1] 中共上海市委1959年9月2日给中央的这一电话汇报说，我们从8月28日开始举行的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精神，反响很大，提高了干部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今后会议准备分三个阶段进行：一、首先搞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本质，肃清其影响。二、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讨论深入后，逐步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吸取教训，提高政治觉悟。三、认真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总路线，总结去年以来的经验，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以上每个阶段大约各需五天时间，一般规定半天开会半天工作。会议预计在15日结束。

二

刘、彭真^[1]同志即阅，尚昆^[2]立即以电报发去，今日办完为盼。
可不另印。

毛泽东
九月四日上午四时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三级干部会议 情况汇报的批语

(1959年9月4日)

—

此件^[1]很有参考价值，发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

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

—

刘^[2]、彭真同志阅后，尚昆^[3]即办。

[1] 中共贵州省委1959年9月2日的这一电话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贵州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形势、揭露矛盾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总的看来，绝大部分同志是拥护党的总路线的，有糊涂看法的同志，多数都主动作了检讨，得到了教育。二、有右倾思想和在大风浪中曾暂时动摇的同志，多数是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因而对去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发生了怀疑。三、从9月3日起，将重新划分小组，分别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批判。

[2] 刘，指刘少奇。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请班禅^[1]来京 参加国庆问题的批语^[2]

(1959年9月4日)

少奇、恩来、彭真^[3]同志：

现离国庆只有二十几天了，宜劝班禅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回拉萨，准备于九月二十日左右飞兰州，下旬来京参加国庆。如何，请酌定。张国华^[4]宜于九月十日以前返回拉萨。请彭找张谈一下，准备起程。

毛泽东
九月四日

[1]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西藏工委1959年8月29日关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在日喀则开展民主改革的一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上。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在西藏军区关于印军入侵雅斜儿 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9月4日)

周、陈^[2]同志：

雅斜儿的印军跑了，廿六日跑的，是在廿五日 migiad (米基顿) 即朗久区一打^[3]的影响之下跑掉的。请与总参谋部联系，侵地未跑的还有几处，告我为盼！又，雅斜儿在什么地方^[4]，亦请查告。

毛泽东
九月四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1959年9月1日24时关于对雅斜儿印军侦察情况给总参谋部、外交部的报告。

[2]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1959年8月25日，一支印度武装部队侵入属于我国领土的朗久地区，袭击我马及墩（即毛泽东批语中的“米基顿”）边防哨所，挑起武装冲突。我边防部队为了自卫，被迫予以还击。

[4] 雅斜儿，位于东经 $93^{\circ}12'$ ，北纬 $23^{\circ}38'$ ，是在中国境内，而且在“麦克马洪线”以北。

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 评论问题的批语^[1]

(1959年9月4日)

乔木、冷西：

(一) 此件也似可发表；(二) 日本及西方的一些有利评论，宜大量发表，污蔑评论，也要发表，加以驳斥。反华越恶毒，对我们越有利，因为敌人处在被动地位，不得翻身了。以上请酌。

再者：过一会，例如在国庆节后半个月的时候，将赫鲁晓夫反公社的演说^[2]，在人民日报发表，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是否可行，请先想一下，届时中央再做决定。

毛泽东

九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1959年9月2日关于伊报刊对我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等文件的反应给外交部的报告上。报告介绍了伊拉克一些报刊纷纷登载我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及有关文件，发表评论赞扬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情况。《人民日报》1959年9月5日发表题为《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鼓舞人类》的新华社电讯稿，介绍了伊拉克报刊的这些反应。

[2] 可能指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县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人民日报》后来没有发表赫鲁晓夫的这一演说。

关于发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报纸 对我八届八中全会报道情况^[1]的批语

(1959年9月4日)

乔木、冷西^[2]同志：

[1] 指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1959年8月31日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的电报和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1959年8月30日给外交部的电报。驻捷使馆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一）从8月28日到30日，捷中央各报继续报道了我党八届八中全会和人大常委会的情况，版面突出，标题也很有力。其着重点如下：（1）中国成就大。（2）人民公社好。（3）八中全会决议正确。（二）一些报纸发表了评论，主要之点是：（1）指出了八中全会的意义。（2）强调我国成绩伟大。（3）分析了我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4）对我调整计划进行了评论。（5）关于反右倾斗争问题，除《红色权利报》外，其他各报没有提及。驻民主德国使馆的电报说，民德各党派、主要群众团体和军队的报纸，对我八中全会公报及决议均非常重视，其宣传口径和我公报精神基本上是吻合的。各报都强调我国去年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今年是继续大跃进。对我修改1959年计划问题，还作了解释工作和正面的估计。同时还有意识地帮助我们反击西方报纸的宣传。《人民日报》1959年9月5日发表题为《人民公社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分别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的上述反应。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关于发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报纸对我八届八中全会报道情况的批语

此两件似可以通讯方式由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等发表，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请酌。

毛泽东
九月四日

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1]

(1959年9月5日)

—

人民大会堂的建成确实是成绩伟大，你们这么大的功劳，是不是立块碑吧！那将多大呀！照相吧！也站不下呀！

要向老红军学习，不为名，不为利，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红军打仗也没有礼拜天，没有休息，没有加班费，还是学习老红军吧，要和老红军一样。

—

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1] 1959年9月5日，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工程。本篇一是毛泽东视察了礼堂的一二层和上海厅后的指示；本篇二是毛泽东看了宴会厅，询问了工程情况后的指示。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 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 第二次简报的批语

(1959年9月6日)

—

此件^印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九月六日

[1] 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9月3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简报说，省委全会八次会议已经结束了关于增产节约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同志们一致拥护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认为调整后的1959年国家各项主要指标是积极可靠的跃进指标，只要坚决反掉右倾思想，认真采取有效措施，是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存在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了今年全省工农业的各项主要指标。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刘、彭真^[1]阅，尚昆^[2]办。另印如前示。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反映有些省市揭发本地区个别高级干部右倾言行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1959年9月6日)

少奇、彭真^[1]同志：

此件^[2]似可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另印发北京各单位，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外事会议各同志，四委^[3]各部会议各同志，农林财贸会议各同志。请酌办。

毛泽东
九月六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1959年8月30日整理的《有些省市揭发了本地区个别高级干部的严重右倾言行》的情况简报。

[3] 四委，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

对苏联《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摘要^[1]的批语

(1959年9月6日)

陈伯达^[2]同志阅，退毛。

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的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

毛泽东
九月六日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9月3日给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报送的苏联经济学硕士И·格洛托夫《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摘要。这篇文章原载于1959年9月2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该文最后提到公社，认为“借助于社会主义国家巩固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其公有化的水平，并不意味着将农业组合变成公社”，“而在共产主义下，公社作为一定所有制占有者的集体，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所有社会财富都是全民财产”。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1]

(1959年9月6日、10日)

—

陈伯达同志：

“驳谬论”^[2]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

毛泽东
九月六日

座谈会上，此件给他们看。

—

本刊讯 本刊九月三日《驳……谬论》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同

志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请他约国家统计局的同志们开一次座谈会，加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和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及其他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现将陈伯达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回信^[3]及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结果写出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一文，刊载于此，以供读者研究。

三

冷西同志：

另件^[4]请付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请他们于明日（十一日）登载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日下午七时

[1] 本篇一是为研究新华通讯社1959年9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六二期上登载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的信。本篇二是为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发表陈伯达给毛泽东的复信和国家统计局《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拟写的“本刊讯”，毛泽东还为这篇“本刊讯”拟了《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这个标题。本篇三是为在《内部参考》发表陈伯达的复信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给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的批语。

[2] 指国家统计局党委《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

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文章还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3] 陈伯达1959年9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写信说，9月7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合适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对于某些论点，大家觉得还可以提得更妥切、更完全些。会上提到了以下几点意见：一、认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对比关系。二、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三、比例关系基本上合适，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某些个别或局部的暂时性失调。四、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五、解决个别的、局部的失调问题，调整某些比例关系，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发展生产方面着眼。陈伯达在信后附送了国家统计局根据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

[4] 指陈伯达1959年9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的信，国家统计局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和毛泽东为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写的“本刊讯”。后来均载于1959年9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六期。

关于请郭沫若^[1]修改《到韶山》 《登庐山》两首诗给胡乔木^[2]的两封信

(1959年9月7日、13日)

—

乔木同志：

诗两首^[3]，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九月七日

[1]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2]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3] 指毛泽东1959年6月写的《七律·到韶山》和7月1日写的《七律·登庐山》两首诗。

二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1]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1] 指《七律·到韶山》一诗中“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 十五周年的电报

(1959年9月8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同志：

当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十五年来，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忘我的劳动，把自己的祖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国家。最近以来，保加利亚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高潮，正在信心百倍地为争取在三四年內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而英勇奋斗。保加利亚人民一贯忠实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所获得的这些巨大胜利和成就感到无比的兴奋。

在国际事务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一贯同情和支持亚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且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中保两国人民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兄弟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亲密合作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合作将大大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的共同繁荣和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

(1959年9月9日)

—

此件^①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

[1] 指彭德怀1959年9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表示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批判，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允许他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

二

即送刘、周、朱、林、彭真^[1]同志阅，请尚昆^[2]办。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59年9月10日，毛泽东视察密云水库，听取张光斗等人汇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9年9月11日)

会开得好。

起心不良，走到反面。

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要论这一点材料是充分的。

彭德怀不如孙中山。

高彭都是“军党论”，彭的“小资产阶级『阶级』狂热性”“得不偿失论”“人民公社搞糟了”“阶级关〔系〕紧张”“反‘左’比反右难”“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最多”等等，难道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气味吗？

同路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借彭黄教育广大群众。大多数善良人能进入共产主义。

五次路线错误，极其严重。

阴谋分裂活动，违反铁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团结旗帜的必要。为全民族在几个五年内建成强大国家，必需铁的纪律，必须团结起来。

形势极为有利。一个月『月』内，形势大变。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

军队的任务。

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搞好，一定可以搞好的。

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理〈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

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觉悟。我们大家都要帮助他（其他人也一样）。我相信，他会改好的，只要他肯改，我们肯帮。

他把95%的同志的政治觉悟，低估了，把他自己的能力、威望，高估了。

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他肯改，我们肯帮，一定会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孔子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

要准备听几年闲话；要诚恳待人，不讲假话；要靠拢大多数。如此就一定可以变过来。否则不能。

“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

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

我学会了游水。一有意志，万事皆成。我劝同志们也和我一道学习。事务太多，时间不足，然亦可以挤一点。养成学的习惯，就能学下去。

我们战胜地球，建立强国，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目的一定可以『以』达到。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9月11日)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

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

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

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一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反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

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是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一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1924年，一个是1938年，1939年，1940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的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

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得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话，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Q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癫痫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癫痫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没有主动。

你没有主动，大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

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话。再一个要靠拢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则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话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话，又不靠拢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好像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话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许多东西我没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没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

好的，以前就没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去，戴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驳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没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鲨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门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场高声答应：好！）叫□□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过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钱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钱嘛，一小时一块钱嘛，他

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礼拜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请□□同志给你们讲一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钱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钱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话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一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钱，人民他不要，你算钱他不要，如果要算钱，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钱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须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志，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做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一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工业交通 进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9月12日)

—

此件^印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九月十二日

[1] 中共甘肃省委1959年9月6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我省工业交通战线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仍是继续跃进的形势，工业发展速度仍然是很高的。但自6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均呈节节下降的趋势，形成今年继续跃进中的马鞍形，主要原因是在部分干部中开始滋长着一种新的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了这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又重新作了审查和调整，对主要行业和产品，都提出了新的增产节约指标。领导干部开始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工人群众情绪更加高涨。目前我们提出的行动口号是：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大战九月份，迎接国庆节，抓紧四季度，为在今年内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

少奇、彭真^[1]同志阅后，请尚昆^[2]用电报发去。

毛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办。图为毛泽东在开幕式上。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开幕式上欢迎运动员入场。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向运动员挥手致意。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席台上。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席台上观看表演。中为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



1959年9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观看体育表演和比赛。



1959年9月，运动员向毛泽东等献花。

对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胜利》一文的批语

(1959年9月14日)

—

此件^[1]看过，很好。

退刘少奇同志。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

[1] 指刘少奇1959年9月12日晨送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修正稿。该文是刘少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195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十九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二

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1] 刘少奇为送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在这句话旁，毛泽东写了这条批语。

在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 报告上的批语

(1959年9月14日)

彭真^[1]同志：

请用中央名义写一复电给甘肃省委，指出省委这个报告^[2]是正确的。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中共甘肃省委1959年9月11日关于粮食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迅速，争取于9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城乡供应也已本着“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计划用粮”的精神作了安排。在正在举行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我们对粮食的生产、征购、供销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在收、管、用等方面加强工作，防止浪费，真正做到“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这样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就能取得主动。1959年9月17日，中央复电甘肃省委并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出甘肃省委这一报告中的意见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1]

(1959年9月14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上提出的建议。

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为北京火车站题名^[1]

(1959年)

北京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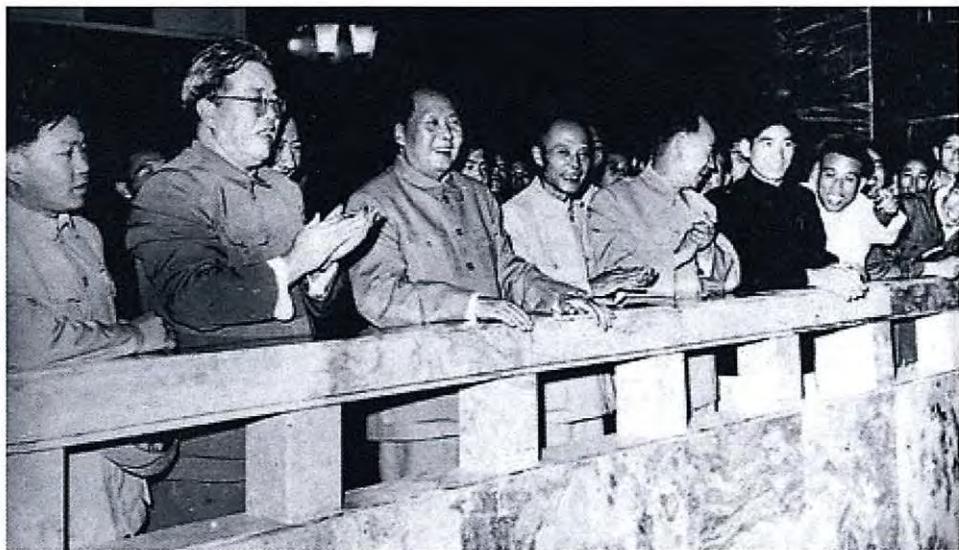
[1] 北京站现址1959年1月20日开工兴建，当年9月10日竣工，9月15日开通运营。北京站新站建成之始，毛泽东视察新建北京站后亲笔题写“北京站”站名。



毛泽东为新北京站题写的站名。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彭真（右二）、吕正操（左）等陪同下，视察新建的北京火车站。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等视察北京火车站。

关于肃反工作的一个批语

(1959年9月18日)

看法妥当，让他们活动，注意观察，大有可为。他们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你们应当当作一件大事去办，积极而又艺术地去做观察和侦察的工作。



1959年9月20日至21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图为毛泽东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



1959年9月20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济南洛口黄河大堤。



1959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济南洛口黄河大堤上留影。



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冒雨在济南东郊看玉米。



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农科所棉花试验田。



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济南看济南城市规划图（右二舒同）。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视察邯郸市国棉二厂时，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视察成安棉花丰产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看望正在摘棉花的女社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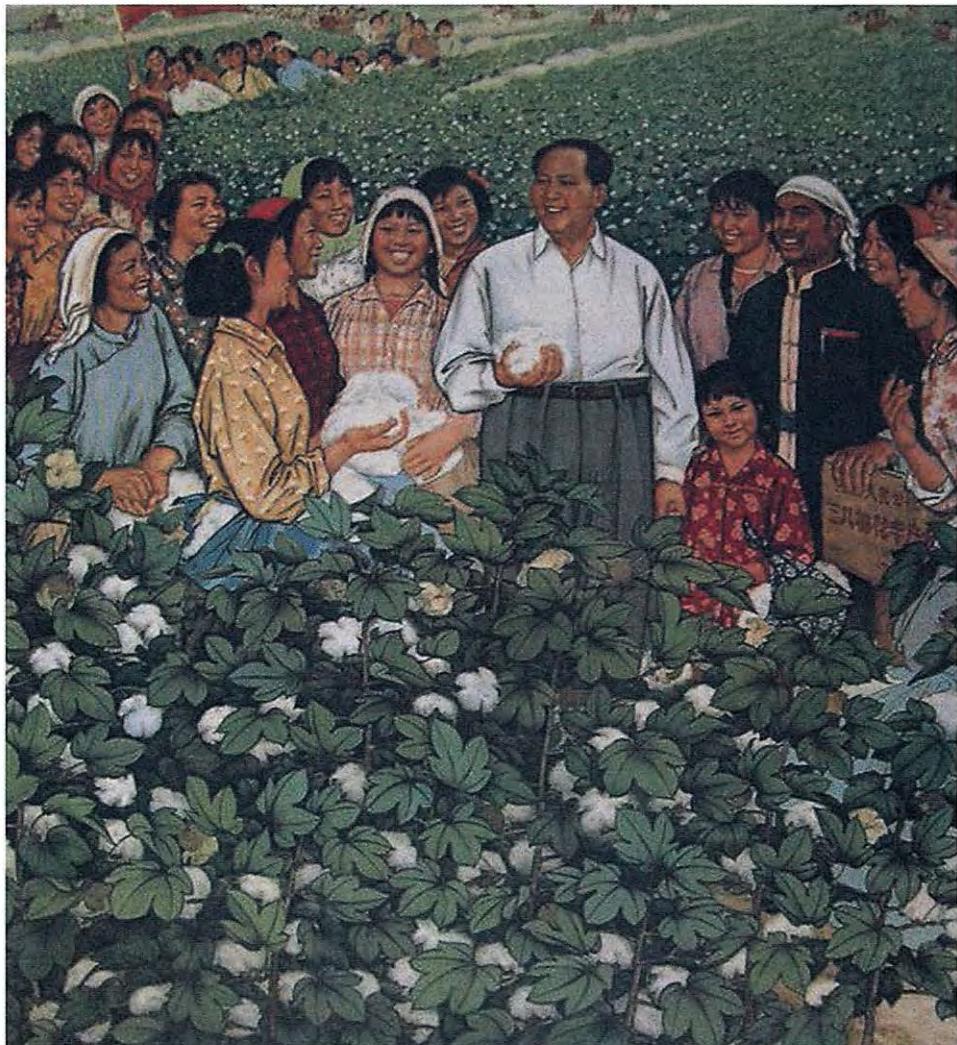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委副书记林铁陪同下视察棉花田。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和棉农亲切交谈。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视察成安棉田时和农民们亲切交谈。



万物生长靠太阳

万物生长靠太阳（宣传画）



《银花朵朵向太阳》(油画)

在驻阿联使馆关于非洲人士对中印 关系问题看法的电报上的批语

(1959年9月30日)

似乎可以把这个情报^[1]，读给高士^[2]同志『们』听。请总理斟酌是否可行。

毛泽东
九月卅日

送总理阅后，退毛。

[1] 指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馆1959年9月22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据非洲某些人士称，他们看到我馆公报刊登的关于中印关系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后，深信我方立场的正确，相信中印之间的一切纠纷都是由印度政府企图执行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侵略政策而引起的。他们完全支持中国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麦克马洪线，指出在非洲大陆，目前就存在着许多“麦克马洪线”，将来非废除不可。

[2] 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

在吴冷西^[1]关于充分报道 国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反应的报告^[2]上的批语

(1959年9月)

刘、周、朱、林、陈毅、彭真^[3]阅，退毛。

大多数兄弟国家是拥护我们的，朝鲜、越南、东德、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情况不清楚，似乎也比较好。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吴冷西1959年9月4日下午4时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下午我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几位同志讨论了主席关于充分报道兄弟国家和西方对我八中全会反应的批示，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以国家为单位，综合报道各兄弟国家报刊对我八中全会的反应。（二）对于亚洲和西方国家报刊对我有利的评论，也应大量收集、报道。（三）对于西方国家的污蔑性评论，将选择恶毒的有代表性的加以报道，并予以评论。毛泽东将吴冷西的报告批转给刘少奇等同志阅看时，拟题为《关于外国消息问题》。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9年9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959年9月，毛泽东等在北京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在肖华关于沈阳军区翻印毛泽东有关 内部讲话的调查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9月)

刘、周、彭真^[2]同志阅，退毛。

出了这样一个乱子。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1959年9月24日给总政并报中央军委的这一报告说，据调查，沈阳军区政治部去年12月22日将高等军事学院编印的《1956年4月以来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示》（其中包括主席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29篇）翻印6100本，这些文件多半是根据参加会议的个人或几个人的记录稿凑起来的，未经中央和其他负责同志看过。其中有些文件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如有失落，将造成严重损失。我已告沈阳军区立即全部收回这一文件，并告他们今后凡未经主席和中央审核的记录稿，只能按上级规定口头传达到一定范围内的干部，不能印成书面文件。建议总政对其他单位亦应进行检查，以引起注意。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乱印乱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讲话记录的指示，并将肖华的报告同时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反对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

(1959年10月1日)

我们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现在就去解放，晚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去解放也不要紧。就是只离我们大陆几公里的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准备马上去解放。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湾和金、马分开，这样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赞成它这个政策，因此我们不忙于去解放金、马，而让蒋介石在那里。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我们当时炮轰金、马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打一下，美国就要更多地欺侮蒋介石，不给钱，不给武器。一打，蒋介石就好说话了，说我们怎能在共产党的炮火下屈服。

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副总统”陈诚和一些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很大的压力下，蒋介石本来打算不做“总统”了，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可以说现在全世界只有我们是唯一支持蒋介石做“总统”的了。这个问题很微妙。如果以后我们又炮轰金、马，这是说蒋介石又需要了。你们不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时谈话的一部分。

要怕，不会出乱子的。

在蒋介石同美国签订的条约中，并没有把金、马包括在内，因此美国对金、马并不承担有义务。美兵舰一直也是严格遵守了它自己的三海里的规定，从未越入三海里之内。我们对它警告六七十次，是警告它破坏了我们的十二海里的规定。美国很害怕蒋介石引起战争，杜勒斯曾要蒋介石一起发表声明，不向大陆进攻，蒋介石也同意了。

去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革命胜利，七月十五日美国出兵黎巴嫩，八月二十一日联合国通过了美国人撤兵的决议，八月二十三日我们炮轰金门。这一下使美国很紧张，转不过脑子来，把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在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的舰只和飞机，都往台湾海峡调遣。当时赫鲁晓夫同志还发了一个照会给美国，谴责美国自由地调动舰队，被美国退回了。现在美国却不得不请赫鲁晓夫同志去访问了。

总之，美国霸的地方太宽，因而总担心，害怕丢掉了一点儿，什么瓶瓶罐罐都怕丢掉了，处于被动地位。东起台湾，西至西德、土耳其都在美国控制下，有美国的基地，所以它到处被动。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首都军民一起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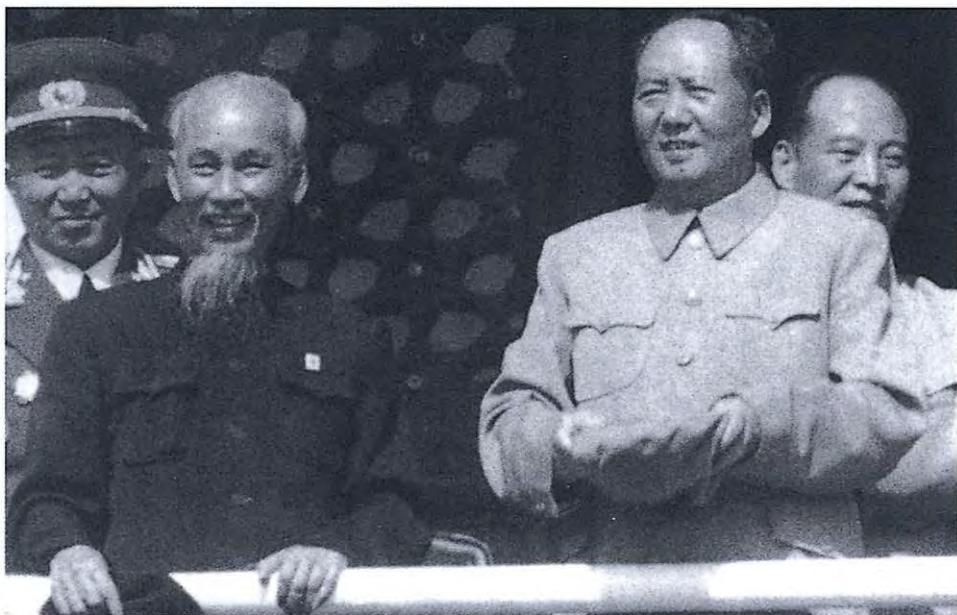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胡志明、赫鲁晓夫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胡志明等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胡志明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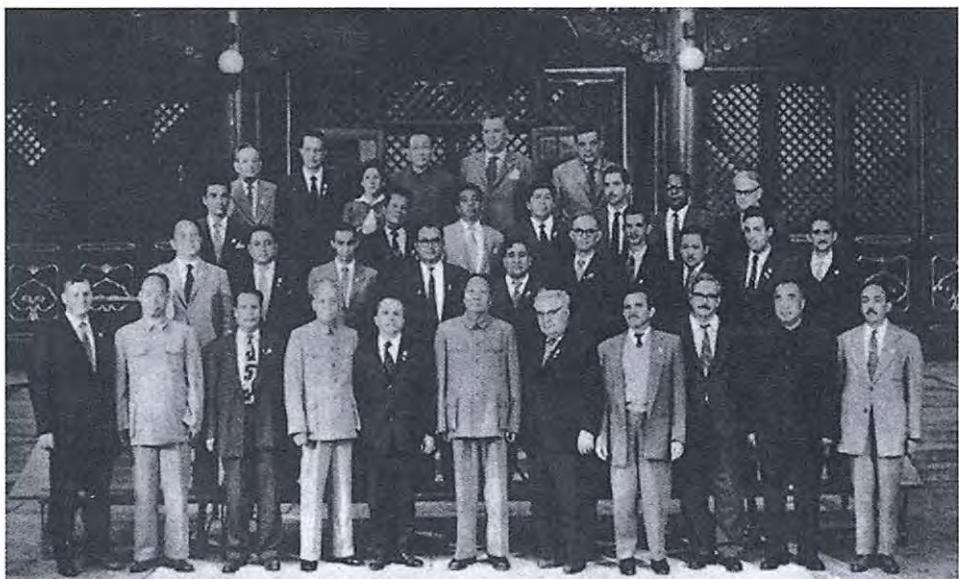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胡志明等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活动的拉美及加勒比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赫鲁晓夫等。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代表团。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合影。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握手。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贺龙接见受阅部队代表。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握手。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观看解放军将军合唱团演出时和女将军李贞亲切握手。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前来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活动的少数民族观礼团的各族代表在一起。



1959年10月，毛泽东亲切会见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活动的胡志明。



1959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胡志明在北京。



1959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赫鲁晓夫。



1959年9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胡志明在欢迎宴会上。



1959年10月，毛泽东、宋庆龄和赫鲁晓夫、胡志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宴会上。



1959年10月，毛泽东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宴会上。

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不同于 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1]

(1959年10月2日)

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先在日内瓦，后到华沙；先是一个星期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一个月一次，现在是两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美国曾经中断过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去了一封信，说不谈不好，并且提出了谈判时间。他们说，限定时间，他们不能遵守，但是谈判可以恢复。我们说谈判可以拖一年，后来金门一打炮，谈判就恢复了。谈判地点，根据美国的意见迁到了华沙。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

[1] 这是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时谈话的一部分。

打仗。

中国问题和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即用波茨坦条约^[1]分开的。朝鲜三八线是在波茨坦会议上划定的，后来经过朝鲜战争，由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志愿军同美国人谈判又重新划定了这条线。南越和北越是由日内瓦会议^[2]决定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

[1] 波茨坦会议是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和外长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也称柏林会议。会议同意设立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会议，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和商讨成员国间的有关其他问题。会议讨论了在苏、美、英、法占领德国期间，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包括解除德国武装，铲除或控制可供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摧毁纳粹党的一切组织和制度，逮捕和审判纳粹战犯以及德国的赔偿，对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政策等问题。8月2日，与会国签订了《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茨坦）会议公报》，通称《波茨坦协定》。

[2]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 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1]

(1959年10月5日)

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以前我们在日内瓦谈，现在在华沙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一千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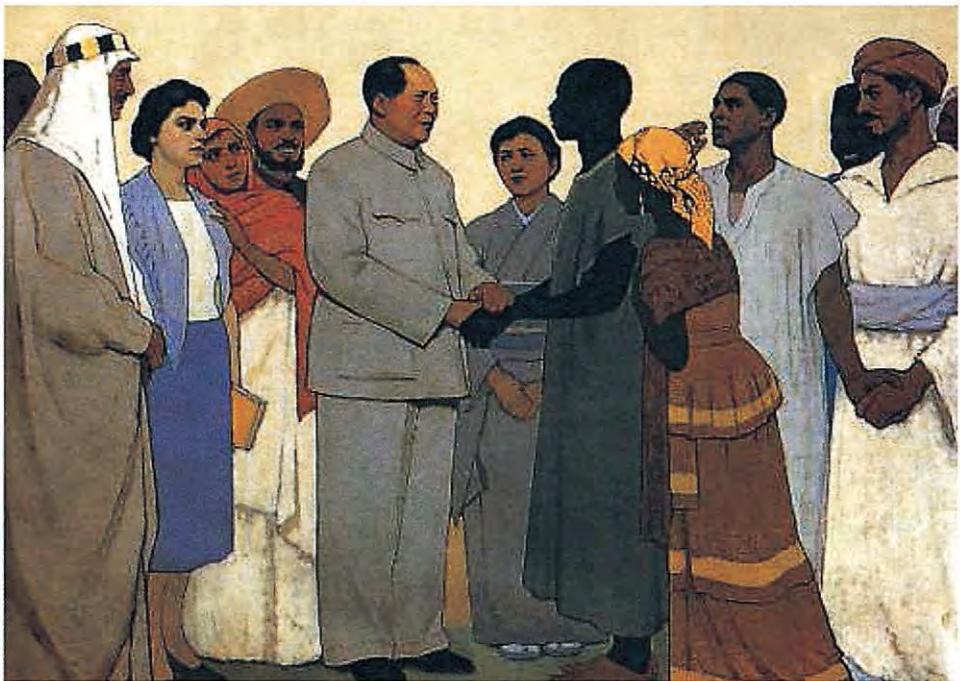
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1]。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2]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于1945年8月2日签订《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茨坦）会议公报》，这两个文件通称为《波茨坦协定》。协定提出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置办法。其中，《克里米亚协定》规定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在德国各自占领区内实行最高权力，并共同处理有关全德事宜。1947年，美、英占领区合并成两国占领区。1948年，两国占领区同法国占领区合并成三国占领区。1949年9月，美、英、法为了分裂德国，在三国占领区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称西德。同年10月，在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称东德。

[2] 开罗会议，指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会议。会议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同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中规定：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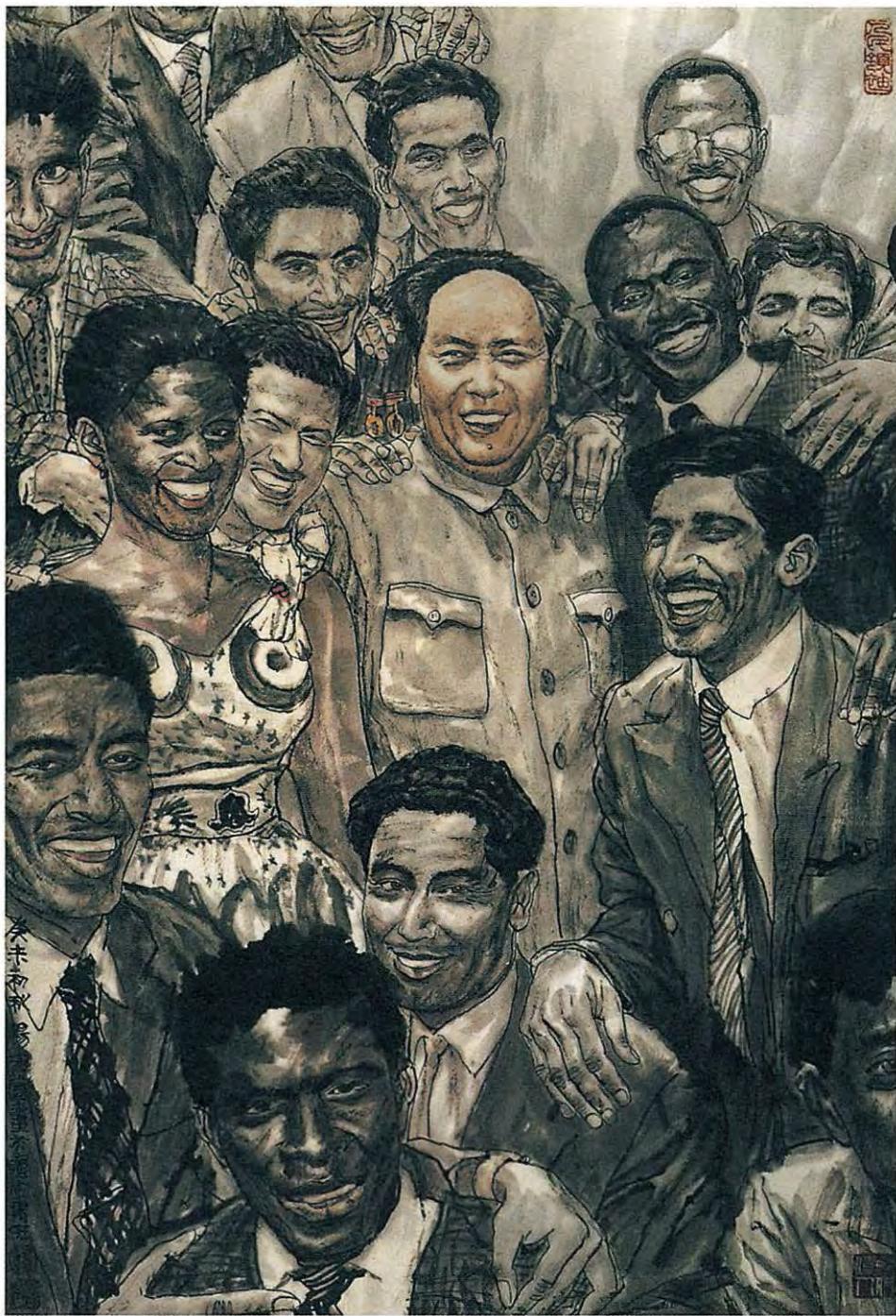
1959年10月8日，毛泽东会见来我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和参观访问的亚、非、拉各国来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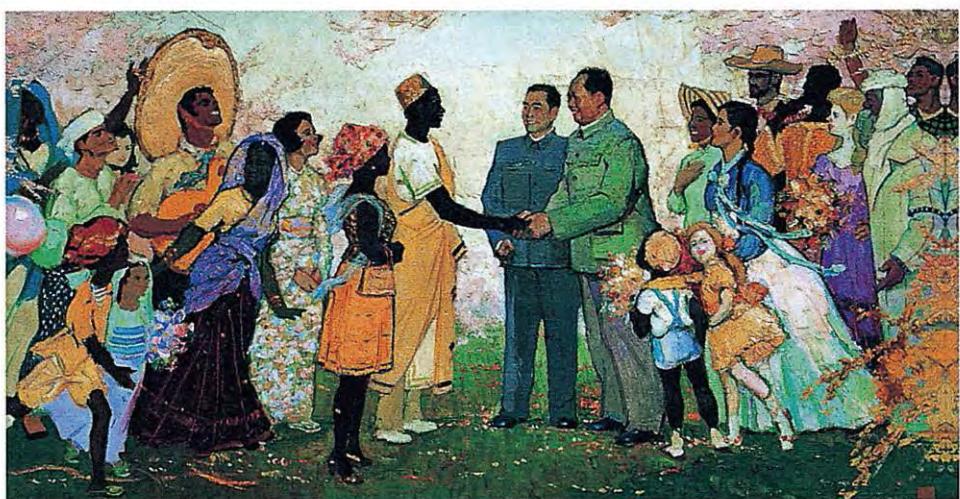
《毛主席和亚非拉人民在一起》(油画)



1959年，毛泽东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朋友在一起。



《有朋自远方来》(中国画)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油画)



《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油画)



《毛主席和外国朋友》(油画)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9年10月5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時候，我們代表中國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是德国和平民主力量的伟大胜利，是当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十年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的十年。十年来，勤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久以前提出的1959年至196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集体智慧的表现，它代表着全体德意志人民的崇高希望和美好的未来。毫无疑问，七年计划的实现必将进一步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定地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且为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通过建立邦联达到重新统一德国进行了巨大的努力。这一切赢得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赞扬和普遍欢迎。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德国人民统一自己祖国的神圣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同年同月诞生的兄弟国家。十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了全面发展和巩固。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起着巨大的作用。

祝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争取德国的和平统一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10月5日

关于中印关系和达赖喇嘛回国问题^[1]

(1959年10月6日)

—

从上次同你^[2]谈话到现在，隔了九个月。在这个时期，西藏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浪。据我看，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两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友谊是主要的。最近这个时期的一点波浪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应当这样看。它不会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也不应当使它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我们两国都是亚洲国家，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无论如何，印度同西方国家是有区别的。现在，双方都同意对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很好。争论总是要用谈判来解决。你对谈判的看法怎么样？有希望吗？

[1] 这是毛泽东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这时还给他保留了此前他所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职位。

[2] 指高士（1909—1962），当时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二

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1]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唯一的女活佛^[2]已经从印度回来。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你^[3]说，尼赫鲁听了你的话笑了，他认为我们不欢迎达赖。如果达赖对以上两条不改变他现在的态度，我们就不欢迎他；如果他改变态度，我们就真正欢迎他。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2] 指桑顶·多吉帕姆，1942年生，西藏孟嘎（今尼木的一部分）人，桑顶寺活佛。

[3] 指古普塔（1914—1982），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会见中说：“我曾经在国会里这样说过，对于达赖，不发生政治避难的问题，因为他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尼赫鲁听了我的话，笑了一笑，因为他认为中国选达赖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不是真要他，而是一个策略。”

在四川省委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 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9年10月6日)

少奇、彭真^[1]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各地。另，黑龙江一件^[3]，河南一件^[4]，都有批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四川省委1959年10月3日关于省委第一届第十一次会议（扩大）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这次省委扩大会议第二阶段除了阅读文件、听报告、进行小组或联组讨论，并揭发批判右倾思想活动外，还进行了大会重点批判，揭发出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具体讨论安排了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三）为了防止松劲情绪，省委于国庆节前发出指示，要求在第四季度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我省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3]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1959年9月21日关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4] 指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9月29日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右倾分子，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关于审阅李六如^[1]《六十年的变迁》 第二卷草稿问题的批语^[2]

(1959年10月6日)

定一^[3]同志：

请你指定一位水平较高同志看一看这部书，如何？

毛泽东

十月六日

[1] 李六如，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李六如1959年10月4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兹将我所写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送请审阅，如若无暇，拟请指定一位秘书同志看看后半部和140~147、273~278这十来页。并恩指示。”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写到大革命失败，信中请求审阅的，主要是该卷中有关毛泽东的部分内容。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薄一波反映家乡人民公社情况的 来信^[1]上的批语

(1959年10月8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毛泽东
十月八日

尚昆^[2]办。

[1] 薄一波，山西省定襄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9年10月7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河北省委关于解决 水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10日)

震林^[1]同志：

此件^[2]看了，请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谈一下，予以批准。投资问题，请与有关部门及总理研究一下，然后确定。

毛泽东

十月十日

[1]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10月6日关于解决河北省水利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具体贯彻执行我们今后3年的经济建设方针，从1960年至1962年，在水利上我们需要做好3件事：首先解决洪水灾害问题；其次解决沥水灾害问题；与此同时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为此共需国家投资12.7亿元，每年平均4亿元左右。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11日)

—

这是一个好文件^[1]，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以为参考。

中央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1] 中共浙江省委1959年9月30日给中央并上海局的这一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9月16日结束，解决了以下问题：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今年上半年的形势，批判了右倾动摇情绪，提高了保卫党的总路线的自觉性。二、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检查和批判了在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态度，提高了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和组织纪律的自觉性。三、根据总路线精神，检查和批判了安于中游的思想和对待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会议认为，贯彻八中全会决议主要应抓住以下三个环节：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落脚生根；今冬明春，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持久、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9年10月11日，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

二

刘、彭真^[1]同志阅，尚昆^[2]办。

毛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陈伯达^[1]《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的批语^[2]

(1959年10月11日、16日)

—

伯达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3]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2] 本篇一、二是对陈伯达1959年10月9日送审的这篇文章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10月13日送审的这篇文章修改稿的批语。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二

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1]

三

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2]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3]同志办理。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1] 陈伯达这篇文章的原题为《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毛泽东在陈伯达10月9日的送审稿上将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篇文章后来又改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发表在《红旗》1959年第二十二期上。中共中央1959年12月13日还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石油部党组关于石油工业 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13日)

送陈伯达^[1]同志：

此件^[2]值得一看。文中大部分，略加改造，似可在红旗上公开发表^[3]。但余秋里同志已写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未看，不知其内容是否就是这个报告里所说的这些，如果是，则不宜再在红旗上发表。请找该文看一下，并与余秋里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1] 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2] 石油工业部1959年9月24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石油工业在1959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二）对保持石油工业继续大跃进，我们有两点经验；1. 对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集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2.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更深刻地认识到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三）为保证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做好油井的管理、勘探、设备检修和运输等方面的工作。

[3] 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后来将这篇报告略加改造，以《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从一个环节看党的总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二十一期上。

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问题的批语

(1959年10月13日、15日)

—

此件^[1]及附件^[2]，请陈伯达^[3]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59年10月12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任务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前已报送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曾提出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总的说来，应当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同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逐步消除重工业内部的薄弱环节，为今后年份更好更大地跃进创造条件。其中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提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

[2] 指国家计委党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二

此信^[1]及附件^[2]即送李富春、彭真、刘、周、朱、林、王稼祥、胡乔木^[3]同志阅，阅后退毛。

在十月十六、十七两天看完，以十七或十八日在我处会谈一次。

[1] 指陈伯达1959年10月15日下午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在信上加了一个题目：《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陈伯达在信中说，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而在实际措施、计划部署、问题解释时，将您最近所说的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意见，加以具体化，使同志们明确地认识这一问题。计委报告中关于“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乎可以改为：“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1959年12月3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这句话改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1960年1月30日，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党组。

[2] 指陈伯达1959年10月15日下午来信中附送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摘编的《列宁论发展农业》《斯大林一九二六年论工业农业的关系》《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3份材料。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推迟召开 全国计划会议问题的批语^[1]

(1959年10月15日)

即退李富春同志：

此件今天才收到，故计划会议时间宜改十月廿四日，以便计划大纲草案有时间送达地方并加以研究，再来开会。如同意，请即交尚昆^[2]办理。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下午二时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59年10月9日晚给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一）国家计委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的报告，已根据政治局初步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如中央觉得原则上还可以，建议批转下去，作为编制明年计划草案的依据之一。（二）建议在本月18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今年的经济形势和明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拟出明年计划的草案。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央转发湖南整社试点经验报告^[1]的指示稿^[2]的批语和修改

(1959年10月15日)

—

即送彭真^[3]同志办。

毛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10月4日批转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整社试点座谈会的报告和湘潭地委关于韶山公社整社试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

[2] 中共中央1959年10月15日的这一指示稿说，湖南试点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从这个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并且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只会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人数不多，不足为患。他们虽只占富裕中农的一个部分，但危害却是很大的，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进行整党、整团工作。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二

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在十个公社中选择十个大队结合生产进行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经验^[1]

[1] 这是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指示稿的题目，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处，毛泽东对指示稿还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1959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福建省委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 决议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9年10月16日)

这个文件^[1]好。采取这种态度说话，甚为适宜。各地可以参照办理。讲过了一个〈次〉，可以再讲一次，如福建那样的办法。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想一想，酌量办理。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1] 指中共福建省委1959年10月9日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给中央的第四次简报。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于9月25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向他们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上午，宣读全会的两个决议及有关文件，并且听了毛主席9月15日在北京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下午，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向他们作了讲话。到会人士听了传达后，大多数人表示拥护我党中央的决议，认为对自己教育很大，普遍反映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但有一部分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惊奇、猜测、疑惧和糊涂的认识。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1]

(1959年10月18日)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比如美国垄断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人民，都是有区别的。垄断资本本身也有区别，有卖国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区别。即便一个集团内部，例如艾森豪威尔^[2]集团内部，也不那么简单，也有两面性。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他们是一定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要缓和，否则何必缓和呢？西方国家之间也不一致。西方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国家内爱好和平的人同他们的政府之间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区别。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当然，也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广大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苏联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都靠在一块儿，而且巩固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

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

如果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1]未能取得成功，条约修改了，那末，十年后这个条约还将提到日本人民的面前，那将会教育日本人民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1]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1960年1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

一般讲，美、英、法同德、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美、英、法有不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要守卫的地方很多，从台湾和南朝鲜到土耳其，都要守。从这一点上说，它们很富。美国没有殖民地，但有很多半殖民地，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朝鲜和台湾，要保守，要维持现状，以便继续控制下去。西德和日本就不同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殖民地被搞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未搞到殖民地。日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全被剥夺了。它们很不甘心，想继续侵占殖民地，但现在受美国的控制，还未准备好。它们想摆脱美国，再搞扩张。这些看法是否对，愿同你们交换意见。

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未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容易。岸信介^[1]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和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

[1] 岸信介（1896—1987），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和班禅额尔德尼^[1]等的谈话

(1959年10月22日)

现在你们的事情比过去好办了。过去有障碍，事情不好办，现在障碍没有了。

达赖^[2]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

我们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3]，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比如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各省各地的工业也都搞起来了，只有西藏还没有搞，因为西藏那时没有搞改革。铁的产量，除西藏外，各省都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增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只有四万吨铁，像山东这样大的省没有一吨铁。西藏改革后也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2]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3] 后来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

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现在，是否已经开始培养这方面的干部？

改革的方针、办法你们都商量好了，是不是有些人觉得将来政策要变化？可能有些人有这个想法，这要请你们作些解释。

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合作，不会随便丢掉原来和我们合作过的人。即使对达赖，我们现在还留有余地。他^[1]是国民党，他^[2]是“资产党”，我们合作十多年了，要继续合作下去，合作一辈子。有些右派，我们也还和他们合作。所以你们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要作解释。到底我们团结起来有利，还是不利？我看，团结起来有利，对你们有利，对我们有利，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利。

跑到印度的人大部分在修公路，他们也许要在印度呆一辈子，也许有些人要回来。

从前释迦牟尼^[3]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你们晓不晓得鸠摩罗什？他在后秦时出生在西域龟兹国，后来到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长安。中国大乘佛教^[4]的传播，他有功劳。西藏过去有无《金刚经》？这个经的汉译本就是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翻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代六祖

[1] 指程潜（1882—1986），湖南醴陵人。原国民党元老和高级将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

[2] 指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

[3] 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

[4] 大乘佛教，佛教派别之一。

(慧能^[1]) 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西藏保存了一些寺庙吧?

群众起来，你们是否有些怕？你们不怕很好，因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群众就拥护你们。你们第一爱国，第二赞成改革，所以群众拥护你们，不斗争你们。你们的有些朋友怕，那也难怪，希望你们作些解释。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不会很长，再有几个月就会完成吧？以后是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总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会有些变动。改革中不要打人，要说理。平叛以前，实际上是很乱，那么多叛匪，现在都肃清了，只昌都方面还有那么一部分，这部分恐怕不久也可以肃清。

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

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同志们慢慢地熟了，那就好了。比如有些人开始到北京来，不知道北京究竟对你们怎样？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们究竟是害你们的，还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个民族饭店，还有个民族文化宫，我们的首都是各民族的首都。

一个叛乱，一个平叛，问题解决了。靠你们办事，我们信任你们。听说你们有些要到地方上去参观？你们已经有四年没去过各地方了，去看看好。中国地方大，情况不是全一样，可以参考各地方的经验。

[1] 慧能（683—713），唐代高僧，佛教禅宗的南宗开创者，被推为禅宗的第六祖。传说他原是一个不识字的樵夫。



1959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



1959年，毛泽东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帕巴拉·卓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谈话。

关于中直机关开展 反右倾斗争问题的批语

(1959年10月22日、23日)

—

彭真、尚昆^[1]同志：

这里^[2]没有谈到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情况，不知也有这三种情况没有？请你们抓紧办一下，使这个斗争深入下去。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二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0月1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〇二号转载的《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存在三种情况》一文。文章指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可分为三种情况：一、领导上既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也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办法，对运动形成了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有80%。二、群众已经普遍发动，但领导缺乏决心和办法，不能形成强有力党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占10%。三、群众既未发动起来，领导本身也存在着问题，怯于开展斗争，致使运动进展很迟缓。这样的单位大约也占10%。本篇一就写在这份简报上。

二

已阅。送少奇、彭真同志阅后，退尚昆存。^⑩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上午

三

尚昆同志：

中直要与国家机关密切联系，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劲头很大。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1959年10月23日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中直机关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整风学习运动总的情况还是好的，但在一部分机关中，开展得还比较缓慢，也不够有力。为此，我们对中直各机关提出了以下要求：一、必须认识这次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场极其深刻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机关领导同志必须下定决心，挂帅出马，抓紧进行。二、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发动群众的关键是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检查。三、必须反对不联系思想实际，泛泛学习文件的教条主义方法。四、必须不断地反对各种阻碍运动开展的右倾思想，把斗争搞深搞透。本篇三也写在这个报告上。

关于研究广东对部分副食品实行派购办法的批语^[1]

(1959年10月23日)

李先念^[2]同志：

广东派购办法，请你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推广。你那里开什么会议没有？如有会议，可和较多的同志一道研究一下。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9年10月17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八九期上。该期登载的《广东实行派购办法，猪和家禽的收购量大增》一文说，广东商业部门在八、九月内贯彻执行中共广东省委和省人委关于实行猪、鸡、鸭、鹅和蛋品的派购办法的指示后，这些副食品的收购量大增。实行派购办法是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需要，对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员派购一定数量的猪、鸡、鸭、鹅和蛋品，要求人民公社和社员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交售任务。派购一般只占产量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产品仍归饲养集体和社员个人支配。由于这种办法兼顾了国家、公社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社员的普遍拥护。

[2]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1959年10月26日)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

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1]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2]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和英共波立特^[3]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4]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

[1]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2] 孟什维克，是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的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别。

[3] 波立特（1890—1960），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 1954年3月29日，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宣言^[1]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一九四六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

[1]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平。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

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一百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九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

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1]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它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感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2]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1] 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1956年1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2]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核试验、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中央印发浙江省委关于各县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27日)

—

此件^[1]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可登党刊。

中央

1959年10月27日

[1] 中共浙江省委1959年10月18日给中央、上海局的这一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结束以后，各县、市都召开了县、公社、生产大队和工矿企业支部的三级干部会，具体情况如下：（一）各县三级干部会，都以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联系实际，检查当地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抓住代表人物，开展了严肃的批判。（二）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的主要经验是：1.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尖锐斗争。2. 要抓住重点问题，选择典型人物，展开思想交锋，力求把主要思想问题辩深辩透。3. 在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以后，多数县还用一段时间大立标兵，大鼓干劲。4. 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5. 各级党委都实行两套班子、分线作战的办法，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三）下一步的工作是把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贯彻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中去，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二

刘、彭真^[1]同志阅，尚昆^[2]办。办后退毛。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59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合肥市蜀山人民公社参观农民使用的沼气灶。



1959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合肥市蜀山化肥厂视察。



1959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合肥市蜀山人民公社时，向公社干部询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看马鞍山钢铁公司炼出的生铁。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和工人在一起。

在驻苏使馆关于赫鲁晓夫^[1]海参崴讲话 情况报告上的批语^[2]

(1959年10月)

—

此三件请刘、周、朱、林、陈毅、彭真、稼祥、康生、定一、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本篇一、二均写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10月8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上。报告说，赫鲁晓夫本月6日在海参崴作了访华回去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他强调今年9月的访美之行并没有改变他对美国的看法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其次，在谈到对战争的态度时他引证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然后又说：“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再次，关于中国之行，他说中国的情况很好，中苏友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正日益发展和巩固。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再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

陈伯达、胡乔木^[1]同志一阅，阅后退毛。

二

值得一看，想一想。两天内看完，以便在我处会谈一次。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对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 《伟大的十年》一文^[1]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

此件^[2]值得一阅。

刘、周、朱、林、彭真、陈毅、伯达、稼祥、乔木、康生、定一阅，阅后退毛。

[1] 周恩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5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二十期上。

[2]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10月9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10月9日，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摘要刊登了周总理《伟大的十年》一文，摘登情况如下：（一）关于我国十年来变化部分摘登较详尽。（二）对谈及我国十年来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党正确贯彻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阐述我党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人民公社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等内容，摘登非常简单。（三）对文章最后谈到我国的有利国际条件、支持赫鲁晓夫访美之行以及感谢苏联帮助等部分，摘登很详尽。（四）摘登中还有一些数字和文字翻译方面的错讹。

在驻罗马尼亚使馆关于与西方国家使节来往问题的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10月)

值得一看，看后想一想。

刘、周、朱、林、彭真、陈毅、稼祥、乔木、定一、康生、伯达^[2]同志阅，阅后退毛。

[1] 指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1959年10月9日关于兄弟国家使节与西方国家使节来往问题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近来某些兄弟国家驻罗使节对与西方国家使节来往兴趣很大，强调要扩大同西方国家的接触。他们认为加强同西方国家使节的联系，有助于和平共处和改善东西方的关系。为此，他们分工合作，一方面对我们及其他兄弟国家使节进行工作，另一方面计划通过一定的形式，扩大同西方国家驻罗使节的接触。对此，我们已表明，和平共处不能完全抛开斗争，适当的接触是可以的，但不能抱过大的希望。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对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 祝贺生日的消息的批语

(1959年10月)

各同志阅。

此件^[1]刚到。请各同志即看一下。此外九月廿八日美国总统对记者会议的谈话^[2]，赫鲁晓夫在十〈九〉月廿九日在莫斯科欢迎会上的演说^[3]，是两个极重大的文件，值得一看。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59年10月15日送阅的一则新华社消息。消息说，根据塔斯社莫斯科14日讯，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并指出他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开诚布公地进行的交谈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这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有诚意而且作了必要的努力，来使苏美两国取得完全的互相谅解，建立永恒的友好关系，使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利加强普遍和平。艾森豪威尔在复信中对赫鲁晓夫的祝贺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和赫鲁晓夫一样，希望在美苏两国的关系中，他们两个人能使冷战的紧张局面得到某些缓和，并找到通向公正的和平的光明大道。

[2] 指艾森豪威尔1959年9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59年9月30日以《艾森豪威尔谈赫鲁晓夫访美》为题，报道了这一谈话的主要内容。

[3] 指赫鲁晓夫1959年9月28日在莫斯科欢迎他访美归来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9年9月30日以《赫鲁晓夫报告访美观感和结果》为题，报道了这一讲话内容。

七言诗·赫鲁晓夫访美

(1959年10月)

西海如今出圣人，^[1]
涂脂抹粉上豪门。^[2]
一辆汽车几间屋，
三头黄犊半盘银。^[3]
举世劳民同主子，

[1] 西海，泛指西方。《礼记·祭义》：“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圣人，这里是褒义反说，讽刺赫鲁晓夫。

[2] 豪门，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

[3]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直接引用和浓缩赫鲁晓夫的话。1959年国庆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0月2日，毛泽东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举行正式会谈。赫鲁晓夫通报了他的美国之行，大肆宣讲他在美国受到欢迎的盛况，说这位农场主送他三头良种牛，那位资本家送他一盘古银币。还说，现在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都有好几间房子，住别墅，吃美馐。他认为，我们只能同美国在经济上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试它的稳定性”。当时，毛泽东等在如何看待国际问题和美国问题上，与赫鲁晓夫分歧很大。

万年宇宙绝纷争。^[1]
列宁火焰成灰烬，
人类从此入大同。^[2]

[1] 宇宙绝纷争，赫鲁晓夫认为，实现“三和政策”和“三无世界”后，世界上便再无纷争了。

[2] 大同，一种理想社会。这里是正话反说。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1]

(1959年10月、12月)

—

吴冷西同志：

此件^[2]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

[1] 本篇一是为发表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一文给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的一封信。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写这封信时拟的。本篇二至五是为讨论、修改、发表这封信写的四个批语。

[2] 天津市畜牧局1959年9月5日整理的这篇文章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年以来，他们不甘贫困，分析了粪少、地坏，打不出粮食的原因，下定决心多养猪。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采取“男女老少，人人动手，谁打归谁，多余出售，队里不足，现款收购”等办法解决饲料问题，大干一年翻了身。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这篇文章和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后来载于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8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上。

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

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二

庆施^[1]同志：

附件^[2]请印 20 份，上午印出，发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六同志各一份，请他们收到即看一下，想一想，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下午或晚上到我处座谈一下。另 14 份交我处理。

毛泽东

卅日上午九时

[1] 庆施，即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2] 指毛泽东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给吴冷西的信稿。

三

请彭真^[1]同志送交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四

送陈伯达^[2]同志阅。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五

林彪^[3]同志：

有暇时，请看一下这个文件。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群英大会上亲切接见马恒昌等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10月，毛泽东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参观团团长阿生富。



1959年，毛泽东接见阿沛·阿旺晋美。



1959年，毛泽东接见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代表李明淑。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四十二周年的电报^[1]

(1959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和全体苏联人民——进步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们，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转折点，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从资本主义枷锁下最终解放的指路明灯。四十二年来，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使人类更明显地看出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无不胜的生命力。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的电报。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正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劳动，胜利地实现着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纲领——七年计划。1959年前三季度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完成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必将大大缩短。苏联成功地发射宇宙火箭和建立自动行星际站，为人类征服宇宙开辟了新的纪元。中国人民由衷地祝贺苏联人民所取得的这些辉煌成就。

一年来，和平力量空前壮大，战争势力日益孤立。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的访问和苏联提出的关于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建议，最近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裁军问题所通过的告世界各国议会书，都充分地表达了人类要求和平的愿望，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再一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苏联的这些和平倡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并且愿意同苏联人民以及各国人民一道，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

在不朽的马克思、列宁的旗帜下，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苏团结和友谊，有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不久前，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是对我国人民的莫大鼓舞。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苏联人民一贯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巨大的援助，对此，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人民将继续为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友谊而努力。

我们预祝你们和全体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复尼赫鲁的信稿的修改^[1]

(1959年11月7日)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1959年11月7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此外，毛泽东对这封信还有一些个别文字的修改。1959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这封信。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关于 财贸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1月10日)

—

各省、市、区党委，并发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

我们认为此件^[1]很好，请你们考虑仿照黑龙江的办法召开一次财贸六级干部会议，由省、市、区党委切实抓紧会议的领导。首先由你们详细研究一下黑龙江省委的报告。

中央

1959年11月10日

[1] 中共黑龙江省委1959年11月5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我们于10月12日至28日召开了全省财贸系统的六级干部会议，情况如下：（一）会议是采取以虚带实，就实论虚，虚实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三）在批判右倾思想、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错误的同时，会议还检查了在财贸工作中贯彻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的工作。（四）这次会议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其根本的原因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实行政治挂帅的结果。

二

彭真^[1]同志：

此件请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另印发中央各处。

毛泽东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给柯庆施的信

(1959年11月15日)

庆施同志：

此件^[1]极好，请看一下。如有省书同志未走的，请你递给他们看一下。然后，交王稼祥^[2]同志看一下。然后，交江华^[3]同志看一下。在两天内看完，由江华退我。我准备请中央转发全国。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上午一时半

[1] 可能指安徽省国营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的材料。材料说，方丘湖农场去年小麦丰收后，即播种了1001亩绿豆，由于天旱，出苗不齐，估计要歉收，农场党组织根据当时养猪较多、饲料来源困难的情况，决定采取在绿豆青苗地放牧的办法养猪。放牧50天后，效果良好，具体表现在：一、田增产，猪增重。经过放牧后的田地再种小麦，由于猪粪多，比同等耕作水平但未经放牧的亩产提高了75%；同时在青苗地放牧的生猪，体重增长快，比圈猪提高了1.2倍。二、猪省料，田省工。放牧的猪不再喂其他饲料，而实行放牧，也节省了运肥工。三、节省了饲料加工和管理费用。材料最后指出，种饲料直接放牧养猪、肥田的办法，适合地多人少、土地瘠薄的地区。安徽省目前正在积极选择适当地方，作进一步的试验。1959年12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四四期登载了题为《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效果良好》的报道。

[2]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1] 给周恩来、彭真的信

(1959年11月16日)

[1] 指华东协作区委员会1959年11月1日至10日举行的有全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1. 1959年全区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人民公社经过一系列整顿，已经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2. 1960年农业生产力争更大的跃进。3. 在五至十年时间内由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基本上是公社所有制。二、关于工业生产问题：1. 1959年，华东协作区的工业生产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2. 1960年的有利条件更多，一定能够获得继续大跃进。3. 为了克服缺少原材料的困难，最重要的一条办法是大搞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三、关于财贸工作：1. 进一步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2. 财贸部门首先必须支援生产，发掘潜力，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3. 进一步做好收购工作。4. 进一步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四、关于教育和科学工作问题：1. 根本的问题是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和科学工作的领导。2. 继续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3. 必须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4. 积极筹办新的高级中学，办好初级和中级技术学校、初级和中级职业学校、中级业余学校。5. 继续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五、关于反右倾斗争问题：1. 各省、市的反右倾斗争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2. 必须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3. 目前应该注意掌握的是，领导上决心要大，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抓住重点，有破有立。4. 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 在今年冬季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这个会议纪要转发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恩来、彭真^[1]同志：

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文件和柯庆施同志给中央的报告^[2]，现寄上，请予审阅。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予批复。同时可以转发各协作区及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至于各协作区是否仿照华东办法在十一月内开一次会，由各协作区自己酌定。如果他们觉得十一月时间仓促，准备在十二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再开协作区会议，较为方便，我想也是可以的。

华东此次会议的纪要，共五件，我已看过，觉得可行，建议中央予以批准。

毛泽东

1959年11月16日

华东会议纪要寄上30本。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9年11月16日为送审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会议纪要给中央并毛泽东的信。

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 一文的批语

(1959年11月19日)

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关于随时选送 有重要材料性文件的批语^[1]

(1959年11月23日)

彭真^[2]同志：

此四件已阅。有重要材料性文件，请随时选一些给我看看。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二时半

共四件，退彭真同志。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办公室1959年11月18日印发的《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情况简报》第一期上。该期登载了《中直机关反右倾斗争中重点对象的统计》材料。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 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1959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同志：

欣逢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最衷心和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无限愉快的心情看到：十五年来，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解放前，阿尔巴尼亚曾经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她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斗志昂扬地为实现修订扩大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着忘我的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飞跃前进。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人民一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就一定能

够做出翻天覆地的事业。

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不渝地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并且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阿尔巴尼亚政府始终一贯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巴尔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加强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进行了巨大的努力，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随着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中阿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一定会继续加强，中阿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一定会日益紧密。

祝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请彭德怀阅读有关文章的批语

(1959年11月28日)

—

送彭德怀同志阅。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

—

此三件^[1]可阅。

[1] 指新华社1959年11月24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一七期登载的《青年科学家杨明汉培育水稻“千粒穗”成功》《一青年讲师培育成功一种普通分枝小麦良种》《金龙公社试验培育“牛精猪”成功》三篇文章。

对李先念^[1]在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和给中央报告^[2]的批语

(1959年11月30日)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

[2] 指李先念1959年11月21日在第二次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和11月25日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其中总结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一）一年来，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副食品生产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蔬菜生产已经基本自给。（二）今后的副食品生产，仍然应当“城乡并举”。大中城市应当继续贯彻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三）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四）不可丝毫忽视蔬菜生产。（五）各地要大力开展油料生产，广泛开展多种经营。（六）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七）广大农村也要大搞副食品生产，发展畜牧业，积极支援城市。李先念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次会议检查了各地执行中央提出的大中城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副食品生产方针的情况，提出今后副食品生产的任务是：“在蔬菜已经基本自给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提高和适当发展蔬菜生产；大力开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在一两年内做到肉食蛋品的基本自给；同时，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油料、水产、果品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会议认为，发展畜牧业要在公私并举的原则下，强调以公养为主。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阅。建议转发各级党组织，研究实行。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对一九六〇年钢的增产量的估计^[1]

(1959年11月30日)

实际可达到600万吨以上。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1960年计划问题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讲到，1960年几种主要产品较1959年增加的绝对数都是很大的，其中“钢四百八十万吨左右”。在这一数字旁边，毛泽东写了这条批注。

对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斗争情况 等三个材料的批语

(1959年11月)

江青阅后，交林克^[1]阅。

三件^[2]都可看。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1月1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七四期上摘登的3份材料。其中《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一文说，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运动正往深入阶段发展，具体表现在：1. 群众发动得愈加广泛、深入。2. 重点批判对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细致。3. 领导核心健全有力或已经得到改进的单位占80%至90%。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中，仍有落后单位和落后面，主要是领导上存在右倾，不敢或不愿放手发动群众，以简单粗糙的方法来代替深入艰苦的思想工作。为此，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1. 必须继续大胆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开展斗争。2. 对重点对象要有计划、有步骤、深入细致地进行批判。3. 要加强领导。4. 运动必须有始有终，不能煮“夹生饭”。《十三个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一文介绍了河北等13个省份进行整社试点工作的情况，指出在整社开始的地方，都普遍获得贫农和下中农的拥护。《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很快》一文指出，据12个省、区的材料看来，最近两三个月，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都很快，常年食堂也有很大的增长。目前各地在积极恢复和发展食堂的同时，开始大力抓食堂的巩固工作。

介绍王国藩人民公社^[1]

(1959年12月2日)

此件^[2]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

[1] 这是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关于王国藩人民公社的情况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王国藩，当时任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主任。

[2] 林铁1959年11月26日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前几天我到王国藩人民公社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社今年生产的结果是五业齐跃进，全面大丰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依靠人民公社这个大集体的力量，鼓足了干劲，继承和发扬了勤俭办社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改善了生产条件。从去年以来，这个社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积极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设。现在正在着手大搞社营经济，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关于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 及对策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9年12月3日)

刘、周、彭^[1]:

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2]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上午三时

今日派机去广州，明日林彪可到。
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三天就够了。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1959年12月)

讨论的范围，以本人口气出之。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 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 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1945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1949—1951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

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

1953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

1954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

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2]。

1957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1958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同年，1959，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1]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加到彭德怀同志头上的“里通外国”等罪名。198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指出：“根本不存在黄克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同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编辑部文章。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消息，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

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¹¹¹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1]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

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

(1959年12月)

中央、省委要团结一致
彻底裁军与禁止原子武器
外交方面要注意谨慎
碰钉子
理论方面
与对付考茨基比较
由外国纠正，不宜，也危险
(一) 父子关系；(二) 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 留一手；
(四) 搞颠覆活动。
(1) 骄傲自大；(2) 领导犯错误；(3) 歪曲马列；(4) 动摇国际主义原则；(5) 对和平悲观。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三台山和工作人员合影。



毛泽东在杭州学习英语的地方。

对《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一文的批语

(1959年12月)

此文^[1]请阅，送各同志。退毛。

[1] 指新华社1959年12月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三期上登载的《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一文。文章介绍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一、会议认为公社工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1. 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2. 支援了国家建设，增加了公社收入。3. 增加了公社资金的积累。二、确定1960年公社工业的发展方针是：集中力量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以农具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为重点，全面提高和发展。三、必须从上而下地加强对公社工业的领导，完善公社管理体制。

对广东农村开展粮食分配问题的大辩论等三个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

此件^[1]值得一阅。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一四号。这期简报共登载了3篇材料，其中《广东农村开展粮食分配问题的大辩论》一文指出，广东省委今年确定粮食分配的方针是：计划用粮，月月节约用粮，合理用粮，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尽量多留饲料，多留储备，以丰补歉。各地用算账对比的方法，总结几年来粮食分配与使用经验教训，算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合理用粮的好处和不执行这个方针的害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展辩论，使广大群众真正自觉地贯彻执行省委的方针，在20天的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公、购粮任务。《河南农村整社工作的几点情况》一文的主要内容是：一、在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地都特别注意通过办展览馆的办法进行对比教育。二、关于重点批判对象的确定，各地都很慎重。三、关于重点批判的比例，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了省委的指示，一般都控制在占社员总数的1%左右。《一个连队的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一文指出，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协同六十一师政治部，于11月初在一八一团二营六连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试点。为了给整个教育打好基础，他们首先向士兵进行了人民公社问题的教育，办法是先讲课，后辩论。讲课中集中讲透两个问题：(1)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批判了公社“搞早了”的观点；(2) 公社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批判了公社“搞糟了”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再发动战士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辩论。辩论以后便进行群众性的自我小结，谈体会，谈进步。战士们普遍认为这次教育收获很大。

林克^[1]阅后，送陈伯达^[2]同志阅，退毛。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经济消息》第五十三期上的批语

(1959年12月)

伯达、林克、胡、邓、田^[1]阅，退毛。

此期^[2]全部可阅。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邓，指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田，指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1959年12月5日编印的第五十三期《经济消息》，主要登载了《大跃进的、协调的、看涨的计划》《钢铁煤炭计划第一本账已经超额完成》《城市副食品生产的任务》《关于养猪好处的一笔大账》《解决木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各地大办土铁路》《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农村“五冬”工作进入高潮》《有些职工对工业生产运动有错误看法》等消息。

对两篇关于取消 计件工资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

送陈伯达^[1]同志阅。

此两件^[2]可看。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6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八期上登载的《北京市工矿企业取消计件工资后劳动效率普遍提高》和《九龙山仓库取消计件工资后劳动效率提高一倍多》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指出，北京市工矿企业、交通、建筑业取消计件工资后，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上升了，效率提高了。取消计件工资后的主要是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了。最近中央决定年终仍发跃进奖，如果这样做，总的来说还可以保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后一篇文章指出，北京九龙山仓库过去一直实行旧计件工资制，阻碍了生产和工人思想觉悟的提高。取消计件工资后，生产面貌一新，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多，仓库管理工作也有很大改进。具体表现在：（一）改变了劳动组织，贯彻了“两参一改”。（二）开展了以半机械化、机械化和电气化为中心的技术革命。（三）把管理工作交给保管工人，大大增强了工人的责任感。

对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 在河北、河南两省参观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12月)

一个有兴趣的报导^[1]，宜一看。送各同志阅。退毛。

[1] 1959年12月7日编印的《外事动态》第一一五期上登载的这一报道说，外交部组织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于11月12日至21日到石家庄、郑州、洛阳等地参观，外宾们的反映是：一、一致承认我国发展速度快、建设成就伟大。二、对小洋群大炼钢铁的发展感到意外。三、认为人民公社发展情况良好。四、认为看到三门峡工程是这次旅行的高潮。五、承认各地物资供应充足。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的批语^[1]

(1959年12月)

陈、胡、邓、田、林^[2]阅，退毛。

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10日编印的《情况通报》第二二三号上。这期简报登载的《黑龙江省各城市基本上实现公社化》的材料说，黑龙江省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去年9月至11月间，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经过一年来的不断整顿、巩固，现在全省8个大中城市入社人口已达69.2%，市区和街道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政社合一的道路。城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大发展了工业生产。（二）大大促进了郊区的农业生产，发展了畜牧、蔬菜等多种经营。（三）职工家属、街道居民普遍地组织起来，直接参加了各种生产和服务事业，许多城市基本上做到了无闲人。（四）空前推动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发展。（五）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六）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程度，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七）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加速了过渡的时间。

[2] 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邓，指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田，指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林，指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为查《焚书坑》一诗作者给林克^[1]的信

(1959年12月11日)

林克：

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2]（晚唐人）写的？
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3]空锁祖龙^[4]居。
 坑灰未烬〈冷〉山东乱，
 刘项^[5]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阅后退毛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章碣，唐朝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曾中过进士，咸通乾符间有诗名，唐亡后流落不知所终。《焚书坑》是他写的一首七绝。

[3] 关河，指函谷关和黄河。

[4] 祖龙，指秦始皇。

[5] 刘，指刘邦，项，指项羽，均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 当前养猪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16日)

—

各省、市、区党委，并转各地、县、社党委：

(一) 现将农业部党组十二月十二日的报告^[1]发给你们。(二) 各级党组织都应设立一个畜牧业委员会或小组，省、地、县、社四级都应有一个不管别事、专管畜牧业的书记。(三) 凡尚未召开养猪会议的，除禁猪民族区域外，都应迅即召开省的(市、区的)、地的、县的、社的养猪会议，总结经验，规定任务和办法。此种养猪会议或畜牧会议，一年至少开两次。

中央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1] 指农业部党组1959年12月12日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自毛泽东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一封信在党内传达后，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养猪积肥的群众运动。已有14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参加的养猪会议或电话会议，许多地方由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建立了领导小组、委员会或办公室等机构。

二

刘、周、邓、彭^[1]即阅，尚昆^[2]以电报发去^[3]。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195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报告。

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 和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19日)

—

彭真同志：

此件⁽¹⁾可以转发各地供参考。请酌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12月12日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给中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自8月上旬以来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实际上是党的又一次整风运动。对此我们提出了3条基本要求：第一，清除毒素。第二，提高觉悟。第三，健全队伍。目前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二）前一段运动表明，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确实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任务，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三）在斗争中，我们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采取重点批判与自觉交心相结合的方法。（四）下一阶段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对重点对象深入批判和处理。第二，组织专题辩论。第三，精读文件，联系思想自我反省。第四，各级领导骨干深入谈心，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第五，提倡写心得体会。1959年12月26日，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二

还有政治，即阶级力量对比方面，起了重大变化。

中央转发上海市养猪工作大会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20日)

—

此件^印很好，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参考。可登党刊。

中央

1959年12月20日

[1] 中共上海市委1959年12月14日给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11月16日至22日，我们召开了全市养猪工作大会，根据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指示作动员报告，广泛交流群众创造的养猪先进经验。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思想问题：（一）养猪上算不上算？算账后，大家都认为养猪总归上算。（二）养猪这么多，饲料从哪里来？结论是以青粗饲料为主。（三）造猪圈的材料缺少怎么办？答案是依靠群众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四）解决养猪劳动力的两个办法：一是合理安排农业、畜牧业劳动力比例，二是大闹工具改革。（五）会议还批评了一些错误论调。（六）宣传养猪光荣。经过反复讨论，市委最后确定了明年郊区农村以猪为主的全面发展畜牧业计划，并对种苗、饲料、猪圈、工具改革、防病防疫、饲养员、奖励、领导等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作了具体的讨论和安排。

二

送彭真^[1]同志酌办^[2]。

毛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1959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的报告。

对冶金部关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 钢铁工业远景规划草案^[1]的批语

(1959年12月)

各同志阅，退毛。

要件

[1] 冶金工业部1959年12月14日印发的这份规划草案指出，钢铁工业今后8年发展规划的要求是：一、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和土洋并举的方针，保证高速度的发展。二、在各大区建立起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基本上解决钢铁工业的布局问题。三、完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产品品种的需要。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初步设想1967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至7000万吨或7000万至8000万吨。

对四川江油县银行工作经验的批语^[1]

(1959年12月)

各同志阅，退毛。

四川江油县工作做得好。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1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三二号上。这期简报登载的《中央财贸工作部关于在最近召开几个会议的安排》的材料说，中央财贸工作部和财政、银行系统，准备在最近一两个月内，召开包括四川省江油县财政、银行工作现场会议在内的几个会议。江油县银行在农贷工作上，走在农时前面，积极帮助公社和生产队解决所需的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在帮助穷队赶富队工作上，银行分派专人常住穷队，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帮助到底。在储蓄工作上，大办食堂储蓄组，帮助群众安排生活开支。县财政部门坚持了从生产到财政再到生产的财政工作方针，各级都订了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划，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困难，帮助公社发展多种经营。他们在依靠党委，同各方密切协作，大搞群众运动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好经验。11月间，李先念同志在重庆听了中央财贸工作部工作组的汇报后，认为这些经验都很好，指示可商请四川省委在江油县召开一个现场会议。四川省委现已确定，这次会议于12月15日召开。

对山西省委关于干部整风运动进展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

各同志阅，退毛。

此件^⑩可看。

[1] 中共山西省委1959年12月15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这次整风运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把主要目标集中在各级党组织中有右倾思想的负责干部和当家作主的人身上，一是运动面广，几乎涉及每个党员干部。（二）这次整风运动是每个党员干部过社会主义关，在政治思想上重新排队的运动。因此，必须把运动进行到底，一切工作以整风运动为纲，夺取整风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双胜利。（三）这次运动的收获是：1. 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许多过去认为不太重要的问题，现在都提高到两条道路的原则上来加以认识了。2. 在交心、批判中，揭发出了个别单位的严重错误。（四）对重点批判对象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妄图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还有一部分人，基本上是好同志，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所以在大风浪中不够坚定。（五）反右倾整风的效果立竿见影。不但参加整风的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步步高涨。

对波兰《政治周报》主编谈波兰党内 《令人不安的问题》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

送各同志。退毛。

此篇^[1]可阅。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2月17日编印的《宣教动态》(总第六〇三期)上刊载的这篇材料说, 波兰《政治周报》第四十四期发表该报主编拉科夫斯基撰写的题为《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文章, 谈到了波兰党的政治思想状况: (一) 政治热情下降。(二) 人们对党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三) 其他不良现象: 1. 领导干部不管思想。2. 反对坏现象不力。3. 明哲保身, 攻守同盟。4. 唯利是图。

对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收支情况调查 等两个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

—

此两篇^[1]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19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三九期上登载的两篇电讯稿。其中《一九五九年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户收支情况调查》一文说，河北、北京等14个省、市、区最近对1959年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户收支情况作了一项预计调查，情况如下：一、农业生产继续跃进，多种经营空前发展。二、收入分配更趋合理。三、粮食分配情况良好。四、公社部分所有制正在迅速扩大。五、社员生活显著改善。另一篇《〈纽约时报〉妄评美共十七次代表大会》说，《纽约时报》12月1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共产党在表明向右转以后提名中西部最高领袖霍尔为领袖》的文章，其中讲到，霍尔在主旨演说中强调拟订美国共产党的战术和战略时考虑美国国家特点的重要性，他援引了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情况的话，并且说，美国共产党也必须这样做。文章指出这是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第一次参照中国共产党的话而不是参照苏联党的方针来拟订它自己的方针。

二

成安县与磁县合并，现为成安公社，盛产棉花，今年九月我去看过。^[1]

[1] 这个批语写在《内部参考》第二九三九期登载的《成安公社实行固定增长比例的分配方法》一文题目的旁边。这篇文章说，河北省磁县成安人民公社根据生产连年跃进的情况，将按比例分红制度改为固定增长比例的分配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能因队制宜地确定社员增加收入的比例，使原来收入低的队多分一些，逐步赶上富队；其次，可多提些公共积累。

对《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一文的批语

(1959年12月)

送各同志阅，退毛。

此件^{〔1〕}可看。

[1] 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20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四〇期上登载的这篇报道说，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农业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消费的全部消费品中，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占85%以上。因此农业的丰歉，对人民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二）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部门所占比重很大，因此农业的丰歉，对工业生产的影响也很大。（三）农业与国家积累资金的关系。农业除了通过农业税的形式外，在农产品加工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上，也间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四）农业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目前我国的出口物资中，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占70%以上。这也是农业支援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 情况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27日)

—

此件^①极好。各同志阅。上午看过，下午讨论一下。

毛泽东

廿七日上午六时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22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五八号。这期简报登载了《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四川省顺江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社有制的情况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三年规划》和《广西柳州地委提出从十个方面发展社有经济》等3篇材料。其中第一篇材料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有关同志最近到东北三省了解人民公社过渡方面的情况，大体是：有一小部分的社、队（或管理区）已经由基本队有制改为基本社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社有经济发展异常迅速；一小部分公社和生产队在所有制方面的转变，已经是势所必然。第二篇材料说，四川省内江县顺江人民公社在今春整社时，确定试行基本社有制，大大促进了公社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第三篇材料说，广西省柳州地委根据现有的经验，提出目前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主要是积极兴办社办企业，增加积累，农业、工业和副业综合发展。但在发展社有经济的同时，还必须抓好各大队各专业队的生产。

用后直接退毛

二

请田家英^[1]同志找人民公社北戴河、武昌两个决议^[2]，下午带来，为盼。

三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3]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3] 《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的材料讲到：“东北三省的公社经济发展都很快”“估计大多数公社在两三年之后社有经济就可以占取优势”。毛泽东在此旁边写了这一批语。

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生猪 发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27日)

彭真^[1]同志：

此件^[2]很好，请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七日

用后退毛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中共江苏省委1959年12月22日给中央、上海局的这一报告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就开始强调抓生猪生产。目前发展生猪生产，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今后准备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一、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二、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省委确定的发展生猪生产的奋斗目标，立即检查一次规划的落实情况。三、切实贯彻执行以集体养猪为主，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当前主要抓集体养猪。四、发展生猪生产，在狠抓数量的同时，还必须狠抓质量；在狠抓圈存量的同时，还必须狠抓上市量。五、要大量发展集体养猪，首先就要大搞养猪基本建设。六、千方百计解决饲料问题。七、为了适应生猪大发展的需要，必须大力培养训练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做好防疫工作。八、大抓牧具改革，逐步实现养猪半机械化、机械化。

在一份介绍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 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材料^[1]上的批语

(1959年12月27日)

印10份，交我为盼。

毛泽东

廿七日上午六时

高智^[2]办。

[1] 这份材料介绍说，在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人当中，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另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而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人，则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是唯心的。上述双方从老子书中引证的话，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所作的解释各不相同；另一部分引文则各不相同。这篇材料还列举了《老子》一书中的十五段引文，分别介绍了持两种观点的人对这些引文所作的不同解释。

[2]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给钟学坤^[1]的信

(1959年12月29日)

学坤同志：

信^[2]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1] 钟学坤，当时是庐山疗养院护士。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保健工作。

[2] 指钟学坤1959年9月下旬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向毛泽东请教如何理解《七律·登庐山》一诗等问题。



毛泽东致钟学坤信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2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